

民族政策文件彙編

第三編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輯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摘录)(一九五八年五月
五日)刘少奇 1
- 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
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
.....汪 锋 2
- 为什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
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23
- 坚决肃清伊斯兰教界中的败类(一九五八年十月十
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27

第二輯

- 少数民族在高速前进(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人民
日报社论)..... 33
- 各族人民要风雨同舟,乘风破浪,争取在最短期
间改变自治区面貌(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在广西僮
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贺 龙 37
- 祝贺富饶美丽的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诞生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42
- 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
五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讲话).....林伯渠 46

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論)	52
* * *	
朱德副主席在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談会上的讲话 (摘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七日)	55
邓子恢副总理在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談会上的总 結报告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59
高速度发展畜牧业	烏兰夫 72
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暫行办法 (要点)	83
* * *	
国务院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討論僮文 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几項 原則的报告”的批复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	86
附：关于討論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 設計字母的几項原則的报告	86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摘录)(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 报告)	周恩来 90
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摘录)(一九五八年二月三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會議上)	吳玉章 92
少数民族語文工作需要促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社論)	93
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爭問題 (一九五 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 讲话)	汪 鋒 97
* * *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和今后党与国家在民 族工作方面的任务(摘要)(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所作报告)	汪 鋒 105

第三輯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民族工作部分)(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	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116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118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124
达赖喇嘛和谭冠三将军的来往信件.....	126
班禅额尔德尼致毛主席周总理的电报(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131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133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新华社政治记者	138
附: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143
欢呼讨平西藏山南叛匪的重大胜利(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1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50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代表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53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代表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62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決議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	168
国务院关于批准“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組織章程”和“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的通知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	171
附：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組織章程.....	171
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	175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人民日报編輯部 178
附：尼赫魯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	200

第四輯

偉大的十年 (摘錄)	周恩来 209
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結.....	烏兰夫 211
我国民族政策的偉大胜利.....	汪 鋒 223
建国十年来的內蒙古自治区.....	烏兰夫 240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前进的十年.....	賽福鼎 249
庆祝建国十年来的偉大胜利.....	韦国清 257
高举总路綫的紅旗,乘胜前进	刘格平 265
烏兰夫副总理在各民族观礼团負責人座談会上关于今后民族工作任务的談話 (一九五九年十月八日)	269

第一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 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 工作报告(摘录)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少奇

在許多少数民族地区,經過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认真地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揭露了少数民族中某些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时也进一步地克服了某些汉族干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样,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是社会主义, 还是民族主义?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

民族事务委员会
副主任 汪 锋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代表民族事务委员会作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请审议。

自从一九五七年七月民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以后, 有关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党中央的领导下, 根据党的三中全会的指示, 在少数民族中相继开展了一个以反对民族主义为重点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那些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党内、党外, 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 都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结合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辩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方面的大是大非, 并且进行反右派斗争; 在那些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 正在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方式, 在干部和人民中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在那些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和直接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正在干部和人民中,正面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

过去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民族人民和各民族干部的努力,民族工作的成绩是很巨大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实行了区域自治;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四百多个现代工业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有将近二十万人的少数民族工人队伍正在培养起来;少数民族的农、牧、林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有四十多万少数民族的干部担负着各种工作;有四十五万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已经被吸收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以上的成就,少数民族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族间的团结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现在,人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各少数民族中出现的种种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大工厂甚至没有手工业工场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了现代工业;在那些有独特语言而从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有了自己的民族的文字或者正在设计文字方案;在那些从来没有一所小学、一所医院和一所商店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了许多学校、医院和商店;在那些从来是交通闭塞的地区,出现了铁路或公路;在那些从来没有经济、文化中心的地区,出现了新的城市;在那些人口一直下降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人口上升的新气象。上述的成绩和变化,充分说明共产党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正确。毫无疑问,这些成绩和变化,已为各民族的大跃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少数民族人民胜利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的,应该说困难是不少的。值得指出的是,自从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长。从这次整风中揭发的材料看来,这种思想不只是在某几个少数民族中有了滋长,而是在许许多多少数民族中有了滋长;它不仅在于党外的一些人员中

有着明显的表现，而且在党内也有严重的反映；甚至在某些少数民族的高级干部中也有人存在着这种思想倾向。地方民族主义还在有些人中间已经发展到特别严重、特别恶劣的程度。

地方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不顾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无原则地要求扩大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域和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着企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的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

二在民族关系上保守排外，反对民族间的团结合作，特别是排斥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不欢迎汉族的帮助，拒绝向先进的民族学习。

三在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违背党的统一团结和共产主义原则，企图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来分裂党的组织，认为其他民族出身的党员不能为自己的民族谋幸福，只有本民族的党员才能为本民族谋幸福，要求按民族成分划分党的组织，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党员参加当地党组织采取排斥态度，特别是反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党员在当地党组织内担负领导责任。

为什么在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地方民族主义反而有了新的滋长呢？这当然绝不是偶然的。就全国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基本上解决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但是，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这个斗争依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还不心服，或者不完全心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企图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中也不例外。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就是反映了少数民族中一部分不愿意

接受改造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剝削階級分子對社會主義的抵觸和反對。

可見在少數民族中，同樣地必須接着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進行一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是這個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這是關係各少數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也是關係偉大祖國的統一和鞏固的重大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少數民族中政治、思想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就不能鞏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加強，而各民族的繁榮和發展也要受到阻礙。

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既然是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這種矛盾在某些範圍內就必然表現為敵我矛盾，而在其他範圍內則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地方民族主義者是披着民族外衣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破壞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反動分子和不願意接受改造的封建殘余分子。這種人主要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剝削階級分子裏頭的一部分：他們在各民族中和在他們所屬的階級階層中，都是極少數。他們同我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對他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揭露和批判，並使他們完全孤立起來。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對待民族主義者同我們的矛盾，雖然一般地也可以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而不採取壓服的方法，但是他們同我們的矛盾仍然是敵我矛盾。有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人，和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是不同的，這種人在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領導、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等問題上雖然也有一些錯誤的思想和言論，有的並且或多或少地同情和接受了民族主義分子的一些觀點，但是，他們一般是可以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並且可以是擁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他們的主要特點是在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左右搖擺。這種人在

各民族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從其他剝削階級分化出來的、同我們合作共事的人們當中，是大多數。他們同我們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對他們必須根據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用心平氣和地講道理的方法，誠懇地指明他們的缺點和錯誤，循循善誘地引導他們克服這些缺點和錯誤，爭取他們不斷進步積極參加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必須指出，爭取處於中間狀態的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只有把處於中間狀態的人爭取過來，才能使運動健康的發展，並取得完滿的勝利。這裡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在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中，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必須嚴格加以區別。既不能忽視敵我矛盾的存在，把民族主義分子同我們的矛盾說成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也不能夸大敵我矛盾，把有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人同我們的矛盾當作敵我矛盾去處理。

地方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思想，都是同社會主義根本不相容的，都應當堅決反對。過去幾年黨曾經強調反對漢族中的大漢族主義，並且在一九五二和一九五六年兩次全國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中，着重批判了大漢族主義，這是完全必要的。當然，大漢族主義傾向至今仍然存在，有的地區並且還相當嚴重。因此，今後也仍然要繼續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但是，在目前許多少數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義表現得如此突出，並且成爲一種值得嚴重警惕的危險傾向的時候，在少數民族中強調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就是很必要的了。

二

在這次運動中，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引導廣大的少數民族幹部和人民劃清社會主義立場和民族主義立場方面的大是大非，以便普遍提高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覺悟，徹底孤立民族反動派，達到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加強黨的領導、進一步鞏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目的。那麼，社會主義立場和民族主義立場方面的

大是大非也就是它們的根本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在对待統一的祖国大家庭和国内民族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主义立場维护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民族主义立場損害甚至分裂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这就是它們之間的第一个根本的分歧。

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証。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它的政治、經濟、文化也比較发展，但是它分布的地区还不到全国总面积的一半；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它的政治、經濟、文化一般也比較不发展，但是它分布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資源又很丰富。由于历史发展的結果，各民族又多是交錯杂居的，各民族在經濟上的往来也十分密切，早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各民族必須团結互助，共同建設社会主义。任何民族如果离开祖国大家庭，脱离其他民族的帮助，要想单独得到发展，都不仅是違背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且也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所以，我国各民族只有在統一的祖国大家庭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結起来，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取长补短，才能成功地建設社会主义，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得到发展和繁荣。这是一。

第二、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是各民族人民免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基本保障。帝国主义曾經长期地侵略过我們国家，那时它是压在中国各民族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只是依靠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才把这座大山推翻，从而使各民族共同获得了解放。但是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他們还在千方百计地挑撥我国各民族的关系，阴谋制造民族間的分裂，以便达到卷土重来、奴役我国各民族的目的。例如美英帝国主义者收买西藏的一小撮反动分子搞什么“独立国”活动，豢养新疆逃亡的大土耳其主义头子艾沙、伊敏等搞什么“东土耳其斯坦”运动，指使回族中流亡的战販馬步芳等阴谋在西北回族

地区建立什么“大陆上的台湾”等等，就是明证。当然，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是我国各民族人民誓死反对的，也是注定永远不能得逞的。我国各民族人民都认定，只有亲密地互相团结在一起，才能有足够强大的保卫力量，使他們免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任何民族，如果实行分离，就不仅必然要失去已经得到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伟大成果，而且也必然要重新落入帝国主义的枷锁之中。

第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在很远的历史时代，就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相处中，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并且多次联合抵抗了外来的侵略，从而共同保卫和开拓了祖国的领土，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尽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民族压迫制度，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但是各民族人民间的联系，仍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各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中，各民族人民的友谊更进一步地加强了。我国这种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这就是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人民中国的趋势。就在这个历史基础上，我国各民族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那个民族要实行分离，就违反了这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和它的根本要求。

上述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我国各民族只有团结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之内，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才能抵御帝国主义，任何民族如果离开祖国大家庭，就一定会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上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要末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民族繁荣的道路；要末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这是一条民族衰亡的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上述的情况也充分说明所谓“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各民族人民。而且这种分离主义在许

多情況下好像是一條棒子，它的一端在國內出現時，另一端就不難在國外發現。西藏的“獨立”活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顯著例子。

在民族分離主義中，還有一種要在我國建立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思想。這也是十分錯誤的。

歷史的發展給我國各民族只提供了在統一的国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建立自治地方的經濟和政治基礎，而沒有提供任何建立聯邦的條件。試問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四的漢族和僅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六的幾十種少數民族怎樣能夠分別建立自己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呢？在歷史形成的各民族多數交錯雜居的分布狀況下怎樣能夠划分出各个民族的共和國的區域界綫呢？歷史形成的各民族統一的社会經濟整體又怎樣能夠把它分割開呢？很显然，聯邦制是不適合我國情況的，也是不利於我國各民族人民發展利益的。

事實證明，我們採取單一的国家制度，而不採取聯邦制度，並且在單一的国家制度下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政策，是能夠完滿地解決我國的民族問題的。民族的區域自治既可以實現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使他們按照国家和自己的情況發展和繁榮自己的民族，又可以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權利的政治基礎上，把各兄弟民族團結在統一的大國內，實行互助合作，共同管理自己的国家和發展自己的国家，因而更有利於各民族自己的發展。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工作現在還在繼續進行，今年上半年將要建立廣西僮族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我國民族政策的又一偉大勝利，尤其是在反民族主義的鬥爭中建立這兩個自治區，更具有重要意義。

在區域自治問題上，在整風開始的時候存在着這樣的一種錯誤現象，就是不顧國家的統一領導，不顧現實條件和歷史條件，無原則地要求擴大自治地方的面積，提高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祖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都必須尊重

國家的統一領導，任何把國家統一領導同自治權利對立起來的思想都是錯誤的。自治地方的區域和行政地位，必須根據民族人口、民族關係、經濟發展等條件並參酌歷史情況確定。在這方面無原則地要求“高”、“大”，必然要損害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必須加以反對。

在反對分離主義的同時，還必須反對孤立主義。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團結，在我們的民族團結事業中，具有決定的意義。現在有些人反對漢族幹部和漢族移民，甚至有的民族主義者利用職權在國家機關中故意安插許多本民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互相勾結起來排斥漢族，這當然是極其錯誤和反動的。必須認識，要不要漢族幹部和漢族移民的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民族繁榮的問題。有些民族分離主義者往往把排斥漢族作為他們活動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有排斥漢族思想的人，如果不加克服，也很容易發展到嚴重的分離主義的地步。因此，反對一切排斥漢族的傾向，是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排斥漢族的重要借口之一是所謂“同化”問題，他們把漢族幹部和漢族人民幫助兄弟民族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說成是“要同化少數民族”，這當然是很荒謬的。基於平等地位的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但是民族的融合，絕不是短時期內的事，而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在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由於各民族互相接近、互相影響的結果，產生了民族間某些融合的現象。這不僅不是什麼壞事，而是一件好事。我們向來堅決反對對少數民族的強制同化，因為那就是民族壓迫；但是我們絕不反對民族間的自然融合，因為這是歷史發展中進步的趨勢。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對民族的風俗習慣的理解和態度問題。我們認為，民族的風俗習慣是社會生活的特殊條件決定的，隨着社會生活條件的變動，民族的風俗習慣不可能原封不動。而且民族的風俗習慣中有優良的成分，也有過

时的和无益的成分。保持和发揚优良的傳統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但是如果毫不區別地強調保持和发展一切民族的風俗习惯，甚至不管是否适合社会主义，那就是很錯誤的。

社会主义立場和民族主义立場的另一个根本分歧，就在于社会主义立場拥护党的領導，民族主义立場則反对党的領導。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領導核心。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說：“在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沒有无产阶级專政，而无产阶级專政是經過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領導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力量，在于它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有丰富的斗争經驗和工作經驗，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变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动。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保証我們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須有这样一个党的領導。”这就充分說明，各民族要建設社会主义，如果沒有共产党的領導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国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上的种种原因，政治、經濟、文化一般是很不发展的，有些民族甚至在解放初期还处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統治下。要不是共产党領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怎样能够在短短的八年中得到众所公认的显著的发展呢？那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怎样能够超越一个甚至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呢？显然这都是不可能的。

还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維護者。它永远坚持各民族彻底平等的原則，坚决反对民族間的歧視和压迫。共产党宣言說：共产党人“在不同民族的无产者底斗争中，他們提出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超越于民族性的共同利益”。列宁說：“为要做个国际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单只为自己的民族設想，而是应把一切民族底利益，一切民族底共同自由平等看得比自己的民族更高。”我們党的光輝的民

族政策和它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精神，就充分说明了党的这种特质。我国各民族人民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深受民族压迫的痛苦，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的政策，并且正在向着民族繁荣的伟大目标前进。如果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也就不可能有民族繁荣。可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我国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国各民族人民都必须真心诚意地拥护党的领导，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些民族主义者向党的领导大肆进攻，说什么“共产党是汉人党，不能代表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共产党，也能得到民族繁荣”等，这都是极端反动的。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条件，民族主义者的向党进攻目的在于企图搞垮党的领导，以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共产党在各民族的广大人民中有着很深刻的信仰，民族主义者的阴谋只是像“蚍蜉撼大树”一样，必然会遭到完全的粉碎。

党的领导力量的强大在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也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正因为党的团结和统一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有些民族主义者居心叵测地用分裂党的团结统一的办法来削弱党的领导。他们说非本民族成分的党员不能为本民族谋幸福，只有本民族的党员才能为本民族谋幸福，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从来认为，不管是那个民族，只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密切地联系广大人民，才能真正代表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如果违

反共产主义原則，走上破坏国家統一和民族团結的道路，即使是本民族的干部也不可能代表甚至只能損害本民族的利益。解放以来，許多汉族共产党員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开花、結果，全心全意地为当地人民服务，同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一起，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荣，从而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爱戴。这难道不是正好說明了这个問題嗎？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向来口口声声以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經過这次整風运动的揭发，却原来不但不是什么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而且都是彻头彻尾地損害民族利益的野心分子，这难道不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說明了上述的問題嗎？

有些民族主义者还主張按民族成分划分党組織，这更是反动的。党組織的团結統一和干部的共产主义化是党的組織路綫的最高原則。过去党曾經提出过干部民族化的口号，它的主要精神是要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要求所有的干部包括汉族干部都要深入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本民族的干部在这方面有着很多有利条件，因此党从来就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員，并且尽可能地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当地的领导机关，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在这方面也是有成績的。因此决不允許借民族化这个口号来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的原則，更不能允許按民族成分去划分党的組織。

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決議中指出：“破坏党的团結就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党的問題上的民族分裂主义不但是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的最危險的思想，也必然是分裂祖国統一和民族团結的反动思想，必須坚决加以反对。

綜上所述，社会主义立場和民族主义立場的根本分歧，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必須用社会主义立場克服民族主义立場，用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資本主义道路，这

便是当前各少数民族人民政治、思想革命的偉大任务。

三

目前整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各少数民族中蓬勃地向前开展，我們的任务是繼續深入地在各少数民族中开展这一运动，坚持把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争取运动的全胜。各地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需要繼續注意以下几个問題：

(一)必須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这次运动既然是一个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求各有关地区的党政领导都具有很大的决心，坚决进行，才能使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另一方面，整風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加之各民族、各地方的情况不同，許多少数民族中党的基础还比較薄弱，一部分少数民族还缺少从本民族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骨干，这就要求各地领导上在下定决心的同时，又要注意采取謹慎的态度和妥善的步驟，稳步前进，防止任何簡單急躁的作法。同时还应当注意不要把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混淆起来，也不要把那些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認識上的偏差和某些不自覺的糊涂思想当作民族主义去批判。

(二)要使广大干部和人民普遍受到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次运动首先要是在党员和干部中进行，并且要把重心放在党内。要使所有党员和广大的干部都認識到：民族主义立場，不管是大汉族主义立場或者是地方民族主义立場，都是同社会主义、同无产階級民族观、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相容的，都是同各民族团結互助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相違背的，都是同党的建設的根本原則相違背的，都应当自覺地加以檢查和改正。在一切有条件的地区要及时地把运动推广和深入到学校、工厂、农村等各界人民中去，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和宗教职业者等都能受到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关于民族問題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工厂，要使各民族职工进一步懂得加强民族团结和工

人階級團結及其相互關係的重要意義。在农村，要引導各民族农民把愛民族同愛祖國結合起來；把民族繁榮同社会主义道路結合起來。在几个民族聯合建立起來的合作社中，還要特別注意改進各民族社員之間的关系。在知識分子中，要进行无产階級民族觀的教育，幫助他們克服資产階級民族觀。在宗教界中，要进行愛國守法和反对坏人坏事的教肅，以加强宗教人員的愛國守法觀念。同时，在这次运动中，对于散居在內地城、乡中的少数民族人民，除同当地人民一起，由所屬地区的有关部門組織进行一般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外，還要由民族事务部門或者党的統战部門召集他們举行座談，使他們也能受到一次关于民族問題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

(三) 依靠少数民族骨干。在这次运动中，必須坚决地依靠少数民族中的共产主义骨干去进行工作。同时必須坚决地相信絕大多数群众。各地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都注意到首先在各民族的骨干中間把問題討論清楚，取得一致的認識，然后再依靠他們去发动本民族的群众。这样作，就能使运动順利地开展起来。事实証明，少数民族的广大干部和人民都是热誠地拥护党的号召的，并且已經积极地投入了反民族主义的斗争，这是运动必然要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証。

(四) 注意整改。过去我們在民族工作中是存在一些缺点和錯誤的，有些并且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于这些缺点和錯誤，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和政府机关都要随时注意檢查、糾正。并且在运动的一定时期內，还应当根据党中央有关的指示精神，轉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在整改阶段中，应当认真地檢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坚决、彻底地改正各地在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錯誤，特別要注意切实解决一些当地人民迫切需要而且有条件解决的問題。絕不能因为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其他情况，放松了对工作中缺点、錯誤的改正。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爭取和團結各民族中那些中間状态的群众，彻底孤立地方民族主义者，并使我們的

民族工作提高一步。任何掩盖錯誤，企图逃避整改的錯誤作法，都必須严格防止和糾正。

(五) 汉族党员和干部要认真地批判大汉族主义。在自治地方內的汉族居民、汉族党员和汉族干部中，整風和社会主义教育都要按照党中央对汉族地区的要求去进行。汉族党员和干部更加应当认真地檢查和批評大汉族主义，有些地方大汉族主义相当严重，尤应着重檢查和批判。絕不能因为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长而放松对大汉族主义的檢查和批判。現在发现有一些汉族干部不注意檢查自己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有的甚至借机抵抗党的民族平等政策，这些都是非常錯誤的，必須坚决加以糾正。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在汉族人民中彻底貫徹民族平等的思想，也才有利于在少数民族中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汉族党员、干部和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在一起进行整風，是可以而且應該互相批評的，但是都要注意着重对本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都要注意避免发生民族間相互对立的現象，以便达到既辨明是非，又增强团結的目的。

在这里需要說明的是有些人因为看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滋长，就怀疑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甚至认为在今后就可以不再繼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了，不再注意照顾民族特点和民族風俗习惯了，不再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了。这当然都是极其錯誤的。党的民族政策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問題的学說結合我国的实际而制定的，几年来的民族工作的偉大成就完全証明了这个政策的正确。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在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团結的事业中已經得到的胜利，也只要注意一下各少数民族在短短的几年中已經得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发展，就絲毫也不能怀疑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是資产階級对社会主义进行掙扎和反抗的一种表現，这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必然要出現的一种現象。只要注意一下我国当前階級变动的情况，也就絲毫不能怀疑党

的政策。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包括反对民族主义在内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坚决贯彻实行，任何不认真执行这个政策的作法都是不能容许的。

还有些人因为看到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反动的上层和宗教职业者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怀疑党对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否有必要继续执行，这也是很错误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确实有一些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向党、向人民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阴谋活动，激起了各民族人民极大的愤慨和严肃的反右派斗争，这是完全应该的。各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是人民的敌人，如果对他们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使之在广大人民中完全孤立起来，就很不利于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也很不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这方面的任何右倾思想都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看到，这样的反动分子在全国少数民族的上层和宗教职业者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的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团结教育下，都是有程度不同的进步的。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作了不少的工作，已经成为国家干部的一部分。在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中间虽然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和错误言行，这些都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但他们的問題，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問題，和右派分子有着根本的不同。可见怀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有继续实行的必要，是没有根据的。党在今后仍然要以毛主席的六项标准作为政治基础继续实行对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继续团结和改造一切可以团结、改造的人。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都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团结，并且加强对自己的改造。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是否参加劳动锻炼，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其他条件决定，不要勉强。至于怀疑党的信教自由政策是否有必要继续实行，更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宗教信仰只能实行

这个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什么政策。而且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只要人民信仰宗教，我们就实行这个政策。但是宗教界必须爱国守法，绝不能允许利用信教自由，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应该特别指出，少数民族宗教界违反爱国守法准则的坏人坏事是很不少的，因此就必须在这次运动中，对宗教界进行爱国守法和反对坏人坏事的教育。不这样，就不但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间的团结统一，不利于贯彻信教自由政策，对于宗教界本身也是很不利。

四

从这次整风运动的情况看来，少数民族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存在着民族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不少的人分不清社会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立场，尤其分不清社会主义立场和民族主义立场。这是由于少数民族的党员和干部大都是解放后参加党和参加工作的，有许多人并且是各种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一般还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也缺少无产阶级民族观的教育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斗争的锻炼，因而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有的甚至是在立场上存在着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的任务。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就曾指示我们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指出：“只有在各民族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核心，才能克服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巩固民族间的团结统一。”可见培养少数民族共产主义的干部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必然要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害。过去几年来，党在培养少数民族的共产主义干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收

到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不但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的数量很不够，而且在质量上也很需要提高。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統一和民族团結，并且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須大大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的工作，使各少数民族中都有足够的經得起風險的共产主义的骨干。为此，就要坚决克服过去在对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要对少数民族的广大干部着重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教育，使他們懂得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偉大历史意义；懂得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規律性。要求他們真正树立起无产階級的立場，掌握无产階級的階級观点，学会无产階級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不至迷失方向。而坚持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为了使干部共产主义化，还必须結合这次反地方民族主义，向广大的少数民族干部着重进行无产階級民族观的教育。使他們懂得无产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为爭取一个沒有剝削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因此它坚决反对民族压迫，主張各民族彻底平等；它坚决反对資产階級分裂各民族工人階級、劳动人民的企图，主張各民族工人階級、劳动人民巩固地联合起来；它坚决反对資产階級阻碍各民族人民的接近，而主張不断增进各民族人民間的友誼，并且认为各民族将来都要逐步走向世界大同。少数民族的干部必須树立起上述的无产階級民族观，坚决反对任何民族主义的表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为人民間的团結、統一而不懈地奋斗。

为了使干部共产主义化，还必须对少数民族干部加强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的教育。使他們真正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向群众学习，是一切革命者必須具备的品质。要求他們密切和群众联系，克服任何輕視和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使他們真正懂得劳动創造世界、劳动光荣和每个革命干部都必須在生产劳动中得到鍛炼的道理。只有建立了群众观

点和劳动观点,并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了这些观点,才能真正地和群众打成一片。

为了使干部共产主义化,还必须加强关于提高革命干劲的教育。今天全国人民伟大的奋斗目标是在今后十五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也要在今后十五年内,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但使各民族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在经济和文化上,使那些原来和汉族相差不远的民族都能赶上或接近汉族的水平,使那些原来和汉族相差很远的民族,也能得到显著的发展。为了完成这样极其英雄豪迈的事业,我国各民族人民和干部必须以雄壮的革命志气,昂扬的革命干劲,充沛的劳动热情,排除万难,不遗余力地进行生产和工作。要使少数民族的干部都懂得:每个革命的干部都应当作促进派,生气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奋勇前进,支持和促进一切新生事物的发展;应当反对那种缺乏朝气、强调困难和特殊、对新鲜事物采取消极态度的促退派。要求各民族的干部充分发挥革命的英雄主义,克服一切消极因素。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蓬勃地发展。

应该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只有基本上奠定了这个基础,才能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又是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必须的。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教育,就是要求少数民族干部最后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这次整风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对各民族的干部是一次极其生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和民族观教育。必须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本不能相容的。

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不但在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上存在有缺陷，而且革命干劲也很不足。不但往往同时具有个人主义，而且还往往同时具有宗派主义。值得指出的是，一个人用民族主义的观点去看待革命问题，也很容易堕落成为修正主义者。可见，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不在这次运动中彻底地检查和改正错误，不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和民族观，而仍然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就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即使那些有一些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也应当勇于引火烧身，进行自我批评，使自己获得锻炼。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主义者和一切革命干部自我改造的锋利武器，少数民族的同志都应当学会勇敢地和正确地使用这个武器。

五

经过几个月来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初步批判，在许多少数民族地方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增进了。由于端正了思想认识，在工作和生产中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极其生动活泼的新气象。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计划今年要扩大灌溉面积二百万亩，比去年多百分之七十，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和鼓舞下，群众的劲头更大，这个计划很快就被突破了，预计还要增加六十多万亩；内蒙古自治区今年兴修水利的计划，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也已由原订的二百零四万亩修改为三百万亩；而在即将建立的广西僮族自治区，去冬今春兴修水利即可扩大灌溉面积一千一百万亩，比过去八年的总和还超出许多。还有许多民族自治地方也都鼓起革命干劲，制定了农、牧业生产大跃进的计划，并积极领导群众掀起生产高潮，开始实现这些计划。这就再一次证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它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政治思想面

貌，而且还大大地改变着各方面的生产面貌。

现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少数民族中普遍深入地向前开展，我们坚决相信经过这次伟大的运动，各民族团结统一的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必将获得巨大的跃进。

让我们高举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旗帜，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奋勇前进！

为什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偉大的整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政治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民族之間的友爱和团結大大地增强了。現在，在一切完成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地区，各族人民正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之下，团結一致、干劲十足地建設我們的祖国。为了迅速地改变自己地区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后的状况，赶上汉族人民的发展水平，各个少数民族的人民派出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到汉族地区学习水利、积肥和改良农具等經驗，到內地学习开矿山办工厂的技术和經驗。同时，汉族人民在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亲密合作中，也从他們那里得到許多帮助，学到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在各族人民团結友好的基础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經濟和文化将进入一个空前迅速发展的时代。

为了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結友好，为了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进一步扫除民族关系中的一切旧思想的殘余，就有了迫切的必要。大汉族主义傾向在过去几年內已經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还没有完全肃清。在今后，对于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傾向和实际表現，仍然必須彻底地加以批判和糾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傾向也必須坚决加以克服，不能让它成为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今天本报发表的中共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召开扩大會議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消息，就是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重大胜利。从这个报道中可以看出，在新疆有一小撮地方民族主义

分子,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子,在那里挑撥民族关系,特别是挑撥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民族人民的关系,有的人甚至企图使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很明显,揭露和制止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完全符合于祖国统一的利益,完全符合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利益。

从很早以来,我们的国家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不仅具有悠久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求得共同的解放和发展的斗争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和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我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由于消除了民族压迫的根源,我国各族人民是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了,实现了国家空前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胜利的保证。而社会主义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利益,是他们团结一致的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事业在我国发展了,我国人民才有可能不分民族,都过着日益幸福的生活,才有可能使各民族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得到彻底的解放,真正成为先进的民族。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而没有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事业在我国的胜利,也就没有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新疆解放前后的情况,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解放前的新疆,在反动统治的长期摧残之下,经济和文化很不发达,虽有丰富的地下资源而不能开采,虽有大量适于植棉的土地而不能开垦,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而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间,新疆的面貌就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六十五倍多,一九五七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一倍,一九五七年的牲畜头数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七十点三,现有的大中小学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九多。这个伟大的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新疆各族人民在汉族人民协助下积极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設的結果。为了开发新疆,在新疆八年的基本建設投資中,中央的投資就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一,同时还給新疆調去大量的物資器材,派去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員。正是在中央的大力支援和汉族人民的帮助下,解放后新疆的經濟和文化事业才有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才有了显著的改善。这就說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統一领导下,在祖国統一的大家庭中,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互助合作,才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最大利益。

但是一小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企图分裂新疆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团結,企图把新疆各族人民孤立起来,反对他們到内地參觀、訪問和工作,反对汉族干部和人民到新疆支援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設。他們的目的,实际上是要使新疆的历史向后倒退。这难道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嗎?

我国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是我国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产物,它完全符合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符合于各族人民团結一致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由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有了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不但使民族地区的工作能够更好地照顾到民族的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他們感到自己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因而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在过去的几年中,不仅是新疆維吾尔自治区,而且每个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正在迅速改觀,就是我国民族政策完全正确的有力証明。反对这种民族政策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只是一小部分站在反动立場的地主資产階級分子人为地制造起来的。他們伪装成民族利益的維護者,而他們的所作所为恰好是在危害本民族的利益。他們声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販卖的却是修正主义的貨色。他們不仅反对我們党的集中統一的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且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企图按照剝削階級的面貌来改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民族自治地方。他們是披着民族外

衣的資產階級右派，他們代表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反映的是沒落階級的思想感情。在他們中間，有的人甚至和帝國主義有勾結，在帝國主義的策動下進行分離主義的活動。因此，他們的活動完全得不到群眾的同情。各少數民族的工人、農民、牧民、幹部和知識分子，都憤怒地譴責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的分裂活動，表示要努力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各族人民的團結，堅決貫徹執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

地方民族主義是舊時代遺留下來了的，因此，為了克服它的思想影響，需要進行長期的耐心的努力。有些人雖然帶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但是一般地還是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願意走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對於他們，就必須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耐心地從正面對他們進行教育，同時嚴肅地指出他們的錯誤，使他們懂得只有鞏固國家的統一和各族人民的團結，才能够迅速地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使各族人民都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前途。這種教育應該經常化，並且逐步由黨內擴展到黨外，由幹部擴展到群眾，使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主義的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完全可以相信，只要我們認真地這樣作了，我國各少數民族人民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覺悟就會進一步提高，他們就會更加親密地和漢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為實現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創造各民族的幸福生活而奮鬥。

坚决肃清伊斯兰教界中的败类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伊斯兰教界中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败类馬震武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头子，在全国解放后的九年中，凭借宗教特权，穷凶极恶地压迫和残害人民，策动反革命的武装叛乱，阴谋推翻人民政权，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当馬震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在西北地区的一些报纸和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刊物上公布以后，立即激起了全国伊斯兰教界和回族人民的愤怒，他们一致要求对馬震武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处理。

我国各族人民，在摆脱了旧制度的束缚以后，正以冲天的干劲和巨人式的步伐，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仍然有极个别的像馬震武一类的反动透顶的分子，妄想依靠他们周围一小撮社会渣滓的微弱得可怜的力量，来阻挠历史巨轮的前进，以保持他们对人民对宗教信仰的专横统治，任意奴役和杀害人民。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馬震武向日本特务机关卖身投靠，阴谋在西北建立什么“清真国”。全国解放以前，馬震武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者朱紹良和馬鴻逵等勾结起来，杀害了很多农民和革命干部，并且参与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甘肃海原、固原地区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以后又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回族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极其恶毒的欺骗宣传。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给他安置了职位，在各项运动中对他加以教育和照顾，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然而馬震武反以人民的宽大为可欺，坚

持反动立場，积极利用宗教进行顛复人民政权的活動。他不但經常造謠惑眾，离間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破坏党和国家的各項政策法令；而且先后策动和組織了几次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他的野心很大，最初想当土皇帝，“坐四十年天下”；而在最近一次的叛变中查明，他又想組織所謂“伊斯兰教民主党”，成立什么“宁夏地区回族共和国”。这些都足以說明，馬震武是一个作恶多端而又毫无悔禍之心的反动分子，不彻底把他斗倒，不坚决剝去他身上的画皮，他就会繼續为非作歹使我們的事業遭受損害。这当然是回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不能同意的。

馬震武表面上是道貌岸然，实质上却比豺狼还要凶恶，比蛇蝎还要阴險毒辣。几十年来，在他淫威統治下的地区，多少善良的回族人民被杀害，多少家庭被摧毁。他的殘忍毒辣真是到了駭人听聞的程度。任何人的正义反抗，或者仅仅稍微触怒了他，他就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人的全家杀光，或殘酷地采用了挖眼睛、割耳朵、挑断脚筋、剖腹挖心、掏心炼油和把尸体剝成肉酱等等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刑罰。对于这样一个中世紀暴君式的家伙，如果不彻底把他斗倒，不剝夺他用以欺騙、剝削和压迫群众的特权，又怎么能平民憤呢？

应当說明，經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回族人民包括絕大部分回族宗教界人士在內，在共产党的領導之下，正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地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馬震武和回族宗教界中的一小撮其他反动分子頑固地站在反动立場上阴謀把人民拉向后退。回族人民紧密地团結在共产党的周圍，而馬震武却极尽污蔑謾罵共产党之能事，要回族人民离开共产党。回族人民热誠地拥护人民政府，而馬震武却极力想推翻它。回族人民要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亲密地团結起来，在各方面实行互助合作，而馬震武却恶毒地挑撥民族关系，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結。回族人民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以后，已經实现了合作化，正在組織人民公社，而馬震武却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且

要人民无偿地为他劳动，用加重封建剥削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回族人民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而馬震武却用许多极不合理的宗教制度，来加重他们的经济的和劳力的负担。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徒同馬震武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徒为了自己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搬掉压在自己头上的馬震武这座封建大山。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之一。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是由于认识到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一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这在我国宪法上已有明文规定。全国解放九年来，我们曾经一再说明过：每个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过去信仰现在不信仰宗教，过去不信仰现在信仰宗教，这都由个人来作决定，政府不但不干涉，而且一概加以保护。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是长期一贯执行的，将来只要还有人信仰宗教，我们仍然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曾经一再说明过，宗教徒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而宗教信仰自由和同利用宗教来进行反革命活动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信仰问题，是有自由的；后者是敌我之间的问题，是没有自由的。任何人如果利用宗教信仰来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的政府就将坚决无情地加以镇压。馬震武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宗教不过是他用以迷惑群众，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进行反对人民政权的反动活动的工具。他一贯凭借宗教特权来残害、剥削和压迫人民，窝藏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策动和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在他以教主名义淫威统治的地区，广大的回族人民，事实上只能绝对服从馬震武，供他驱使和奴役，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没有从事正

当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因此，回族人民起来同馬震武作斗争，坚决搬掉这个封建大山，不但不違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恰恰是为了真正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了保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权利。

社会主义必須建立在沒有人压迫人，沒有人剝削人的基础之上，这是毫无問題的。但是，像馬震武这样的宗教界的上层分子，却至今还保持着許多用宗教掩护起来的封建特权，还在利用宗教对群众进行残酷的封建剝削。多少年来，馬震武对教民的任何指示（放“口喚”），教民都必須无条件地执行。他利用这一封建专制制度，大大地发展了他的封建特权，对教徒进行残酷的压迫和苛重的剝削。他拥有大量的封建财产，同时还假借宗教信仰之名，規定了許多剝削制度，大肆收刮群众的錢財，驅使群众为他无偿地劳动。他对群众的剝削，达到群众生产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不难設想，在遭受如此惨重剝削的情况下，回族人民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促成民族的繁荣和进步的。因此，回族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解放，为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創造更好的条件，就不但要搬掉馬震武这座封建大山，而且必須廢除一切利用宗教掩护起来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剝削。

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团结、教育、改造一切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肃清隐藏在宗教界中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宗教界中的右派分子和坏人坏事，廢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剝削，这是党和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方針。只有采取这个方針，才能在宗教界分清敌我界限、守法和違法的界限，有利于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經濟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和高涨。由于广大的宗教信徒認識到这一点，他們是热誠地拥护这个方針的。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适应广大伊斯兰教徒的要求，在宁夏召开座談会揭发和批判了反动分子馬震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是完全作得对的。这个會議已經結束了，但是回族人

民同馬震武之流的大是大非的斗争，反对伊斯兰教中的其他坏人坏事的斗争，特别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斗争还正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的回族人民，一定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继续坚决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斗倒馬震武和其他一小撮反动分子，扫清伊斯兰教中的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以更大的干劲，更加自由的双手，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战线上掀起更大的跃进。



第二輯

少数民族在高速前进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去冬以来，我国几千万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发挥了冲天干劲，創造了许多奇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所获得的显著成果，就是少数民族高速建設中的許多面紅旗之一。中共中央統战部最近在那里召开了民族工作現場观摩會議，这对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設，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江是“山高水冷”的“貧瘠山区”，在全国少数民族当中，可以說是一个比較落后的地区。那里的民族关系比較复杂，一九五四年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虽然粮食产量年年有所增加，但是部分地区还是采用人拉犁、鋤挖田、脚耘田等落后方法进行生产，产量很低，每年缺粮数量比較大。去年以来，中共三江县委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整風和社会主义大辯論，并且取得了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偉大胜利。这是三江实现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根关键，是三江各民族人民迅速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建設社会主义的轉折点。这一場斗争的胜利，迅速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打掉了各种各样的特殊論和落后論。他們在“改变山区，賽过平原”的口号下，全县人民一齐动员起来，战胜了穷山恶水，终于获得了早稻大丰收。早稻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九倍多，成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

第一个早稻千斤县，从严重的缺粮县一跃而为余粮县了。与此同时，三江的工业在资金自筹、原料自备、技术自学和边筹、边建、边生产的方针指导下，建立了大小工厂四千多个，比大跃进前猛增六百多倍。这些巨大的成就，进一步扫除了一切悲观论调，提高了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三江在短短的时期内，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少数民族地区完全可能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数的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仅符合汉族地区的情况和要求，也完全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和要求。现在，汉族地区正在全面大跃进，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全面大跃进，进展比较迟缓的地区也在努力急起直追，加速建设，争取早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发展上的落后状态。

少数民族是不是能够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贯彻执行总路线的问题。短短的几年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其中有些民族是从封建制度、奴隶制度甚至是原始公社制度，超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跃进到社会主义的。目前，有些原来相当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同时，就“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少数民族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巨大的跃进，在生产和建设中也完全能够实现大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夏粮普遍获得高额丰产；牧业区的牲畜纯增率正以高于过去几倍的速度飞快增长；全民大办工业运动正在高涨，甚至原来连手工业工场也没有的民族，也都在大办钢铁工业；原来过着落后渔猎生活的民族也建立了加工工厂；有的民族在兴建民办铁路；有些原来没有一所学校的民族，已经用本民族的文字或者用汉文扫除了文盲。奇迹不可胜数。

少数民族地区必定能够用最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

設，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了。但是剝削階級分子及其代言人和地方民族主義分子，也往往以這種特殊論落后論作為“根據”，在各民族人民中竭力散布悲觀論和宿命論，削弱人們的革命意志。他們還抓住在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加以夸大，企圖否定大躍進的成績，反對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反對少數民族走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反動階級的這種惡毒陰謀，各民族人民必須經常保持高度警惕，及時給予堅決的打擊。

同時，在我們的隊伍中，也還有極少數人，至今仍然以“少數民族落后”、“風俗習慣特殊”、“民族關係複雜”、“自然條件差”等等特殊論和落后論為借口，得出少數民族的生產和建設不能迅速發展的錯誤結論。這些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在觀察少數民族地區問題時，往往片面強調落后的不利的因素，忽略或抹煞有利的積極的因素。因此，在他們看來，少數民族地區簡直無法躍進。我們不否認，少數民族地區存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基礎比較薄弱等困難條件。但是，應該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一窮二白”，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落后不但不能妨礙少數民族大躍進，而恰好是由於他們的經濟文化發展比較落后，生活還並不富裕，所以就更加迫切地要求以最高的速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廣大少數民族群眾這種要求大躍進的積極性，正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巨大潛力。我國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和漢族勞動人民一樣，是勤勞勇敢的。少數民族地區資源豐富，潛力無窮，而且經過九年來的工作，已經為建設事業的大躍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們的建設不是孤立的，而是在黨和國家的密切關懷下，全國人民不分民族、不分地區的共產主義大協作下進行的，這是極為有利的因素。問題在於發動群眾，如果我們把群眾的積極熱情充分發揮起來，相信勞動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廣大群眾的勞動熱情和集體智慧就可以移山倒海。

目前,各民族人民正在为全国大跃进的形势所鼓舞,为自己取得的胜利所鼓舞,他们在“学先进,赶先进,在汉族的帮助下赶上汉族”的口号指引下,正在为实现他们制定的赶上汉族水平的宏伟规划而奋斗。我们相信,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一定能够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速度,用不着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伟大的理想。

各族人民要風雨同舟，乘風破浪， 爭取在最短期間改變自治區面貌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在廣西僮族自治區第一屆
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國務院副總理 賀 龍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廣西僮族自治區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協商和籌備，現在已經宣告成立了。我謹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向各位代表、僮族人民和廣西各族人民致熱烈的祝賀。

僮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比較多，政治、經濟、文化也比較發展的一個民族。它有着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光榮的革命傳統。僮族人民很早以來就聚居在廣西，並且散居在嶺南其他地區。在開發嶺南這塊富饒優美的國土過程中，有僮族人民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在祖國各族人民共同的革命事業中，有僮族人民的重要貢獻。但是，過去反動統治階級一直不承認僮族是一個民族，並且對僮族採取歧視和壓迫的政策。僮族人民為了反抗加在他們身上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踊躍地參加和支持了中國歷次的革命運動。大家知道，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它的策源地就在廣西；在領導這個革命運動的著名領袖中就有僮族。近三十多年來，廣西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運動中，在反對封建軍閥、蔣介石反動集團的鬥爭中所作出的英雄事跡，也是盡人皆知的。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西右江一帶就出現過轰轰烈烈的農民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同志中就有僮族人民的忠誠子弟、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韋

拔群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的左、右江一带，曾经建立过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同时还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这些军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转战祖国各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光辉的功勋；当时参加地方工作的一部分干部，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了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和广西的解放。解放后，各族人民又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各民族人民在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以后又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所有这些都说明解放几年来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党在僮族中培养了一批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干部。十分明显，依照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僮族建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是完全必要的。

广西是僮族聚居的地方，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聚居在广西的兄弟民族，还有瑶、苗、侗、回、仫佬、毛难、侬僯等民族，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同僮族人民一道，互相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汉族在广西，更是一个人口较多、政治影响较大的民族。这是广西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待广西的民族问题，必须经常注意到这个特点。由于广西的僮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共同开发了广西的土地，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已经结成了亲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和亲如兄弟的友爱关系，所以采用僮汉和其他民族合作的办法而不采用分开的办法，把原来的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僮族自治区，是完全适当的。这样做，既符合广西的历史发展趋向、符合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又符合广西各族人民的长远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也符合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原則。

几年来，党和国家已经为三十多个民族分别建立了八十多个自治地方，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实行了区

域自治。广西的僮族过去也曾經在一部分地区建立了自治州，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建立自治区积累了宝贵的經驗，培养了大量的僮族干部。各地的經驗都証明：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确实是解决我国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它能够保障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能够充分發揮他們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有利于加强祖国的統一和民族团結。毫无疑问，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党和国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僮族人民历史上一件大喜事，同时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大喜事。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从实现了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以来，便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的胜利之后，接着在一九五七年发动了全民性的整風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又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超额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第一个五年計劃。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偉大胜利，由于整風运动的順利进展，更由于党中央提出了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內在鋼鉄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修正公布了农业发展綱要草案，以及又一次強調坚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勤儉建国方針。这样，就大大鼓起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干劲。現在，我国各族人民正处在国民經济全面大跃进的空前有利形势下，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經出現，在这个时期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更有重大的意义。我們可以預料广西僮族自治区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成立，必将經過自己的努力，在短期內获得社会主义經济、文化建設的大发展和大跃进。

广西僮族自治区在成立以后，广西各族人民的任务是什么呢？我們的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結合作，

在繼續完成整風运动和反对資產階級右派的基础上，動員广西各族人民以无比的热情，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人人都應該“鼓起干劲，力爭上游”，同志之間、单位之間、自治区和邻省之間，都應該“比先进、学先进”；坚决实现多、快、好、省的勤儉建国方針；在“苦干三年”的口号下，为在自治区提前完成农业发展綱要草案、为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能够在不长的時間內赶上农业的产值而努力奋斗，爭取在最短期間改变自治区的面貌，并且更加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原来广西省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它为自治区的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应当充分利用广西各种有利条件，發揮广西各族人民在艰难的革命过程中长期团结合作的革命傳統，并且繼續培养大量又紅又专的各民族的干部，共同来建設自治区。毛主席曾經指示我們說：“国家的統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們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証。”在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只有各族人民特别是僮族和汉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風雨同舟，乘風破浪”，才能使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工业、农业和其他經濟文化事业得到全面的跃进。應該看到：随着社会主义經濟文化的不断发展，各民族間的合作互助关系将获得高度的发展。

为了保証生产上的大跃进能够实现，就必须有一个思想上的大跃进。这就要认真地抓紧整風运动；克服我們工作中一切缺点和錯誤，反对浪費、反对保守，打掉官气暮气，切实改进工作方法，提倡苦干精神，貫徹党的群众路綫。

在整風运动中，还必须坚决地反对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这是我国各民族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的一項重要任务。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民族問題上的反映，都必须加以反对。根据全国的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前应当着重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已經在許多少数民族中成了一种值得严重注意的危險傾向，如果不加反对，就

会破坏祖国統一和各民族間的团結，就会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我坚决的相信，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成立，对广西各族人民一定会发挥偉大的鼓舞作用。僮族人民和广西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人民一定会认清自己的責任，一定会更进一步团結起来，对自治区的建設、对偉大祖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祝賀富饒美麗的 廣西僮族自治區的誕生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人民日報社論)

在全國人民大躍進的喜訊像雪片飛來的時候，廣西僮族自治區宣告成立。這不只是廣西七百萬零三千僮族人民的大喜事，不只是廣西一千二百萬漢、瑤、苗、侗、回、仫佬、毛難、水家、僩僩、仡佬等十個民族的大喜事，也是全國人民的大喜事。

擁有三十一萬五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一千九百多萬人口的廣西僮族自治區，是我國建立的第三個省一級的自治區。僮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廣西僮族自治區的成立，是我們黨的民族政策貫徹執行的又一巨大成果。

廣西是一個富饒美麗的地方，境內河流縱橫，叢山綿延，草木茂盛，四季常青。桂林、陽朔和灕江兩岸的景色，素有“甲天下”之稱。全區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盛產桐油、茶油、楠竹、甘蔗、水果、藥材、橡膠等五百多種有經濟價值的土特產；區內礦藏豐富，有鐵、煤、錫、錳、金、錫、鎳、鋁等四十一種礦產；自治區的西北部是我國有名的木材產地之一。

在廣西這塊富饒美麗的土地上，居住着僮族、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他們長時期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起，用共同的勞動和鬥爭寫下了光輝的歷史。特別是在一百多年以前，為了反對清朝的封建統治，漢族和僮族人民曾經一起發動了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在以後的民主主義革命中，廣西的各族人民又在一起開展了反對封建軍閥、反對蔣介石集團和反對地主惡霸的英勇鬥爭。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西右江一帶的農民運動

搞得轰轰烈烈，它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僮族人民的忠诚子弟、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韦拔群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在左右江一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这些军队，在当时同反动政府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以后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转战在祖国各地，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当时有一部分干部留在广西，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对全国和广西的解放起了配合作用。这个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共同的劳动，已经在广西各族人民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培育起亲如兄弟的友情。现在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建立，将使广西的僮族人民进一步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加提高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将进一步发扬广西各族人民共同的革命传统，有利于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有利于他们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互相支援和配合。不论从广西或者全国来说，这都符合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

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倡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提出的。这一重大的倡议提出之后，立即得到广西僮族人民一致的热烈的拥护，也得到广西和全国其他民族人民的坚决支持。他们认识到，党中央的这一倡议，是符合于广西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因此，他们都愿意用积极的态度和实际的行动，来促使这个倡议的迅速实现。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协商和筹备，广西各族人民的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这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针的一个重大胜利。

广西僮族自治区是在广西省八年来巨大建设成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广西是个好地方，个个山头有宝藏”，但是那里的工业和农业一直非常落后。以广西省会南宁来说，解放前只有三个残破的小厂。现在的情况大大不同，广西省出现了有色金属、锰矿、锡矿、电力、机器制造、汽车修配、制糖等现代化厂矿

一百零七个(包括二十一个重大改建单位),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已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初期的一九五〇年增长了十一倍。在农业方面,已经改变了“一雨成涝,不雨即旱”的恶劣条件,进行了农业技术改革,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年年增长。全省粮食产量已由解放前的七十二亿斤增加到一百零八亿斤。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高等学校的学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中学生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小学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解放后创制了僮文,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到现在,四千个僮族乡里,就有三十五万多僮族群众在学习僮文,大约有十万多人已学会了僮文,开始摆脱了文盲状态。

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干劲高涨,同全国人民一样在生产建设战线上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去冬以来,全区掀起了水利、积肥、造林、除“四害”运动的高潮。全区人民在“苦战三年,征服千年旱灾”的口号下,动工修建大小水利工程十二万多处,灌溉面积达一千二百多万亩,超过了几千年来兴修水利灌溉面积的总和。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们要继续跃进,他们给自己画出了一幅美丽的远景。在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到一九六三年,地方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就要超过农副业总产值,达到三十七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六倍多。到一九六二年,公路通车里程要求达到一万二千公里;到一九六七年,全区通驳船的航道就要增加到三千公里。那时候,广西僮族自治区将县县有工业、乡乡通邮、通电话,也有更好的水陆运输条件。在农业方面,他们决心争取每年亩产八百斤的十年指标将提前六年完成。到一九六三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将跃进到二百四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五年内,全区基本绿化,这个地区就会完全成为花果之乡。在文教卫生事业方面,五年内消灭“四害”,大力开展扫盲和其他工作。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建立,对于促进广西地区提前超额完

成大跃进的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成立,正当全国少数民族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广西僮族自治区也必须要在少数民族中继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当前尤其应当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在庆祝广西僮族自治区诞生的时候,我们希望广西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僮汉两族人民在今后更加亲密地携起手来。僮族人民要切实地尊重其他兄弟民族的权利,特别是要尊重人口较多和政治影响较大的汉族人民的权利。汉族人民应该积极协助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行使区域自治的权利,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给予他们以有力的支援。只要广西的各族人民高度地发扬了这种团结互助的伟大精神,他们就一定能够把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使广西在全国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自治区域!

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林 伯 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副委员长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将近两年的酝酿、协商和筹备，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回族人民和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一件共同的喜事。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向各位代表、向回族人民和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比较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的一个民族。回族人民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而以宁夏等地比较集中。回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是我国勤劳、勇敢的民族，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有过光荣的贡献。在历史上，回、汉两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曾经对回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国民党反动派甚至根本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承认回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且曾经为回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在陕甘宁边区为回族人民建立了自治地方，并且组织和领导了各地方的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又领导回族人民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支援和参加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一方面认真保障了全国各地杂居、散居的回族人民的平等权利，继续在回族人民聚居的地

方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在宁夏、甘肃等地建立了四个回族自治区和九个回族自治县、一个和其他民族联合的自治县；另一方面积极领导回族人民进行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培养了干部，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从而使回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回族同汉族及其他民族间的友爱团结关系，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一九五六年春天，党中央又倡议为回族人民建立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以满足回族人民多年来的愿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甘肃省和其他兄弟地区的大力支持下，宁夏回族自治区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个重大的胜利，是值得我们大家欢欣鼓舞的。

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几年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实行区域自治的已经有三十五个少数民族，人口共达二千五百多万，约占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回族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政策的巨大优越性。由于在各地回民聚居的地方依据聚居地方的大小分别建立了大小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不但保障了回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大大激发了他们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而且迅速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回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毫无疑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一定会鼓舞起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更大的革命干劲，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增强民族团结。

宁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几年来工作有很大成绩。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在去年开始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批判了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

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今年开始，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有利形势下，宁夏工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粮食比去年增加一倍多，兴建大小工业单位九千多个。最近又斗争了披着宗教外衣的伊斯兰教界极右分子馬震武，开展了反对宗教界的坏人坏事的斗争，使回族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自治区农村也已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所有这些，都为自治区今后的建設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自治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建設工作上有許多极为有利的条件。全区現有水田四百七十万亩，平均每人两亩多，青銅峽水庫工程建成后，还可扩大灌溉面积几百万亩。人們常說：“天下黄河富宁夏”，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区内矿产资源据初步勘探就有几十种，其中尤以煤和石油蘊藏量最为丰富，发展工业的潜力很大。自治区的交通也很便利，所有县、市都有公路，橫貫自治区的包兰铁路已經通車，京一包一銀一兰航空綫也已建立。因此，自治区成立以后，只要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使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高速度地发展起来，就一定能够为自治区开拓出光輝灿烂的前途。

自治区的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中遇到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劳动力缺乏，并且要求中央在这方面給以支援。为了满足自治区各民族人民的这个要求，中央同意在今后几年內从其他各省抽調一批劳动力来支援自治区的建設工作。这是一个关系到自治区內各民族团結合作和社会主义建設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中各民族大团結，大协作的表现。这一措施的实现，必将进一步加速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設，对整个自治区的面貌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現在，我国正处在一个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并且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积极准备条件的偉大历史时期。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各族人民說来，将是一个生产和文化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为丰

富、人們的道德品質極為高尚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將沒有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而各民族之間的差別也將逐漸消失，融合為一個整體。目前我國的形勢，從民族關係方面來說，也就是正處在一個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並為各民族在共產主義基礎上融合為一體而積極準備條件的歷史時期。因為隨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向前發展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勝利，我國各民族人民之間的接觸愈來愈多，聯繫愈來愈密切，各民族人民在同一人民公社內部共同勞動、共同生活、互相幫助、互相學習，以及各民族地區之間和各人民公社之間的協作關係正在普遍形成和大大發展，從而使各民族之間的共同性和融合的因素愈來愈多，差別性愈來愈少，歷史遺留下來民族隔閡的心理殘余將會最後趨於消滅。偉大的列寧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消滅人類分為許多小國家的現象和各民族間的任何隔離狀態，不只是一要使各民族互助親近，而是要使各民族融為一體。”當然，要達到民族的完全融合，還必須經過各民族人民的長期努力。因為民族的融合，是各民族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和繁榮的結果。沒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就不可能有將來各民族的共同融合。只有經過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並在實現了共產主義之後，才能逐步達到這種融合。但是，現在我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中，各民族總的趨向是逐步走向融合。對這種趨向，我國各民族人民應該採取歡迎的態度，並且積極加以促進。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大躍進和民族關係大發展的偉大時期成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承擔了光榮的責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後，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的任務就是要團結自治區內各民族人民，貫徹實現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在徹底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人民公社制度

的同时，积极进行技术和文化革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争取在最短期间彻底改变自治区的面貌，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党的领导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胜利，各民族获得解放、发展和繁荣的决定条件。任何工作，不管是革命工作或是建设工作，离开党的领导，就必然迷失方向，导致失败；任何民族，离开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发展和繁荣。回族人民走上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也正是党领导的结果。因此，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任何单位、任何工作都必须置于党的统一领导和严格监督之下。所有党的干部，不论是回族干部或汉族干部，本地干部或外来干部，新干部或老干部，都必须共产主义化，都必须用共产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都必须在共产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实现党对自治区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才能使自治区的各项工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

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大协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在宁夏地区各民族、主要是回、汉两族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自治区成立以后，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各人民公社之间、各民族地区之间以及同兄弟邻区之间的团结，发扬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大协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在各民族劳动人民大团结的基础上，还必须继续加强对各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工作。

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贯彻和运用。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搞好革命和建设工工作。因此，自治区成立以后，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种工作中彻底贯彻群众路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社会主义群

众运动的最好方式，必須充分加以运用。

为了加速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設，并且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为了巩固和发展自治区各民族人民已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必須不断地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当前仍然应当着重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为此就必须繼續加强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民族观来武装干部和人民。必須把人民公社作为向各民族人民进行最生动的民族团结教育的学校，随时随地对各民族社員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民族观的教育，經常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或其他资本主义残余进行斗争，克服各种狹隘的民族观点。

在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时候，我們不應該忘記：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族人民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和胜利是极端仇恨的。几年来它一直霸占着我国的領土台灣，最近几个月来又在台灣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不断地侵犯我国的領海和領空。这种疯狂的战争挑衅，使远东和世界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国各民族人民必須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时刻提高警惕，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为解放台灣和其他沿海島屿，为維護祖国的主权和領土完整，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我們完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民族人民一定会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光荣地担負起党和国家所交給他們的各項任务，为自治区的建設和偉大祖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最大的努力，为支援解放台灣及其他沿海島屿贡献出他們的全部力量。

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在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正当我国各族人民以冲天的干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国第四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十月二十五日在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正式宣告成立了。这对我们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大喜事。我们相信，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将在宁夏地区更好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宁夏各民族人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将进一步亲密团结，把干劲拧成一股绳，使全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以更高的速度前进。

党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在宁夏回族人民聚居比较多的地方成立宁夏省一级回族自治区的建议。这个倡议反映了回族人民多年来的愿望，也符合区内回、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的利益，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变成现实。摆在自治区人民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集中主要力量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同全国人民一起大踏步地建设。

加速宁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自治区的面貌，这是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的。全国解放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宁夏地区的回、汉等各族人民，不但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而且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去年又经过了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最近更进而在全面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同全国人民一样，宁夏各族人民已经从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们迫切地要求发展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而群众的力量一经发动起来，是无穷无尽的，它能移山倒海，它能把一切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同时，宁夏资源丰富，境内有大片的平原和牧场，有比较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可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地下资源有煤、铁、石油、铜、铅、锌等多种矿藏，发展工业的潜力是很大的。自从全面大跃进以来，这里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今年的粮食产量比去年提高一倍多；今年一至九月就新建和改建了大小厂矿九千三百多个，等于原有厂矿的九十五倍。所有这些都说明，只要更进一步地加强领导，把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动起来，更大规模地、更加迅速地发展宁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是完全可能的。

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特别是回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对于加速发展宁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挑拨离间所造成的回汉两族人民之间的隔阂已成过去。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党和政府实行了民族平等、友爱和合作的政策，坚决反对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广泛地用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思想教育人民，回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民族之间的团结空前增强。今后，为了更加迅速地推进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广泛深入地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坚决反对妨碍各民族团结合作的坏人坏事，大力宣传和提倡各族人民之间互助合作，发扬人们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后，许多人民公社都是回汉等各族人民共同建立起来的，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这是进一步加强团结的有利条件。

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使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巩固和增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使各族人民走向富裕和幸福的基本保证。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必须经常注意对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宁夏回族自治区内部的各个民族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诞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又一重大胜利，也是回汉民族和自治区内的各族人民团结合作的伟大胜利！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自治区各族人民将更加亲密地携起手来，互相尊重，亲密团结，共同努力，一定使自治区更加加速前进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朱德副主席在牧区畜牧业生产 座談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七日)

朱德副主席在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談会上讲了話，他要求全党重視这个工作。

朱德副主席說，畜牧业是我国国民經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广义的农业部門中，除了粮食生产以外，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发展畜牧业，不仅能在畜力和肥料上支援农业生产，并且能供应更多的工业原料和城乡人民的肉食、奶食等；同时，牲畜和畜产品，还是重要的暢銷的出口物資，可以換取大量的外汇。据統計：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六年間的各种畜产品的出口总值，可以換回鋼材九百七十九万吨，对于国家的工业建設事业，作了巨大的貢獻。从长远的发展前途来看，畜牧业(特别是发展生猪和奶牛)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发展畜牧业的問題，是值得我們全党重視的。

他說，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畜牧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大家畜在一九五七年已經达到八千四百二十七万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十点六；小家畜(包括山羊、綿羊，不包括猪)一九五七年已經达到九千七百六十九万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八。猪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畜牧业的发展沒有达到我們預定的目标，就这点來說，已有的成績又是不能使我們滿意的。我們应当进一步地大大发展我国的畜牧业。

朱副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

的方針，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党中央已經提出，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內，在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一基本任务下，畜牧业必須相应地跟上去，既要供应工业发展上所需要的畜产原料，支援农业生产的畜力，适当地供应城乡人民的肉食；又要扩大畜产品的出口，以便換回国家建設所需要的各种物資，并且支援兄弟国家。因此，畜牧业必須更快地发展起来，才能滿足各个方面的需要。

他說，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全国土地总面积有一百四十三亿亩，其中耕地仅占百分之十一点六（云南仅占百分之五），森林占百分之七点九。再除去一部分沙漠和雪山，其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荒山和草原。这些地方大部分都可以利用起来，大規模地发展畜牧业。

在畜牧业的发展上，全国大約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这里草原辽阔，潜力很大，畜牧业向来有基础，可以大量发展。另一种是广东海南島、广西、云南、貴州以及长江流域各省。这些地区，气候温暖，四季长青，人力充足，既不愁水草不足，又不用多大的建設投資，如果利用現有的荒山荒地发展畜牧的話，条件比內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区还优越。第三类地区是黄河以北和东北各省，这些地区荒山也不少，同时与平原的农业区紧紧地連在一起，以畜力来支援农业，更有现实的重要意义。这些地区如果飼草不足可以利用麦收地种半季玉米，以便作为青貯飼料。以上三种地区；只要根据不同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每一个地区的畜牧业都是能大大发展的，我們的畜牧业是大有可为的。在許多地区，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和兴修水利，不仅是发展农业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条件。在上述許多地区中，除了发展馬、牛、駱駝、羊等家畜的飼养外，还可以有計劃地馴养鹿、狐等野畜。在南方

各省，应当注意发展羊的飼养。在不少地区，虎、狼、野猪等害兽，对于畜牧业、农业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有很大危害，应当有计划地加以消灭。在全国各地，都应当注意牧場的建立和养护工作。

养猪是畜牧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門，除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各地都必须注意发展养猪事业。报載，最近河北省行唐县，已經出了一个万猪乡（安香乡），全乡每户平均的养猪头数，已經超过农业綱要草案所規定的一九六七年的指标——两头半到三头的三倍。这个事实发生在北方省份，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全国各地都应当注意推广河北省行唐县的这个經驗。

朱副主席說，为了适应畜牧业的发展，应当加强畜产品的加工和牲畜购銷工作。牧区可以举办中小型的畜产品的加工企业，以便就地取得原料。一般說来，这些加工企业，如奶粉、奶油、皮革、肉食、屠宰、冷藏厂等，宜小不宜大，以便适应牧区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因为企业小，投資就少，就易于举办，牧区供銷社和牧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搞起来。关于牲畜的购銷工作，除耕畜、肉畜統一收购外，应特别注意依照历史上牲畜的流轉路綫，来調剂牲畜。

关于牧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朱副主席說，由于牧业的情况比較复杂，改造的进度不会完全一致，具体做法，也不能完全相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必須注意到牲畜是个活东西，必須注意到牲畜的保护和发展。对于牧主的改造，小牧主可以允許参加牧业合作社，对大、中牧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步驟可以采取公私合营方式。凡是游牧的地区，应当首先定居下来，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外来的汉族工作干部中必須注意反对大民族主义、教育他們全心全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經濟和文化；同时，在少数民族中必須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这种民族主义也是同样妨碍民族团结的。很明显，只有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較先进的

汉族人民的帮助之下，少数民族地区才能迅速地建成社会主义。

朱德副主席最后說，这次會議开得很好，解决問題的大的方針和办法都有了。我相信，按照这些方針和办法做下去，我們的畜牧事业，一定会迅速地发展起来。

（編者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八日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农业部联合召开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談会，会上提出了畜牧业生产的方針和任务。参加會議的有內蒙、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貴州、河北、山西、陝西、吉林、黑龙江等十四个省、自治区。朱德副主席在会上对畜牧业工作讲了話。）

鄧子恢副总理在牧区畜牧业 生产座談会上的总结报告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这次座談会反映了情况，交流了經驗，提出了問題，訂出了初步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尤其是朱副主席亲临讲话，給大家很大的鼓励，苏联专家列別节夫同志又介绍了苏联发展畜牧业的宝贵經驗，會議开得很好，收获很大，相信今后畜牧业生产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現在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大家的发言，讲如下的八个問題：

一 几年来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偉大成績

建国八年来，全国畜牧业特别是牧区的畜牧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大小牲畜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全国預計共有大牲畜(牛、馬、駱、騾)八千四百二十七万头，比一九五二年(七千六百一十七万头)增加百分之十点六，比一九四九年(五千九百七十七万六千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比战前最高年份(一九三六年七千一百五十万头)增加百分之十七点九；山羊和綿羊共九千七百六十九万四千头，比一九五二年(六千一百七十七万八千头)增加百分之五十八点一，比一九四九年(四千二百三十四万七千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七，比战前最高年份(一九三六年六千二百五十二万头)增加百分之五十六点三；猪一亿二千五百一十二万头，比一九五二年(八千九百七十六万五千头)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点四，比一九四九年(五千七百七十五万二千

头)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点七,比战前最高年份(一九三四年七千八百五十万三千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点四。

这次到会的十四个省(区)的大小牲畜也有很大发展,一九五七年共有大小牲畜(生猪未包括在内,以下同)一亿四千万头,比一九四九年(七千四百零六万头)增加百分之八十九点七。这些省(区)的大小牲畜头数占全国总头数的百分之七十七,是畜牧业生产比重较大的地区。

(二)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首先,是为农业提供了动力。目前全国农业上使役的耕畜达五千二百五十一万九千头,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动力,全国十六亿八千万亩耕地,除了机耕面积百分之一一点七和部分人力挖的山坡地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是依靠畜力耕种的。其次,是为农业提供了主要肥源。如果把牲畜粪尿的肥效折合成硫酸铵计算,每头大牲畜和猪一年所产的粪尿各合硫酸铵约六十斤(大牲畜一年所产粪尿的数量比猪多,但肥效较低),每只羊年产粪尿约合硫酸铵十斤,根据一九五七年大小牲畜的数量(其中大牲畜按百分之七十计算,羊按百分之六十计算,其余的是在牧区,粪尿未利用)共计折合硫酸铵达五百八十万吨左右,其他鸡鸭粪尚未计算。这和我目前生产化肥的数量对比起来是很大的数字,而且牲畜肥料是有机肥料,并有改良土壤的功效,不是化肥所能比拟的。再次,是为广大运输业提供了动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供交通运输专用的役畜达七十三万七千头,兼作运输用的役畜为数更多,无论平原和山区,牲畜承担的运输量所占比重很大,而且今后长时期内牲畜仍然是农业生产和农村运输的主要动力。第四,为轻工业、手工业提供了原料。许多畜产品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来畜牧业为工业提供的主要原料有牛皮二千七百五十一万五千张,羊皮一亿零三百六十三万张,绵羊毛二十七万六千吨,以及大量的鸡蛋、牛奶、兽骨、肠衣、羽毛等。第五、为城乡人民提供了肉、乳、蛋等付食品。例如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宰杀供肉用的牛、羊、猪即达三亿八千三百三十五万头。第六、为国家增加了资金积累换取外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和牧区牧业税收入共达十九亿一千七百万；畜产品出口所换取的外汇，每年平均等于二百七十九万吨钢材的价值。第七、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改善了农牧民生活。据国家统计局资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前四年，畜产品总值每年平均为六十二亿四千万元，占农副业平均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一点五。

(三)建立了畜牧业的社会主义制度。农业地区随着农业合作化，大家畜已基本转变为集体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已开始发展公有畜牧业；牧区在牧业互助的基础上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内蒙、新疆、青海和甘肃等省(区)已建立牧业生产合作社一千七百六十三个，公私合营牧场九十二个，互助组九千四百六十九个，这些社、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增加了生产和收入，显示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为今后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全国目前共有国营农场和牧场六百三十九个(有资料上报的场)，大小牲畜二百二十二万头，其中一百二十九个农场和牧场是在牧区，共有大小牲畜一百二十八万头，耕地五十四万亩。它们在牲畜品种改良、兽疫防治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对牧区畜牧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示范和支援作用。

(四)畜牧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几年来培训了二万多名畜牧兽医干部(其中高、中级人员一万六千余名)。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所、场、厂、院三千七百处。修建畜圈、畜棚，改进了饲养管理的条件。改良牲畜品种，现有优良的纯种和杂种马、羊等良种牲畜四百多万头。基本上消灭了牛瘟，控制了口蹄疫等兽疫，初步建立了检疫制度，试制成功绵羊牛瘟兔化毒疫苗和猪瘟兔化毒疫苗。建立了耕畜运销工作机构，调剂了相当数量的耕畜。

从上面可以看到全国解放以来畜牧业生产的成績是很大的。同时也說明了畜牧业生产对国民經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畜牧业和农业两者不仅是互相支援而且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这些成績的获得是由于党中央方針政策的正确，各級党委重視，正确地貫徹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发挥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国家在物质上和技术上大力的支援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和畜牧兽医工作人員、科学技术人員辛勤劳动的結果。

二 畜牧业生产中存在的問題

全国畜牧业生产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也有着不少的問題，它具体表现在：

(一)畜牧业生产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的結果，各項指标都沒有完成。大牲畜只完成計划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一，山羊和綿羊完成計划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四，猪完成計划的百分之九十点四。

(二)大牲畜的純增殖率自一九五五年以来，是連續下降的。大牲畜一九五四年增殖率是百分之五点六，一九五五年是百分之二点八，一九五六年不增不减，一九五七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一点五，共减少一百三十万头，其中减少最多的是黄牛和駱。从地区来看，大牲畜的絕對数字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的有西北、西南、华东(浙江省除外)、中南共十八个省(区)；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减少的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山东、河北、山西、辽宁、河南、天津等九个省市，共减少二百四十万头。騾尚差二百九十三万五千头，駱差一百二十四万五千头，未达到战前头数，也主要在这些地区。

(三)有些地区現有大牲畜中老畜多，幼畜少，牲畜瘦弱現象严重。据河北調查，目前耕畜中老畜占百分之三十一，幼畜占百

分之六,余为壮畜。由于牲畜瘦弱的关系,农区耕畜中能参加劳役的耕畜一九五四年为百分之六十八点三,一九五七年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四)畜牧业生产总产值占农、副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有下降趋势,一九五三年畜牧业总产值占农、副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二点二,一九五四年为百分之十二点六,一九五五年为百分之十一,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十点八,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三年下降了百分之一点四。

全国总的情况是牧区牲畜纯增殖率周期性的下降,生产不稳定;农区耕畜不足,负担加重。在个别大牲畜减少的多的省份尤为显著。例如吉林省,一九五四年每头耕畜负担耕地面积为五十一亩,一九五七年增至七十二亩;河北省有个别县每头耕畜负担耕地面积达八十亩以上。加以牲畜瘦弱,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农业生产的需要。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情况虽有好转,但是耕畜不足的状况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

在牧区牲畜纯增殖率所以发生周期性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为害,水利、草场和牲畜圈棚等基本建设工作做得不够,以及产销脱节所致。在农区产生大牲畜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农牧业相互依存的关系认识不足,对畜牧业生产重视不够,有些地区对农业机械化估计过早,对牲畜是一种有生命的生产资料认识不足,在合作化过程中,对原来支配小农经济的规律起了变化这一点预见不够,合作社中处理牲畜问题时发生的缺点,如耕畜入社作价偏低,过分集中饲养等,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及时,还有些地区牲畜饲草饲料不足。无论是牧区和农区,由于旧的牲畜运销系统瓦解了,新的运销系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和收购运销工作做的不够好;牲畜价格曾一度偏低,目前若干畜产品的地区差价、品种差价还不尽合理;改进饲养管理,防治兽疫和改良品种等技术支援,赶不上发展的需要,以上这些现象和问题,给予畜牧业以不利的影响。

三 牧区今后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

全国的畜牧业生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地区，即：北方的草原牧区，南方亚热带，山地牧区和广大的农区。现对草原牧区和山地牧区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北方草原牧区，包括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和四川省西北部等广大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大小牲畜占全国总头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不包括猪），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它具有和农业区不同的特点：1、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少数民族，他们积累了多年经营畜牧业的经验。2、社会经济不发展不平衡，各地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不同，情况复杂。3、畜牧业生产在目前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改造的条件下，存在着脆弱性和不稳定性。4、牧区生产单一化，商品性大。5、地广人稀、交通不便。6、青草期和枯草期各占一半，因而牲畜膘每年是“夏半、秋肥、冬瘦、春干”。

根据北方草原牧区的特点，畜牧业生产的方针是：在积极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逐步改游牧为定居，实行农牧业结合（首先是饲料生产），兼营牧产品加工工业等副业生产，发展以牧业为中心的多种经济。

(二)亚热带和山地牧区。自然条件好，一年四季常青或三季绿色，是一个具有畜牧业大量发展良好条件的牧区。这些地区，畜牧业生产的方针是：在争取粮食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原则下，积极发展畜牧业，发展农、林、牧和副业相结合的多种经济。

(三)根据投资少办事多收效快的原则，有计划地在牧区发展国营农场，从技术、种畜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支援牧区畜牧业生产，并起示范作用，以促进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述两类牧区的畜牧业生产，每年牲畜数量必须要有增长，

北方草原牧区,在提高牲畜总增殖率的基础上,每年純增殖率要求达到百分之八左右多至百分之十,除了滿足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和畜产品收购計划以外,并应为广大农区提供畜力,供应华北、东北等地以役畜。至于各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具体要求,由各省(市)区根据上述方針和任务自行制定。

四 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中央民委已草拟了“关于在少数民族牧区逐步实现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这次會議討論了这个文件,大家一致同意指示的精神,将来經中央批准后发下去,这里不詳細讲了。現在着重的讲如下几个問題:

(一)对牧区畜牧业改造必須坚持积极稳步的原則。牧业合作的优越性比之农业合作化更为显著,因此合作化是发展牧区生产的总方向,是一个偉大的历史任务,是发展和繁荣牧区經濟的决定性关键,所以必需坚持积极发展的态度,目前条件不足的,应为逐步实现合作化积极地創造条件。由于牲畜是一种有生命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牧民各人占有的牲畜数量悬殊較大,牧区的自然条件又較差,偶有不慎,畜牧业生产就会遭受自然的和人为的損失和破坏,所以又必須稳步前进。但是决不能因稳步而迟迟不前。因积极而不准备必要的条件。至于合作化发展的具体进度怎样,因为各地情况不一,由当地党委研究决定。

(二)牧区畜牧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綫是:依靠劳动牧民,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这是因为牧区的劳动牧民約占牧区总戶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他們对合作化是积极拥护的,是实现合作化的基本力量;富裕牧民約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由于他們占有牲畜較多,有輕微的剝削,所以对社会主义改造是动摇的,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只要我們正确貫徹执行互利政策,耐心說服教育,他們是仍然能够接受改造的。因为各地情况不同,在貫徹

执行阶级路线中具体做法上允许有所不同。

(三)关于牲畜入社和收益分配的办法,应该因地制宜,创造经验。目前各地处理牲畜入社和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四种办法:1、适龄母畜计头入社,按劳畜报酬比例分配成活的仔畜和畜产品。2、全部牲畜计头入社,有产值(包括畜产品和役用价值)的牲畜按年产值计股,按股计红,按劳畜比例分配收益;无产值的牲畜由社统一经营,畜主向社交纳管理费用。3、把入社牲畜折合标准牲畜计股,按股计红,按劳畜比例分配收益。4、牲畜分类分等依市价计股入社,按劳畜比例分配收益,这四种办法都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由社统一经营的初级形式,容易为广大牧民所接受,可以因地制宜分别采用。至于初级社转高级社的问题,有条件的可以个别试办,创造经验。也可考虑将来用逐步降低牲畜分红比例的办法过渡到高级社。

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原则是保证社的牲畜和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积极增加公共积累,进行必要的基本建设,以扩大再生产。

入社牲畜和自留牲畜的比例,因地、因社、因时制宜,不必统一规定,一般是入社牲畜应多于自留牲畜。

(四)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牧主经济肯定要实行改造,这是不能动摇的。举办公私合营牧场是牧主经济改造的主要方式;签订合同,把牧主的牲畜交国营牧场、公私合营牧场或合作社代放,并租用其主要生产工具,这种办法可以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试办;个别牧主(主要是小牧主)愿意服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可以吸收入社。

五 关于牧区的生产建设

在牧业区逐步提高牲畜的纯增殖率,是畜牧业扩大再生产的关键。要求牧区牲畜的年纯增殖率达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必须注意如下的几个方面:作好“四保”(保配、保胎、保生、保活)

提高牲畜的总增殖率，根据牲畜增殖淘汰的规律和满足当地群众需要的原则确定一定的外调比例，外调牲畜多了或少了，都对畜牧业生产不利；在牧民日常生活消费方面，提倡勤俭持家，减少牲畜的消耗；大力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牲畜的因灾死亡率。在保证提高牲畜总增殖率和减少牲畜因灾死亡率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大力兴修水利。有水就有草，水草是牧区的基本生产资料。全国约有三百万平方公里草原，其中尚有三分之一未被利用，已利用的草原载畜量也不高，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是兴修水利，解决水的问题。水利部门应把牧区水利建设当作重要任务，对草原进行勘测设计，了解地下水的情况，并给以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支援。

(二)保护、培育和改良草原。发动群众进行防火、固沙、耕耙草原，去毒草，种植饲草，消灭兽、虫、鼠等害，请当地驻军协助群众打黄羊；同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调整以至固定草原使用权，实行划区轮牧。

(三)逐步推行定居放牧。结合互助合作运动，逐步推广定居放牧，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组织牧民种植饲料作物和粮食作物，作到以牧为主的农业结合。

(四)提高牲畜繁殖率和成活率。推行分群放牧，改进畜群构成，提高适龄母畜的比例，按期配种，减少空怀，相应的作好保胎、接羔、育幼工作，修盖圈棚贮草备料，以改进牲畜的饲养管理。

(五)改良畜种。着重选育当地良种，适当地引进外地优良畜种，实行分群放牧，避免乱交，开展良种牲畜的人工授精工作，以普遍提高和改良牲畜品种，建立良种基地。各地国营牧场应成为供给优良种畜的基地。

(六)加强兽疫防治工作。根据改善饲养管理、加强家畜卫生、结合畜疫防治的原则，大力开展兽疫防治工作。继续贯彻执行对民间中兽医的“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方针，发挥其积极作用。

有的省(区)要求农学院开设畜牧兽医系, 举办中等畜牧学校和建立生物药品制造厂等问题, 各地可进行规划, 报请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后进行。

牧区生产建设所需的资金, 主要是依靠群众和合作社自筹。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贷款和投资。

六 农区畜牧业发展问题

农区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 应积极发展畜牧业, 耕畜逐步达到自繁、自养、自给(或大部自给), 使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足够数量的强壮耕畜, 大牲畜和羊以发展合作社的公有为主, 同时鼓励和帮助社员私养; 猪以私养公助和社繁私养为主, 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公有养猪业。

目前农区耕畜减少, 不重视饲养幼畜的倾向要大声疾呼扭转, 虽然一九五七年某些地区这种现象有所改变, 但情况仍然严重, 对农、副业生产影响很大, 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对解决耕畜不足的困难, 提出如下意见:

(一) 解决耕畜不足的办法, 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 在省、专、县范围内进行调剂求得解决。山西隰阳县采取大力改良本地牛种, 解决耕畜不足的困难办法很好, 各省、专、县应利用一切可能建立牲畜繁殖基地, 改良畜种, 供应境内耕畜的需要。

(二) 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凡有可能的应尽量利用荒山、草地, 利用瘠薄的砂碱红壤等荒地种植牧草, 建立小型牧场, 作为牲畜繁殖的基地。广西百色县两琶社采取这个办法, 建立了小型牧场, 不仅成为繁殖耕畜的基地, 而且成为役畜农闲休养场所。

(三) 保护现有耕畜, 改进饲养管理使役制度。推行分槽喂养和养用合一的制度, 已建有大圈棚的社, 也要以生产队或生产小组为单位集中喂养, 以就耕地之便, 以免耕畜来回跑路增加疲劳, 并浪费时间。在大圈棚集中喂养时, 必须把大圈棚分成若干小格, 一格一槽, 养畜一匹, 并指定专人饲养, 制定饲养管理使用

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无论大槽小槽,必须坚决改变大小强弱牲畜混在一起,致大欺小、强欺弱,造成弱小牲畜吃不上草,睡不足觉的严重现象。

(四) 切实解决饲草饲料不足的困难。例如适当的安排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的比例,制造青贮,碱化藁秆,利用休闲地抢种一季饲草和饲料。关于建立饲料基地的问题,各地可以试办,取得经验。农产品加工业应适当分散下放,以利于就近利用副产品作饲料。此外,中央城市服务部有计划地自牧区收购调运大家畜支援农区,是解决农区耕畜不足的办法之一,尤以目前极为迫切。

七 关于畜牧业有关的经济工作

加强经济工作,支持畜牧业生产,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改变耕畜不足的状况具有重大的作用。为此,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 统一耕畜、幼畜和肉用牲畜的经营。城市服务部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已取得一致的意见,今后耕畜、幼畜和肉用牲畜的经营统一由城市服务部门负责,望呈报国务院批准后,立即进行协商办理移交工作。各省、专、县党政领导应推动城市服务部门建立新的工作机构,承担统一经营的任务,加强采购人员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的教育。在经营中应参照耕畜历史流转方向和今天的实际情况建立购销和转运机构,深入交通不便的产区进行收购,改变集中在交通沿线收购现象;并在运输沿线设立草料站和骡马店等,以便牲畜转运。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国家领导下的牲畜市场,以便利牲畜的近距离交易。

(二) 收购规格和价格必须合理。产品收购规格应参照各地历史习惯,适应牲畜正常增殖淘汰规律,服从生产。收购价格目前一般是合理的,个别地区,个别品种的价格有不合理的,由地

方研究提出調整方案，經一定的機關批准後執行。注意克服收購牲畜和畜產品時的壓級壓價現象；耕畜不能只按肉的分量分級計價，應按齒口體格條件和服役能力計算價格。

(三) 加強經濟部門與生產部門的協作。採購人員根據農業生產部門和城市服務部門的統一規劃在農業部門的指導下，共同擔負畜牧業生產的技術指導工作和防疫工作等等，為畜牧業生產服務。採購機構和農業生產機構如何建立聯繫制度，由各省自行決定。

(四) 畜產品加工企業應接近產區。畜產品加工業應以小型企業為主分散到產區，就原料供應之便。目前尚未興建的加工企業，建議不再在城市建立，已在城市建成的畜產品加工企業加以研究，設置不合理的應逐步下放。

有的省（區）提出要求牧區建立畜產品加工企業的問題，望有關部門予以支持，收購當地的畜產品，就地進行屠宰、冷藏及其他加工處理。

(五) 做好生產資料供應工作，組織供銷經濟部門為畜牧業供應必要生產資料。牧區交通不便，運費大，若干手工業可以製造的生產工具，應就地生產就地供應。其他大型機械如打草機、剪毛機、打井機、提水機械和汽車等，望有關部門予以大力支援，組織供應。

(六) 發展交通運輸。草原牧區和山地牧區地區遼闊，交通不便，望交通部門協助牧區改善交通狀況。牧區交通應盡量利用畜力以馱載為主，修建驢馬驛道或大車道，必要時修築一些公路，作為干綫，以利汽車運輸。

八 加強領導全面規劃

加強領導和全面規劃是保證畜牧業生產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實現積極發展畜牧業生產，解決耕畜不足的重要關鍵，要求各地“黨委組織重視，書記負責，統一規劃，全黨動手”。對於畜

牧业生产,在牧区除了第一书记外,应有一个书记专管;在农区也应指定一个书记负责掌握,推动全党,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展畜牧业生产。根据畜牧业在当地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现有的编制中调剂干部,加强和建立相应的各级畜牧工作机构,充实与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加强畜牧兽医的研究工作。

制定各级畜牧业生产的规划。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制定农业生产规划,进行畜牧业生产的远景规划和一九五八年规划。制定规划以合作社为单位进行,但同时也要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相结合,制定逐级的畜牧业生产规划。规划中不仅要有各种畜牧的总增殖率,畜产品产量、纯增殖率和改良畜牧品种等指标,而且应有相应的基本建设、技术管理等措施。

目前全国农业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以兴修水利和养畜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为一九五八年农业大生产作好准备,畜牧业生产也不能例外,应大力保护牲畜过冬。有的灾区牲畜在当地过冬确有困难的,应有计划地转移一部分到区外过冬,特别注意孕畜、幼畜和母畜安全过冬。在春耕前做好耕畜的调剂工作,组织自牧区收购调运一部分大牲畜到农区,国营农场和牧场应尽量挤出一批耕畜,廉价出售,使缺少耕畜的地区得到一定数量的补充。切实做好按季节配种的准备工作,帮助合作社制订繁殖、保畜的奖励制度。采取切实的措施,巩固现有生猪生产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养猪业创造条件。

(编者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八日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农业部联合召开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会上提出了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参加会议的有内蒙、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等十四个省、自治区。邓子恢副总理在会上对畜牧业工作作了总结报告。)

高速度发展畜牧业

烏 兰 夫

一 畜牧业在国民經济中有很大的重要性,有高速度发展的必要

畜牧业在国民經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历来重視畜牧业,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时期,都曾經一再強調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并且規定了一系列的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的方針和政策。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和人民对畜牧业的需要日益增长,要求畜牧业实现更大的跃进。

畜牧业是农业生产的一个組成部分,农业和畜牧业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农业所需要的耕畜、役畜和肥料,大多来自畜牧业,因此,沒有畜牧业,农业生产就不能很好地得到发展。畜牧业的飼料,必須依賴农产品和农作物副产品,沒有农业,也就不能够很好地发展畜牧业。发展畜牧业是发展多种經營、实现农林牧結合、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农业产值的一种重要途徑。因为发展了畜牧业,就可以充分地利用农副产品,就可以取得畜力,取得肥料,取得乳品,取得肉食,取得皮毛,从而保証农业的增产,保証公社收入的增加。

人民对于肉、油、奶等所消費的数量多少,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粮食、棉花問題逐步得到解决,人民吃飽、穿暖以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肉类、乳品、脂肪、蛋类、皮毛,都要从畜牧业取得。同时,畜牧业的产品,包括肉类、毛类、皮革、乳品,都是輕工业的重要原料。为

着增加肉食的供应，发展輕工业的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必須使畜牧业不断地得到发展。

发展畜牧业，在內蒙古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畜牧业不但是蒙古族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所擅长的生产，而且是相当数量的人民群众的主要生产。发展畜牧业不但可以繁荣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經濟，而且可以增强各民族之間的团结，有利于逐步消灭少数民族人民在經濟、文化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逐步把少数民族提高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內蒙古自治区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和很大的潜在力量，可以建設成为我們国家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在这里，可用于发展畜牧业的自然草原有几十万平方公里，人民群众有經營畜牧业的經驗和优良的傳統。而逐步实现基本农田制和实行农林牧副漁五业的全綫大革命，将更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內蒙古的畜牧业，建国以来已經有很大增长。牲畜头数从一九四九年的九百四十万头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二千四百四十七万头，九年增加了一点六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而在解放以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三年間，仅增加了千分之三。

內蒙古自治区在解放九年来虽然以成百万头耕畜、役畜，几百万头肉畜，成亿斤羊毛，成千万張皮子，一部分乳产品，供应了国家，但是畜牧业的現状，还远远不能滿足需要。总结发展畜牧业的經驗，争取畜牧业的高速度发展，使牲畜头数大大增加，质量大大提高，畜产品大大增加，就成为內蒙古地方党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务。內蒙古自治区應該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对我們的偉大祖国更好地尽自己一分应尽的責任。

二 改造落后的畜牧业为集体經營的 畜牧业，是高速度发展的基础

对畜牧业經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的分散的畜牧业，

改造成為集体經營的大規模的現代化的畜牧业，是保證高速度發展畜牧业的基础。內蒙古牧区从試办合作社到实现人民公社化，大約花了七年的時間。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曾經反对了两种錯誤的观点。一种是“牧区特殊論”，认为牧区沒有階級，沒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在牧区不必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們在与內蒙古封建上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已經批判了这种观点，以后又繼續批判了这种观点，并且不断地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进行了階級教育。我們指出：牧区社会是个階級社会；在牧区采取不划階級、不斗不分的政策，不是說牧区沒有階級，沒有階級斗争。我們坚决地廢除了封建特权，实行了民主改革。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我們又指出，牧区的經濟，如同农业区一样，屬於个体的、分散的（有些还是游牧的）、落后的經濟范疇，这种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經濟，束縛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样是根本性质的斗争。

我們反对的另一种錯誤傾向，是忽視牧区的特点，忽視牧区的实际情况，把农业区的一整套作法，原封不动地搬到牧区。我們曾經多次地批判了这种思想。我們认为，从階級社会的基本方面看，从矛盾的普遍性看，牧区和农业区沒有本质上的差別。但是从牧区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和經濟特点看，从矛盾的特殊性看，牧区的階級結構和經濟状况同农业区都有許多差別，必須作具体的分析。应当从牧区的实际出发，逐步前进，既要把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針政策、基本原則和适合于牧区的經驗在牧区貫徹执行，又要采取和农业区不同的具体方針、政策、步驟和办法。从这个观点出发，在中央的指导下，我們在牧区执行了“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階級路綫和改造方針。根据內蒙古牧区合作化的实践，我們总结出几种办合作社的形式。这就是：

适龄母畜，計头入社，劳股、畜股按比例分配每年繁殖的幼畜和畜产品，其余牲畜，交社代放，畜主出代放费；

牲畜作价或评分折股入社，劳股、畜股按比例分益；

牲畜作价入社，付給畜股固定利息，除付息外，按劳分配；

牲畜作价入社，分期偿还。

对于牧主經濟的改造，則采取了加入合作社、办公私合营牧场、加入国营牧场等三种办法。

对于召庙的牲畜和其他生产資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稳妥的改造办法，参加国营牧场、合营牧场、合作社，都按自願。手工业者（鉄匠、木匠、銅匠、銀匠、泥瓦匠）較多的召庙，鼓励他們投資合办工厂，或者参加手工业合作社。对喇嘛医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充分发挥他們的作用，为社会服务。召庙的定息收入，由召庙主持人集議支配。在改造中，对于喇嘛，仍然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自願的原則下，組織他們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动員他們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参加合作社。对年老体弱的喇嘛并予以适当照顾。

在合作化的过程中，究竟采用哪种办法，应当因地制宜，按群众的自願。为照顾到群众的方便，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允許社員自留少量的奶牛、乘馬、役畜和食用羊。

由于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貫徹执行，由于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間开展了全党全民整風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反对了地方民族主义，由于两条道路、两条路綫、两种作風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由于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也由于我們采用的办法适合牧区的实际情况，一九五八年七月間，內蒙古牧区实现了牧业合作化。牧主也接受了改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喇嘛参加了合作社。

全国規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牧区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应人民群众对建立人民公社的迫切要求，及时地开展了牧区人民公社化运动。鉴于牧区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初級合作

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牧区的主要生产资料——牲畜不同于土地，劳动牧民中牲畜占有状况有较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在人民公社化中对经济问题的处理，采取了逐步前进的方针和多种的过渡办法。一般允许畜股有一定数量的分红或者定息，但是适当降低畜股分益的比例；条件成熟、群众自愿的，也采取按劳分配的办法。这些办法是：牲畜作价或评分入社、比例分益，畜股分益大约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牲畜作价入社，付给固定利息，除付息外，按劳分配；牲畜作价入社，分期偿还；牲畜作价保本入社，不付利息，按劳分配。对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也作了区别对待的规定，允许社员自留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少量牲畜。至于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及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等，目前还只是试点，在条件不成熟，经验未取得前，还不推广。执行这些方针和政策的结果，到一九五八年底，牧区的二千多个合作社已经改组为一百五十二个人民公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牲畜，都纳入人民公社的有计划的生产中。人民公社的规模，小的二三百户，一般四五百户，个别牧户居住集中靠近农业区的达到千户以上。一部分人民公社，已经实行按劳分配，大部分人民公社畜股仍然取得一定数量的报酬。这部分畜股报酬将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逐步降低和取消，估计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的增加和觉悟水平的继续提高，是容易解决的。

农业区的畜牧业，在合作化、公社化的过程中，也同样采取过渡的办法，归人民公社集体经营。

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在发展进度和政策执行上也曾经有过反复，出过若干偏差。但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都及时改正了。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和正常的，保证了畜牧业的稳定的发展。

合作化、公社化以后，过去那种单一经营的、分散的和小规模畜牧业生产状况，根本改变了。现在，人民公社已经显示了

它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許多人民公社除在打草、飼料准备、配种接羔、改良品种、盖棚搭圈、定居建設等方面，都做出了比往年更为突出的成績以外，还建立了各种小型工厂，开辟了飼料基地，进行了水利建設，开展了各种副业生产，购买了大型农牧业机具，組織了各种专业队伍，逐步实现定居。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牧区过去那种单一的畜牧业經濟，已为工农并举的、农林牧副漁相結合的、大規模的經濟所代替。因此，牧区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为高速度发展畜牧业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 发展畜牧业的方針和增畜保畜的措施

发展畜牧业的基本方針是：大力发展牲畜数量，提高牲畜质量，逐步实现农牧林結合和畜牧业的現代化。

要大量增加牲畜头数，必須正确解决积累和消費的比例。牲畜增长的速度决定于五个比例，即总增的比例、死亡的比例、群众食用消耗的比例、出卖的比例、純增的比例。其中基本的比例是总增、出卖和純增。总增殖率（即每一百头牲畜和每年繁殖成活的幼畜的比例）是衡量畜牧业发展得好坏的基本标志之一，因为只有总增殖率提高，社会物质財富才增多。純增殖率（即每一百头牲畜的总增殖数和扣除死亡、自己食用、卖给国家后的淨增数的比例）也应该作为衡量发展畜牧业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志。因为牲畜純增殖数量愈大，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就愈加雄厚。为了使总增殖率和純增殖率維持一定的比例，卖给国家的数量应该列为考核发展畜牧业的一項要求。因为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从內蒙古的实际情况看，据六年的計算，总增殖率的比例，大約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死亡大約占百分之五，群众食用消耗大約占百分之八到十，出卖大約占百分之五，純增殖率大約占百分之十一。照此推算，如果提高母畜的比例，加上一年两配、两年三配，把总增殖率提高到百分之四十

左右是可能的。如果死亡率降低到百分之三到四，群众食用維持在百分之八到十，卖给国家定在百分之五到六，純增殖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应该是我們努力奋斗的目标。按照这个道理，我們已决定把总增殖率、純增殖率、卖给国家的数量，都列入各級的计划和人民公社的计划。

提高牲畜质量，主要是进行牲畜品种的改良，提高牲畜的产品率。目前內蒙古改良的重点是发展細毛羊、奶牛、耕畜和役畜等大牲畜。

农牧林結合是保証畜牧业稳定的高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針。执行这个方針在农业区的重点是大量地有计划地发展畜牧业；在牧区的重点是发展水利和农业。牧区有了农业，就可以保証粮食飼料自給，保証畜牧业的比較稳定的发展，减少肉食的消耗，以較多的畜产品供应国家。发展林业大大有利于畜牧业，因为林业的发展不但可以改变气候，固定沙漠，防止災害，而且許多树木（如沙枣、梭梭、胡楊等）的树叶、嫩枝、果实，都是牲畜的好飼料。

畜牧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生产过程逐步机械化电气化，良种普及化，有科学的飼养管理和巩固的飼料基地，有足够数量的畜牧兽医科学技术人材为畜牧业生产服务。这样，畜牧业才能在高度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高速度发展，才能有高度的产品率和充分的畜产品的綜合利用。

为了全面贯彻执行这个方針，从內蒙古发展畜牧业的实践經驗看，应当全面实施“水、草、繁、改、管、防、舍、工”等八項基本措施。

水，就是发展水利。水草历来是发展畜牧业的根本問題。逐水草而居是久远年代以前游牧經濟的特点；那时候，要求是有水就行。現在不仅要有水，而且要有足够的水，干净的水。不仅打井，还要开渠，逐步做到牧場井网化，飼料基地有灌溉的水源。因此发展水利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草，就是解决飼草飼料問題。解决草的問題，首先是充分利用自然草原，合理利用牧場，逐步实现划区輪牧；建立打草地，保証有充足的飼草儲备。同时建立巩固的人工飼料基地，种植牧草，种植飼料，逐步改变完全依賴自然草原的現狀。充分利用自然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的最經濟的办法，但是如果不建立巩固的人工飼料基地，畜牧业就不能逐步摆脱完全依賴自然的落后状态，就不能保証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繁，就是提高繁殖率和成活率。提高繁殖率和成活率的基本办法，是保护母畜和种公畜，提高适龄母畜在畜群中的比重，爭取适龄母畜滿怀，力爭做到全配、全孕、全生、全活、全壯。山羊、綿羊逐步实现一年两次配种或两年三次配种，爭取多产双羔。适龄母畜占畜群的比重，內蒙古現在是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中牛馬約为百分之三十多，羊約占百分之四十六到四十八。做好工作，母畜的比重还可以提高。母畜越多，幼畜的增殖就越快。

改，就是改良品种。改良品种有极大的經濟利益，过去我們抓得不够。近两年已經改良二百多万只羊和一部分牛馬。改良品种不但要引进外来良种，尤其要充分發揮本地良种的作用。內蒙古改良的重点是細毛羊、奶牛和耕馬、耕牛。細毛羊主要是引进新疆細毛羊和苏联細毛羊，牛主要是用內蒙古三河牛，馬主要是用內蒙古三河馬和烏珠穆沁馬。为了改良品种，已普遍推广人工授精，每个公社都已經建立起人工授精站，开展了群众性的改良品种运动。

管，就是改善飼养管理。改善飼养管理，主要是加强放牧管理，实行专人专責制，合理分群，改进放牧方法，适时飲水，适时貼喂飼草、飼料，搞好臥場地，保証牲畜休息好。沒有好的飼养管理，要做到牲畜肥壯，繁殖成活率高，是不可能的。

防，就是防治牲畜疫病和防止狼災、兽鼠害等災害。防治疫病災害，主要是开展群众性的防疫运动，建立畜牧兽医站网，

充分發揮民間兽医的作用。防疫不但要注意防治烈性的傳染病，尤其要防治慢性的傳染病，如疥癬、內寄生虫等。历年来的經驗証明，死于慢性傳染病的牲畜，远远超过死于烈性傳染病的牲畜。

舍，就是盖棚、搭圈，建立厩舍。盖棚、搭圈，对于畜牧业有改善飼养管理和防备風雪災害的两种作用。我們大力提倡建立永久性的棚圈，力爭在短时期內做到大畜有圈、幼畜有棚。有了棚圈，又有了飼草飼料儲备，就可以抵御年年危害畜牧业最大的風雪災害，畜牧业就可以比較稳定的发展。

工，就是工具改革。工具改革，对于解决牧区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和逐步实现技术革命，有重要意义。牧区工具改革当前的主要内容是尽快实现水井水車化、水槽化，車輛軸承化，改良畜产品的加工工具，特别是乳品加工工具，改良打草工具和飼料加工工具。为了改革工具，我們已规划在短期內做到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有土車床和鉄木工厂，以便解决部分农牧业工具的修理改造工作。

为了实现上述基本方針和增畜保畜的八項措施，必須推行**定居**。由于历年推行定居游牧的結果，內蒙古牧区牧民，現在已有二分之一定居下来，四分之一已經实现半定居，还有四分之一仍然处在游牧状态。定居是随着畜牧业基本建設的发展，随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而发展的。人民公社化有利于根本改变牧区的游牧状态。不实行定居，很难搞好基本建設，也很难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可能在游牧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四 加强党的領導，开展高速度 发展畜牧业的群众运动

党的領導、政治挂帅、群众路綫，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保証。內蒙古畜牧业在解放以来得到很大发展，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澤

东同志偉大的民族政策和发展畜牧业經濟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結果。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不断的指示，使我們得以避免重大的偏差和及时克服缺点糾正錯誤。今后要求畜牧业的高速度发展，必須更好地貫徹执行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所規定的方針和政策，繼續加强党的領導，大搞群众运动。

加强党的思想領導，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发展畜牧业的方針政策，繼續破除迷信，反对保守，端正对于畜牧业的認識，是加强党的領導的首要工作。內蒙古的經驗証明，要高速度发展畜牧业，必須开展两条路綫的斗争，破除迷信，反对保守。为此，我們曾經多次批判了“牧业落后論”，“牧場飽和論”，以及“自然灾害不可战胜”，“牧区人少不能大量发展牲畜”，“农业区沒有发展畜牧业的前途”等等錯誤論点。这些論点都是从过去落后的經濟基础出发的，沒有看到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的現状。不破除这些陈腐的論点，就不能总结和推广先进的經驗，就不能树立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信心，也就不能鼓足干劲，力爭上游，高速度地发展畜牧业。內蒙古的經驗証明，要树立重視畜牧业的观点，需要經過多次的思想工作。我們曾經再三批判忽視畜牧业的“重农輕牧”思想，指出这是忽視地区特点、民族特点和經濟特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表现。但是这种忽視畜牧业的思想傾向，还是常常在我們工作中起作用。我們曾經再三批評孤立地发展畜牧业，不注意农牧林結合的思想傾向，但是这种孤立的片面的观点，仍然在一部分干部中时起时伏。这是在畜牧业发展的道路上，还不免走一些曲折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沒有思想認識上的一致，很难求得行动上的一致。因此，我們已决定在今年的整社中，对发展畜牧业进行一次鳴放辯論，为今后畜牧业的順利发展，在思想認識上打下一个比較坚实的基础。

加强具体組織領導，是加强党对畜牧业領導的又一重要問題。畜牧业是靠牲畜本身的繁殖来扩大再生产的，是一种比較

脆弱的經濟，有不同于农作物种植的特点。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損失，影响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因此，对于畜牧业的领导，不但要求要有正确的政策，而且要具体組織这些政策的执行，要檢查研究执行政策的情况和发生的新問題，及时加以解决。我們已決定各級党的领导机关，都必須有一个党委书记專責分管畜牧业，并且規定商业和輕工业部門，要把扶助畜牧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一項工作任务。在人民公社中，不但要有畜牧业的专业队，而且要有人專責领导群众性的畜牧业生产。不这样，也很难完成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任务。

大搞群众运动，是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重要保證。畜牧业历来是一种广大群众性的生产。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公社的集体畜牧业大大发展了，今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靠公社集体的畜牧业。发展集体經營的畜牧业，需要有人民群众的高度的积极性，使大家都来关心畜牧业，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来发展畜牧业。沒有普遍的群众性的积极性，集体畜牧业是难以发展好的。与集体經營相配合，群众性的社員家庭自养的牲畜，在相当长时期內仍然是需要和可能发展的。这种社員家庭自留的牲畜，虽然是小量的、分散的、有限度的，但是面很广，数量很大，它的发展对爭取畜牧业的高速度发展是有好处的。

必須重視畜牧业；在发展畜牧业中，必須充分發揮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是从內蒙古的實踐經驗来看，在具体工作中仍然有忽視畜牧业的傾向，有忽視群众积极性的傾向。畜牧业的发展至今落后于需要，固然与畜牧业相当长时期內沒有实现集体化和畜牧业的脆弱性有关，但是忽視畜牧业的重要性，对群众的积极性重視不够，在政策、步驟、作法上安排不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今后还必须反复的強調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充分發揮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把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群众运动普遍开展起来。

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 暫行办法(要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暫行办法”。这个办法已由国务院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三日命令发布，确定自一九五八年起开始实行。这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进，是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办法的发布和实行，将进一步发挥各民族自治地方管理財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适应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划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支范围，扩大他们的財政管理权限，以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这个办法的要点如下：

(一) 民族自治区的財政收入，包括原有地方企业的收入、地方事业收入、七种地方稅收（印花稅、利息所得稅、屠宰稅、牲畜交易稅、城市房地產稅、文化娛樂稅、車船使用牌照稅）、中央指定与地方实行分成的中央企业的收入和地方各种零星收入。除了这些收入以外，还将商品流通稅、貨物稅、營業稅、所得稅、农业稅、牧业稅、盐稅等收入全部划給自治区，作为自治区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在一般省市是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調剂分成收入的。对自治州、自治县，也比一般专区和县划給較多的收入項目，作为地方收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地方的財政能够有較大的机动范围，能够更好地安排本地区的收支。

(二) 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支出，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全部

經濟建設支出如工業、農、林、水利、交通、郵電、商業、鹽業、城市建設等支出，全部社會文教支出如文化、教育、科學、通訊、廣播、體育、衛生、優撫、救濟等撥款，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支出。

上述財政支出，包括自治區的基本建設投資在內，這和一般省市的基本建設投資由中央專案撥款是有不同的。因此，民族自治地方財政支出的範圍，也比一般省市要大一些。

(三) 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範圍，按照上述項目劃分以後，收多於支的部分，採取定額上解的辦法，五年固定不變，五年以內，經濟發展收入增多的部分全部歸地方。按照上述項目劃分以後，收少於支的，由上級撥款補助。上級補助的數額，按照民族自治地方建設事業發展和擴大的需要，每年予以變動。上述做法，可以使民族自治地方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多收多支，有利於擴大本地方的收入來源，統籌安排本地方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四) 民族自治地方的預算，在執行過程中，如果遇到重大災荒，可以由上級機關撥款救濟。此外，凡由上級指定新辦的事業或者由地方提出經過上級批准的建設項目，也由上級撥款補助。

(五) 為了適應自治州、自治縣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央對轄有自治州、自治縣的省，在計算支出基數的時候，可以適當地提高他們的基數，即是，在全省的支出總額以外，對自治州的支出總數增加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對自治縣的支出總數增加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這樣，就有利於省對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某些特殊需要作必要的照顧。

(六) 在稅收管理上，也給予民族自治地方較多的靈活處理的權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國家稅法的時候，對於某些在稅收上需要加以照顧或者獎勵的，可以減稅或者免稅，並且在必要的时候，還可以根据稅法的基本原則，結合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民族特點，制定本地方的稅收辦法。

此外，办法中还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该加强财政管理，逐步健全财政制度，认真培养管理地方财政的民族干部。上级机关也要经常了解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情况，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监督。

国务院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 讨论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 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的批复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告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和广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讨论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

同意报告中关于僮文方案的意见。僮文方案可在僮族地区逐步推行，在推行过程中应该随时总结经验，使方案更加完善。以后修订方案的时候，可由广西僮族自治区提出，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后实行。同意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五项原则，今后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方案的时候，都应该按照这些原则办理。

国务院

附：关于讨论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
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

国务院：

我们遵照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十八次会议上的指示，于十月十二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就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

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几項原則进行了討論。出席會議的，除文改會委員外，有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有關負責同志和專家三十餘人。現在把討論結果報告如下：

一 关于僮文方案的意見

新創制的僮文以僮語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鳴語音为标准音，共用了三十二个字母，即a、b、 \bar{b} 、c、d、 \bar{d} 、 \bar{e} 、e、f、g、h、i、k、l、m、n、 η 、o、 \bar{o} 、p、r、s、t、u、 \bar{u} 、v、y、2、3、4、5、b。

有两点需要加以說明：

(甲) \bar{b} 、 \bar{d} 、 \bar{e} 、 \bar{o} 、 \bar{u} 、 η 等六个字母是在拉丁字母基础上設計的。 \bar{b} 、 \bar{d} 是在 b、d 的上面加一橫，表示和 b、d 相当的浊音； \bar{e} 、 \bar{o} 、 \bar{u} 、 η 是国际音标，前两个字母在苏联已有一些民族使用； \bar{u} 是倒的 m，是 u 的延长； η 是 n 的变体，汉语拼音方案已用为 ng 的簡体。增加这些字母的理由是：

(1) \bar{b} 、 \bar{d} 、 \bar{e} 、 \bar{o} 、 \bar{u} 都反映僮語的特点，代表汉语标准音里所沒有的語音。汉语里虽然有 η 所代表的音，但是只用在音节的末尾，而在僮語里也可以用在音节的开头，同时还有像 ηv 这样双字母的結合，如果 η 的音用 ng 表示，則 ηv 就要用 ngv 三个字母表示。

(2) 僮文本可用 \bar{b} 、 \bar{d} 表浊音，用 p、t 表清音，但是如果这样，就要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系統发生矛盾，汉语的“bu”（部）僮文就要写成“pu”（鋪）；汉语的“dan”（党），僮文就要写成“tan”（躺）。这在教学和使用上会造成很大的不便，不如和汉语相同的音用相同的字母表达，僮語特有的浊音，另制 \bar{b} 、 \bar{d} 两个字母表达。

(乙) 沒用一般拉丁字母中的 j、q、w、x、z 而新制了 2、3、4、5、b 等 5 个专表声調的字母。这样做的理由是：

(1) 便于同系屬語言各民族文字的字母取得一致，因为如

果利用剩余字母，僮文的剩余字母未必就是其他民族文字的剩余字母；

(2) 将来如果在較长期的实践中証明声調符号可以省略的时候，也便于省去；

(3) 避免过多的輔音字母連在一起的拼写格式；

(4) 現在僮語里沒有和这五个剩余拉丁字母相当的音，为了避免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发生混淆，不用这五个字母表声調。如果将来僮語在发展过程中增加了和这些字母相当的語音，也便于采用。

总起来看，这个僮文方案(草案)在字母的用法上跟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上一致，而且能表达僮語的語音特点。

現在这个方案已在本民族中試用，到目前为止，共訓練了二千七百多名机关干部和二万八千七百八十名农村基层推行人員；在四千多个僮族乡里开办了一万二千二百多个群众学习班，組織了三十五万多人参加学习。現在，經過学习脱离了文盲状态的已有十万多人，在推行过程中，这个方案受到僮族群众的普遍欢迎。

我們认为，这个方案可以在僮族地区逐渐推行。这个方案，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以經過一个时期的实用以后再根据群众的經驗和願望考虑修正为宜。在推行过程中如需要个别的修改，可由广西僮族自治区提出，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二 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几項原則

我們根据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提出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几項原則，进行了討論。大家认为，少数民族創制或改革文字，應該多考虑和汉语拼音方案尽量靠攏，以便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并且同意以下五項原則：

甲、少数民族創制文字應該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原有文字进行改革，采用新的字母系統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乙、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语相同或者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

丙、少数民族語言里有而汉语里沒有的音，如果使用一个拉丁字母表达一个音的方式有困难的时候，在照顾到字母系統清晰、字形簡便美观、字母数目适当、便于教学使用的条件下，根据語言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以下的办法表示：

- (1) 用两个字母表达一个音；
- (2) 另創新字母或者采用其他适用的字母；
- (3) 个别情况也可在字母上加附加符号。

丁、对于語言中的声調，根据实际需要，可在音节末尾加字母表示或者采用其他办法表示或不表示。

戊、各民族的文字，特别是語言关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形式和拼写規則上应尽量取得一致。

以上意見是否妥当，請审核批示。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摘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周恩来

第三，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共有近五十个民族，其中有許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以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谚文的，还有用其他各种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字母作为基础呢？能不能就用汉字作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呢？过去曾经有人这样试过，没有成功，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的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許多兄弟民族都表示这样的愿望，就是要同汉族在字母上取得一致，以便于交流文化，学习汉语，和吸收汉语的名词术语。前几年，汉语采用什么字母还有些举棋不定，使一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也受了影响。现在西南区已经有十几个民族创造了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但是他们还是不大放心，因为我们的方案还没有最后定案。因此，汉语拼音方案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否则还要耽误人家的事情。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应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

該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盡量跟漢語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預料，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對於各兄弟民族的創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後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和溝通，將有極大的利益。

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 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摘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十日在第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吳玉章

第三是用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創造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許多兄弟民族，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有些虽然已有文字，但是还有缺点，需要改革。兄弟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如果各搞一套字母，打字、排字、电报等设备的供应会发生一定的困难，对于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将发生不利的影響。汉语拼音方案正式确定之后，就可以在各少数民族自願的条件下，用来作为創造文字的共同基础。这样，各民族文字吸收汉语詞汇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語言以及我国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学习和交际，都将得到很大的方便。

少数民族語文工作需要促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中国科学院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十六日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記得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間的第一次会上提出过一个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跃进规划,現在,这个规划已經基本上实现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处于新的高潮中,少数民族地区經濟建設大跃进的形势要求少数民族語文工作也要赶上形势的发展。这次會議提出了“总结两年来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經驗,貫徹执行国务院批准的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五項原則,鼓足革命干劲,实现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大跃进”的任务是适时的。

少数民族語文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語文工作者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几年来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这对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結,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經濟、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和政府曾經用很大的力量来組織語言的普查工作。近两年,由二十多个民族七百多人組成的七个少数民族語言調查队,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規模巨大的工作,現在已經有三十三个民族的語言普查工作基本上完成。語言的普遍調查为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問題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語言的科学研究准备了条件。只有认真地作好語言的普遍調查工作,才可能在少数民族語言的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結論,因而才能够正确地貫徹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地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問題。

經過語言的普遍調查以后,現在我們已經帮助十一个民族

設計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幫助傣族改進了原有的文字方案。在這些新文字方案中，僮文已經國務院批准正在推行，其餘文字方案也正在實驗推行或準備實驗推行。因為有了適用的文字，各民族已經在掃盲、普及教育等工作上獲得了成效，對於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還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進行少數民族語言普查和文字方案設計的同時，幾年來已經培養了三萬多語文工作幹部，大大提高了原有的科學工作者的業務水平，成為一支推進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巨大力量。

為了互相學習，交流經驗，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我們各民族需要一種拼音字母作為各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漢語拼音方案的公布解決了這個政治原則問題。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今後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礎，並且應該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盡量跟漢語拼音方案取得一致。”這是完全正確和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的。一九五七年國務院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關於討論僮文方案和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的報告的批復中，批准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五項原則，就是具體地解決少數民族文字字母形式的規定。這五項原則是幾年來民族語文工作的經驗總結，它不僅作為設計文字字母的準繩，而且也是指導整個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原則。

少數民族語文工作在我國還是一門年輕的社會科學，要解決它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必須解決科學工作者的階級立場、思想方法和對少數民族語文工作原則的認識問題。過去幾年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成就是很大的，語文工作者是努力的，這點應該肯定，但是缺點和錯誤也不少。這次會議在總結經驗，肯定成績的同時，尖銳地批判了語文工作中存在着的脫離政治、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現象，說明了這一點。

在少數民族語文工作和語文工作者中存在着兩條道路和兩

种思想。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些人强调语文工作中的“异”“分”“纯”，就是资产阶级观点的具体表现。所谓“异”就是夸大语言间的差异性，抹杀其共同性，好像语言差别越大越好，语言种类、文字种类越多越好。所谓“分”就是看不到文字对于一个民族内部和各民族间所起的团结作用，强调一个民族内部不同方言使用相同的文字方案的困难，强调语言基本相同的民族采取“文字联盟”的困难。所谓“纯”就是强调语言“纯洁化”，看不到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和各民族人民相互间日益接近的情况。事实上，所谓“纯”就是要从语言中排斥群众已经使用的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而把自己的民族孤立起来。实际上，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互相学习，民族语言的互相借词，这不是否定了本民族优良的东西，而是更加充实和丰富了民族文化，这是民族语言的发展。这不是可怕的事，而是值得欢迎的好事。

有些人不顾少数民族人民对语文工作当前的迫切需要，热衷于“一本书主义”，关起门来著作。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把大家调查的资料密封在“小仓库”里，视为“科学机密”。或者把某些研究题目壟断起来，作为“自留地”，不许别人问津。有些人在工作中不愿走群众路线，不愿深入农村，不愿了解群众的语言，不愿有组织地进行工作，只愿当“单干户”，或者是由少数人开“股份公司”。这次会议针对着这些错误都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因而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解决了思想问题也解决了工作问题。

由于大家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工作热情也大大高涨了，因此这次会议能够根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提出了今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大跃进的规划。规划要求苦战三年，争取在一九五八年内帮助需要创造文字的民族完成文字方案的制定工作；在一九五九年内帮助不需要单独创造

文字的民族完成确定和选择一种适用的文字的工作；在一九六〇年前帮助需要改革文字的民族初步提出文字改革方案。

这个规划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他们将尽一切努力，支持这个规划的完满实现。几年来少数民族工作已经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并且有了一批语文工作者和专家，特别是有了设计文字方案的五项原则，这些都是实现规划有利条件。

要实现这个规划，最重要的要发挥人的作用。语文工作者要赶上形势，在实现这个规划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必须在整风中烧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鼓足干劲，奋勇前进，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科学工作者。语文工作者和科学家必须到火热的实际生活中去依靠少数民族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作好语文工作。

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进展，需要各方的关心和积极帮助。这个工作需要大家来促进。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应该加强对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领导，各地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和民族事务机构应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并且采取措施，保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规划的实现。

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道路 的斗争问题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国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汪 鋒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首先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民族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的民族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将把党内外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力量进一步地组织在一起,更有计划、更有系统地开展民族研究工作。这不仅是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我国民族工作方面的一件大事。因而,它特别值得我们高兴和庆祝。许多问题潘梓年同志已经讲到了,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对于民族科学研究是一个外行,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民族研究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个人的意见,只是提出来作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研究民族问题,早在党的创始时期就开始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了民族研究机构,民族研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解放以后,同全国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民族研究工作也有了巨大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这个工作的参加者,特别是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和人大民族委员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同志们,对这一方面的

情况知道得很清楚，体会也更深刻，因此这方面的問題我就不再細談了。有的同志认为过去几年在民族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給我們今后民族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創造了良好的条件，我看这个估計是公平的、正确的。民族研究工作的成績是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也还存在許多問題，值得我們研究解决。通过几年来的工作，特别是从这次科学討論会揭发出来的問題来看；除了工作上的一般缺点和錯誤外，我感到严重的是一些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的人員，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爭問題。这在同志們的大字报里边反映得非常清楚，揭发的問題也比較惊人，在个别人的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正是由于有两条道路的斗爭，有两种思想、两种人生觀，因此，在民族研究問題上就有許多問題还值得进一步討論和研究。必須要統一对民族工作、对民族研究工作的正确認識。就像这次科学討論会上同志們指出来的，有不少的人在民族研究工作中的脫离政治、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錯誤傾向还較为普遍。这种錯誤傾向的根源是和一部分同志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錯誤思想分不开的。这些都严重地妨害了民族研究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如果不及时克服，就会带来更多的損失。

什么是脫离政治脫离群众脫离实际呢？不及时的加以克服会有什么結果呢？許多同志的大字报都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同志們說得很对，這個問題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不彻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研究結果，也决不会提供出有科学价值的和符合四千万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利益的作品来。

1. 我所說的脫离政治，首先就是脫离党的領導。这一点很重要。許多作調查研究工作的同志离开了党的領導，不尊重地方党委的意見，不願意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做工作，不願意与地方党委联系，事前不請示，事后不报告等等。这些同志在嘴巴上

虽然也在說“要跟共产党走”，但是实际上他沒有这样做。試問离开了党的領導，跟党走还有什么內容呢？同志們可以回忆一下，从解放以前的爱国反帝，到解放以后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以至到現在还没有結束的整風，無論那个运动，那一項工作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和取得胜利的呢？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党的領導，还能不能够正确地跟着共产党走呢？肯定的說，是决不可能的。在民族研究工作方面，許多同志辛辛苦苦地进行了工作，如果說他們完全沒有跟着党走那是有点冤枉的，但是至少在这一方面的認識还有不够的地方。脱离政治的另一种表現是离开了党的民族政策。如果离开党的民族政策，还怎能設想做好民族研究呢？脱离政治的再一种表現是离开了党的政治运动。主席常說，我們是不断革命論者，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这样来提高我們的思想，提高我們的認識。可見，如果离开了各种政治运动，思想認識就不可能提高，而民族研究工作也就一定不会做好。

2. 脱离群众：同志們都知道“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这个响亮的口号。但是在我們的民族研究工作中却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現象。許多同志不向群众学习，关着門坐在屋子里研究問題，不願意依靠群众，不懂得群众有无穷无尽的智慧，总觉得群众不如自己有知識，不如自己有學問。因而不相信群众，遇事不跟群众商量，甚至不願意到广大群众中去調查。由于不相信群众，因而对群众提出来的問題就不能加以分析和提高，也不能做到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自然也不会把我們看成自己人，不会相信我們是替他办事的。試想，如果离开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还怎能設想做好民族問題的調查研究呢？

3. 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主要表現是用主觀主义的方法，用个人脑子想出来的問題硬在調查中去加以証实，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調查实际情况。正如同志們所揭发的，如有的人不向广大劳动人民調查，专找少数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去調查，有的人不去

調查階級關係經濟情況，而專去調查那些無關緊要的奇風異俗，甚至專門調查一些下流的低級趣味的男女關係。總之，不是以馬列主義的觀點去作調查，而是用一種資產階級的非常庸俗的觀點去調查和研究問題。民族研究工作怎样才能不脫離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向廣大的少數民族勞動人民調查還是向少數的上層人士調查？調查什麼？怎樣調查？這是立場問題，是給什麼階級服務，是破什麼，立什麼的根本問題；絕不是調查方法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今後工作極需解決的問題，在民族研究所成立的時候，同志們提出了這些問題，並且積極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應該解決的關鍵性的問題。

政治掛帥。任何工作脫離政治都是不可能作好的，學術研究沒有政治，當然也是作不好的。出席會議的同志對於脫離政治的情況曾作了認真的檢查批判，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方向。經過這次會議對每個人來說都會提高一步。會上許多同志對民族主義思想，對舊的資產階級民族學的思想，舊的資產階級的調查研究方法等等都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揭發和批判，有這些錯誤思想的不少同志都作了認真的檢查，表示要“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紅旗”，“插社會主義紅旗”，這些作法都是正確的、必要的。因為許多問題孤立地看起來是一根頭髮，抓在一塊兒就是一把頭髮。許多觀點許多思想方法結合起來就會構成一個路綫，就會構成一個民族研究工作上的路綫。因此必須對這些錯誤的觀點思想方法加以認真的批判。

當然，我們所說的民族研究工作中的兩條路綫、兩種方法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基本問題、關鍵問題是立場問題。凡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經常為剝削階級着想的人，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一個民族主義者，無論是大漢族主義者，或是地方民族主義者，也絕不可能代表任何民族的利益，沒有一個政治工作者（當然民族工作者也在內）能夠脫離階級，而不為階級服務的，不是無產階級，便是資產階級或者其他的剝削階級，

超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不存在的。要堅定無產階級立場，就必須有明確的高度的嗅覺，辨明大是大非，辨明正確與非正確，辨明香與臭。立場問題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指出了六條，每一個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都應當堅持并特別注意學習力求達到這些標準。這六條的第一條是：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這對於作民族工作的同志特別重要，必須很好學習和體會。在民族研究工作中要克服“三脫”現象，這六條對我們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從個人來講，在自己的頭腦中應該經常認真地批判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因為無論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有其歷史根源，有其長期性複雜性，不可能在一個會上一次批判就解決所有的問題。

黨對於幹部的要求是紅透專深，不是只紅不專，也不是只專不紅。要紅透要專深，這些問題就應該徹底搞清楚。這是我們每一個幹部努力的方向。紅透專深的奮鬥目標對民族研究工作來說也不能例外。必須使我們成為民族工作的專家。必須鼓足干劲力爭把民族工作作好。每一個民族研究者都應該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密切和群眾聯繫，時刻的接受黨的領導，這樣才不致於犯錯誤或者少犯些錯誤。

研究民族問題，首先，應該有利於解決民族團結統一問題。我國各民族經過了改革、改造和整風反右等種種鬥爭，民族團結是更加鞏固了，但是，也不能否認，一些民族的長期的歷史隔閡還沒有完全消滅，而一部分民族內部的隔閡也還沒有最後消除。研究民族問題的目的就在於解決這些民族隔閡，加強民族團結，並且發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從而解決各民族間存在的在經濟上文化上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問題。民族問題的研究必須與民族工作密切地結合起來，研究的目的是要有利於民族團結，有利於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無論研究歷史和現況都應該從廣大的勞動人民着眼。民族研究所就是在那種意義上成立的，它的最基本的任務就是要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為少數

民族的劳动人民服务。毫无疑问，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因此在研究的方法方面，必须与少数民族人民打成一片，彻底克服不相信群众的观点。我们要求每一个民族工作者都要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破个人主义，立集体主义。在民族工作方面，研究民族问题的人往往容易认为这是一个独行，别人没有发言权，只有自己是专家。例如，少数民族语言所虽然成立不久，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有的人为少数民族创造了文字，就想把持一方，只有自己是权威人士，别人都不能插手。民族研究所成立以后也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权威思想，个人名利思想，钻冷门的思想，“小仓库”思想，把持材料不拿出来供给大家看以及不安心工作等等，这都是个人打算，都应该在工作中认真地并且经常地和这些思想作斗争，要彻底检查和批判，要坚决地树立集体主义。上面已经谈过，个人主义有它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因而要彻底克服就需要作艰苦的努力。对个人主义必须采取坚决批判和克服的态度，绝不能让它发展。有个人主义思想毛病的人，都应当认真地对待同志的意见，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原谅自己的错误。个人主义不克服，总要暴露，只要土壤气候适合它就冒出来了，所以必须认真批判个人主义。还要求每一个民族工作者必须破民族主义，立社会主义。汉族要破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要破地方民族主义。只有破了民族主义才能够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则是损害和分裂祖国的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在对党所抱的态度方面，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是拥护党的领导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是反对党的领导的；这是两个对抗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分歧。民族研究工作者必须经常地检查自己，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如果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某些落后现象加以歪曲加以夸大，甚至对少数民族人民加以歧视，加以侮辱，这当然是错误的，是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少数民族在

經濟地位上還有某些落后的地方，不願意進步，不願意接受進步，固步自封，把一些落后的事實描寫成爲革命的進步的，甚至故意抹煞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這當然也是錯誤的，是地方民族主義。在這一方面必須經常警惕，保持清醒的頭腦，任何爲反動統治者作辯護的作法，都是同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東西，任何爲地主階級、封建剝削者作辯護的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對於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特別要採取正確的观点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說，過去的歷史和歷史材料，有真有假，半真半假，甚至是全假的。因此，有些歷史材料的翻案是難免的，對於這些材料都要大而認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不適合民族發展，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都應當加以批判。要全面地看問題，不能片面地看問題。例如對於歷史上的少數民族起義和叛亂問題，把起義說成起義是對的，把叛亂也說成起義就是不對的；把少數民族統治階級掀起的反對別的民族的事實說成起義，就不合乎事實，也不合乎歷史發展規律。必須懂得，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長期以來，我國各民族人民即用辛勤的勞動，共同開拓了祖國的疆土，創造了祖國的歷史和文化。無論那個民族的歷史，都是祖國歷史一個組成部分。各民族人民的親密團結，互助合作，是構成我國歷史的主要的一方面。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仇殺事件，必須要記在各民族統治階級的賬上。不應該把歷史上所有漢人對少數民族的歷次用兵不加分析的統統都說成是反動的。不能這樣。應該加以分析，它有反動的一面就是一面，反動的两面就是两面，反動的三面就是三面，剩下還有一面不是，那也應該肯定它不是。這些問題都還可以爭辯。許多在民族研究上存在的問題，都應該分析來看。任何革命如果他殺了異民族的勞動人民，就是反動的，如果他殺了異民族的反動統治階級，那不算坏事，因為是反動統治階級，是剝削階級，不應把觀念混淆起來。如果歷史上的許多問題搞得不清楚，那麼我們的民族問題，將來就沒有法子來研究。在這個民族來說是英雄，在那

个民族来说是侵略者，应该客观地看待研究这些问题。民族研究所将来会遇到和发生这些问题，要慎重一些，下结论不妨慢一些。民族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可能说不犯任何错误，我们准备犯错误，但是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真正为研究，用正确思想方法研究，发生错误是难免的。如果别人对了，我们错了可以改过来，接受正确的意见，也不要怕犯错误，怕的话什么东西都不敢研究了。要有创造精神，要破除迷信，要解放思想。要作好工作，认真的研究。应该组织一批力量，特别要注意在青年中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民族研究干部。

最后，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一年内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三套丛书的计划，我认为这个计划是很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同志们的干劲是十足的，是完全符合总路线的，我们给50个少数民族写简史简志，写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这是给4,000万少数民族人民办好事。搞好了，不仅是受到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赞成，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良好的影响；搞不好，也会遗臭万年。是流芳百世呢还是遗臭万年？应该是流芳百世。这是一件大事，跃进计划很好，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时间虽然紧迫，但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在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下，加上同志们的努力，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祝同志们健康！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 和今后党与国家在民族工作 方面的任务(摘要)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所作报告)

民族事务委员会 汪 锋
副 主 任

汪锋在报告中首先谈到自一九五七年开始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形势的到来，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他说，据统计：一九五八年少数民族地区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做到粮食自给，每人平均都约有八百多斤，有些地区还更高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七年即比解放初期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一一点五，而一九五八年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四。畜牧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以内蒙古和新疆为例，一九五七年即有牲畜四千二百七十多万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以上，而一九五八年这两个地区的牲畜又比一九五七年纯增了四百万头，其他少数民族牧业区的牲畜，也都有显著的增加。在工业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原来的工业基础是很薄弱的，有些甚至连很简单的手工业也没有。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更是突飞猛进，遍地开花。仅新疆、广西两自治区，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即建成大小厂矿两万多个，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厂矿也正在成千上万地建立起来。工业

生产的大跃进,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县,都有了一所或几所中等学校;各自治区和一些自治州还相继建立了高等学校。在医药卫生方面,各自治地方的县市,一般都有了自己的卫生医疗机构;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也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展开。实践证明: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适合于各民族地区的情况的。

汪锋接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各民族人民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各民族地区又出现了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除了西藏和某些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都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毫无疑问,它的普遍建立和发展,将在更大规模上加速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并为各民族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

与此同时,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在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的牧业区和四川、云南的藏、彝族地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在一九五八年内继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事实证明,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某些尚未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可以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同时去加速完成改革和改造任务的,并且可以搞得更彻底一些、更好一些。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给这些地区的社会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改革任务的完成,社会改革任务的完成又给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增强了基础,从而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实现。

在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展开了反对宗教中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个斗争中,由于揭露了宗教中压迫、剥削制度的严重危害,由于揭露了宗教界的许多坏人坏事和若

干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因而都积极要求从宗教的压迫、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还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不良风俗习惯的大改革。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许多不利于生产、不利于民族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少数民族中的陈规陋习,都被人民群众所革除。许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民族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风俗习惯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新的社会风气和习尚正在逐步地树立起来。这也是各民族人民群众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必然结果。

汪锋指出:由于以上的发展,在我们国内民族关系方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的特点是: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大协作、共同劳动、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形成和发展。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同一人民公社和同一工厂、机关、学校内部的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劳动上,而且表现在各个人民公社、各个工厂、机关、学校和各个民族地区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协作、共同发展上。在去年的大跃进中,各民族地区和各人民公社及各工厂之间从生产资料、技术力量到劳动力方面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是很普遍、很突出的,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同时,由于内地青壮年愈来愈多地调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建设工作,这对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是极为有利的。以上的种种条件,就使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多;联系愈来愈密切,从而也就使民族间的共同性愈来愈多,差别性愈来愈少,民族融合的因素正在逐步增长。民族融合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对于这种趋向,我国各民族人民都应该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并且应该积极地加以促进。(这里应当说明: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的因素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才发生的,它是在历史上早就存在着的。但是,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或称同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自然的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規律，是我們所歡迎的。另一種是在民族壓迫制度下的強迫同化，這是一種民族壓迫的表現，是我們從來就反對的。我們所說的民族融合，不是強迫同化，而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各民族之間的自然融合。）

汪鋒總結過去一年多的情況說：一年多來，少數民族中的發展變化是很巨大的，對此應當有足夠的估計和認識。但是，絕不能因此就認為我國已經沒有民族問題了，在我們的工作中也可以不再注意民族關係和民族特點了。應當看到，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一般還比漢族地區較為落后，個別地區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在民族關係方面，還有帝國主義和各民族中一些不願放棄剝削的剝削階級分子的挑撥和破壞，同時，在各民族勞動人民內部也還會發生種種新的問題。因此，黨在國家在民族問題方面還必須繼續加強工作。任何忽視民族問題和民族工作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必須加以防止和克服。

汪鋒闡述了今後黨和國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務是：繼續向各民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不斷地鞏固祖國的統一和發展各民族間的團結合作，在繼續完成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提高、發展人民公社的同時，積極地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努力做好動員內地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在今後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使我國各少數民族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都能夠趕上或者接近漢民族的發展水平，共同建成社會主義。

“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毛主席）如果沒有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的。因此，黨和國家在民族問題方面，過去是，現在是，今後仍然是把祖國的統一和民族團結列為首要的任務，經過過去幾年的工作，特別是絕大部分少數民族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以反對

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風运动，我国各民族間的团结統一已經大大增强了。但是我們还必須在这方面作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民族間的团结統一更加加强和巩固，以适应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不断跃进的发展形势。为此，必須經常注意向各民族人民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繼續克服和防止形形色色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加倍警惕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发生的民族关系問題。

汪鋒說：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少数民族地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經途徑。現在，絕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也还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沒有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这些地区，除西藏地区仍然执行六年不改的方針外，都应当依据条件，加速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积极实现人民公社化。不仅必須在所有制方面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还必須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已經建立了人民公社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必須不断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

汪鋒說：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发展各民族的經濟和文化，这是促进民族繁荣的根本問題。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必須貫徹党中央提出的几个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努力发展工农牧林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使自己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設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經濟、文化的发展要靠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的艰苦努力，但是也离不开国家和汉族人民的支援。过去几年，国家和汉族人民已經給少数民族以多方面的帮助，今后将根据需要和可能的条件，繼續給以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支援。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我国各民族人民都应当加强全国一盘棋的觀念，应当貫徹統一領導，重点建設和分工协作的原則。虽然国家将尽可能

的逐步增多对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事业的援助，但是在最近几年内，因为国家集中力量于重点建设，对一般只能有所照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交通等各项事业，除了属于重点建设以外，国家暂时还不可能有更多的投资。应当向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讲清这方面的道理，使他们懂得，大的建设项目的分布是根据资源、交通等条件来决定的，而且无论分布在什么地方，都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的财产。这方面的任何地方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思想都必须加以防止和克服。

汪锋又说：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不论在任何工作当中，都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在民族工作中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在执行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各项任务时，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并且通过群众运动来进行。只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彻底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胜利完成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伟大历史任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群众运动的一种良好形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群众运动中，必须充分的正确的加以运用。

汪锋最后强调说：党的领导是一切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决定条件。任何工作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取得胜利，任何部门，离开了党的领导就必然迷失方向。民族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必须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从胜利继续走向胜利。九年以来，我国民族工作方面的巨大成就，就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之下获得的。今后要继续完成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彻底解决我国民族问题，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少数民族人民和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应当经常注意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地提高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对于任何忽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都必须及时地加以纠正。

第三輯

政府工作報告(关于民族工作部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第二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

周恩來

在民族工作方面,过去四年中,政府根据宪法的規定,在保証国家統一、实现民族平等的原則下,繼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已經收到很大的成效。除了原有的內蒙古自治区以外,先后成立了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并且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此外,还在青海、甘肃、新疆、云南、四川、貴州和其他若干省、自治区內成立了二十九个自治州,五十四个自治县。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包括三十几个民族。

在少数民族地区內,除了西藏和其他很少一些地方以外,都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許多少数民族昨天还受着封建制度甚至奴隶制度的束縛,今天已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他們真正是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在一九五八年,少数民族的經濟和文化,也有了巨大的跃进。据統計,內蒙古、新疆、广西、宁夏四个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八,粮食产量也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三。全国少数民族的学生数目增长得很快。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小学生有三百一十九万人,中等学校学生三十一

万人，高等学校学生一万六千人。在全国的三千六百万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学生总数达到三百五十一万人。同解放前比较，小学生增加了六倍以上，中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七十九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十七倍。有许多过去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现在已经制定了文字方案，有了用自己的文字出版的书籍和报纸。

由于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以及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已经大大加强了。在汉族干部中，多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大汉族主义倾向的斗争。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整风运动中，也进行了反对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经过整风运动的锻炼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实践，觉悟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在他们中间，大批的先进分子正在生长起来。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可靠力量。

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开始侵略中国以后，一贯企图瓦解中国的统一，破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使中国各民族的最大多数人民深切感到他们的共同命运，感到统一的国家的可贵。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把国内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各族的爱国人民从历史事实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在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各民族才能兴旺起来。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民族压迫，并且正在努力消除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的残余心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较发达的、强大的民族总是竭力使别的民族保持落后状态，以便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形恰恰相反。在我们的国家里，各个民族不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比较先进的、居于多数地位的民族有责任帮助比较落后的、居于少数地位

的民族，使大家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政府已经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这一措施，受到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

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方针历来是明确的。我们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主张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中央人民政府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且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根据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应当团结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鉴于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情况，我们曾经允许西藏的改革可以放慢一些，让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继续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企图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分裂祖国，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保存西藏的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他们根本不想实行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一贯阻挠西藏自治区筹备工作的进行。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国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的叛乱行为立即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且首先遭到西藏的广大人民、包括许多爱国的进步的上层分子的坚决反对。这些反动分子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他们不知道，帝国主义摆布中国内政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现在，西藏的局势已经完全在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在

西藏僧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正在继续扫荡一些流窜在偏僻地区的残余叛乱分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开始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关于西藏今后的社会改革，将由中央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以决定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骤和办法。无论如何，改革将在充分照顾西藏特点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在改革过程中将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和发扬藏族的优秀文化。达赖喇嘛虽然已经被劫往印度，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摆脱叛乱分子的挟持，回到祖国来。

西藏反动分子常常装出一付虔诚的模样，说是希望人们同登天堂，但是，他们自己却把西藏变成人间地狱，并且想使西藏人民永远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陷于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野蛮、更加残酷的黑暗深渊。他们也常常装出爱好和平的模样，但是，他们实际上却指使匪徒烧杀淫掠，残害群众，并且到了最后，他们自己竟敢疯狂地发动武装叛乱，因而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两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騙裹胁参加的，而且还包括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谓康巴人。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共有一百一十几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那一部分人。是同情一百一十几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这里所说的好心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们），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如果人们认识了西藏内部的真实情况，就应当同情受旧制度压迫的绝大多数的西藏劳动人民，同情他们的社会改革的要求。由于西藏反

劫派叛亂的失敗，西藏人民現在已經有可能擺脫農奴制度的枷鎖，實現民主自治和社會進步的願望。他們將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幫助下，逐步地把西藏高原建成一個真正的人間樂園。這對於西藏人民、全國各族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藏族人民的真正同情者，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事情啊！

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西藏反動分子的叛亂和這一叛亂的平定，是中國的內政，甚至力圖侵略西藏的帝國主義者也无法否認這一點。西藏叛亂事件發生以後，以及達賴喇嘛被叛亂分子劫往印度境內以後，我們偉大的友好鄰邦印度尼赫魯總理連續發表了不干涉中國內政和繼續鞏固中印友好關係的聲明，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中印兩國有兩千多年的友好歷史，並且同是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家，我們兩國都沒有任何理由因為西藏的一小撮叛亂分子而動搖互相間的友誼和兩國共同遵守的外交原則。的確，在西藏叛亂失敗以前，西藏的反動分子和某些外國的反動分子，曾經利用中印邊界的某些地區，進行破壞我國統一和中印友好的活動。但是，這些反動分子的打算現在已經落空了。我們希望，隨着西藏叛亂的平定，通過中印雙方的共同努力，亞洲兩個共有人口超過十億的偉大的和平國家的友好關係，將獲得更加鞏固的基礎和更好的發展。那些蓄意破壞中印友誼的人們的一切惡意挑撥，不過是枉費心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查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叛乱，残害人民，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并且于三月十九日夜間指揮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发动全面进攻。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統一的行为，实为国法所不容。为維護国家統一和民族团結，除責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軍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員达赖喇嘛·丹增嘉錯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尔德尼·却吉坚贊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职务。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員帕巴拉·卓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員；常务委員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員兼秘书长。撤銷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夏苏），宇妥·扎西頓珠，赤江·罗桑益西，噶章·洛桑日增，达拉·洛桑三旦，凱墨·索南旺堆，絨朗色·土登諾桑，帕拉·土登为登，欧协·土登桑却，朗色林·班覺久美，敏吉林·嘉祥坚贊，呷日本·才旺多吉，龐球，威薩坚贊（功德林扎薩），貢噶喇嘛，楚普噶瑪巴·日貝多吉十八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員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別給予惩处。并任命邓少东，詹化雨，惠毅然，梁选賢，崔科·登珠澤仁，詹东·洛桑朗杰，噶登赤巴·土登滾噶，坚白慈里，阿沛·才丹卓噶，多吉才旦，协繞登珠，坚贊平措，洛桑慈誠，群覺，平措旺秋，王沛生十六人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員。望西藏自治区筹

备委员会，领导全藏僧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巩固国防，保护各民族人民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此令。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間在拉薩向人民解放軍駐軍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队奉命討平叛乱，已在二十二日彻底地粉碎了拉薩市区的叛匪。現在我軍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繼續向西藏一些其他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蕩中。

为了维护祖国統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三月二十八日发布命令，除了責成西藏軍区彻底平息叛乱以外，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薩的武装叛乱，三月十日就开始了。达賴喇嘛原定在三月十日到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礼堂看戏。到軍区礼堂看戏的事，是达賴喇嘛自己在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三月十日这个日期，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西藏叛乱集团到了这一天，却大肆散布西藏軍区部队要扣留达賴喇嘛的謠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賴喇嘛，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且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員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軍区藏族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等人。叛乱武装同时包圍了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司令部和中央駐在拉薩的机关。

西藏叛国分子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这些叛乱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自从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

解放軍進駐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以來，他們就蓄謀撕毀這一協議，準備武裝叛變。由於祖國日益繁榮昌盛，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政策正確，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紀律嚴明，受到西藏各界人民熱烈愛戴，這一小撮反動分子的叛亂陰謀在藏族人民中得不到支持。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規定，歷來堅持國內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團結，在西藏實行民族地方自治，這是西藏人民所熱烈歡迎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早已於一九五六年四月成立。但是，由於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動分子的阻撓，自治區的籌備工作很少進展。十七條協議中規定藏軍要改編，西藏社會制度即農奴制度要按照人民願望加以改革，這兩項重要任務，都因為反動分子的阻撓，不能實現。中央為了等待這些反動分子的覺悟，還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告訴他們，在六年內，即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可以不進行改革，也不改編藏軍。

西藏地方政府，藏語稱為噶廈，委員六人，稱為噶倫。在六個噶倫中，兩個是愛國分子，即阿沛·阿旺晉美和在三月十日被叛匪打傷的桑頗·才旺仁增。其餘四人中，宇妥·扎西頓珠已在一九五七年叛離祖國，逃往叛亂分子在國外活動中心的噶倫堡；另三人即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夏蘇），在這次也已經公開叛變。在這以前，這些叛國分子即已利用他們在噶廈中的合法地位，糾集上層反動勢力，勾結外敵，實際指揮康藏兩地一些最反動的大農奴主，在雅魯藏布江以東、以北、以南若干地方，組織叛亂武裝，反對中央，背叛祖國。他們的叛亂是受帝國主義、蔣介石匪幫和外國反動派策動的，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噶倫堡，其領袖為被撤職的前任藏王（藏語稱為司曹）魯康娃·澤旺饒登。他們的武器，不少是從外國輸入的。在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叛亂根據地，就有多次接受蔣介石匪幫的空投接濟，還設有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派遣的許多特務電台，進行

陰謀活動。

從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間起，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就指示叛匪騷擾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區，破壞交通，劫掠財物，奸淫燒殺，殘害人民，並且襲擊中央派駐當地的機關、部隊。中央本着民族團結精神，一再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責懲辦叛亂分子，維護社會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把中央這種仁至義盡的態度看作軟弱可欺。他們說，漢人是可以用吓跑的；九年以來，漢人動也不敢動一下我們的最美妙最神聖的農奴制度；我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他們不敢平叛，只是要我們負責平叛；只要我們從外地調來一大批叛亂武裝到拉薩，給一打，漢人准跑；如果不跑，我們就把達賴佛爺架往南山，聚集力量，舉行反攻，奪回拉薩；最後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們的，可能援助我們；還有強大的美國，也可能援助；台灣蔣總統，已經積極援助；達賴是神，誰敢不從？美國人說過，中國人民公社鬧的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現在是驅漢自立的大好時機；云云。這些反動派的靈魂，已經飛到九霄雲外，簡直要管領整個宇宙了。因此，他們非但不負責制止叛匪的騷擾，反而變本加厲，積極進行叛國的陰謀活動。他們在拉薩集中了相當數量的反革命武力以後，終於在三月十日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武裝叛亂。

在三月十日拉薩叛亂爆發以後，達賴喇嘛曾三次給中央駐藏代表來信，說明他已被反動分子劫持，並且表示正在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中央代表在復信中歡迎達賴喇嘛這種態度，同時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變錯誤態度，負責平息叛亂。但是，這些反動分子不但毫不悔改，還決心擴大叛亂。他們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並且在三月十九日夜間向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發動了全面進攻。和平解決的希望消滅了。西藏反動勢力最後選定了使他們自己走向滅亡的道路。

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进行讨伐。人民解放军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据初步统计，截至二十三日止，已俘获了叛军四千余名，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枝，轻重机枪八十一挺，八一迫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万发。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

拉萨叛乱的迅速平定，说明西藏叛国集团必然灭亡，西藏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这首先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他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国分子。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人，而叛匪只有两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因为被欺騙裹胁而参加的，并且还有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过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谓康巴人。西藏人民绝大多数是极端贫苦的农民和牧民，他们迫切地希望从世界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西藏上层和中层也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他们拥护中央，反对叛乱，并且主张民主地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西藏逐步地变为一个文明进步的地方。这样，西藏已有一个坚决要求解放的劳动阶级，和很大一部分赞成改革的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中间派人士。目前的任务，首先是平息叛乱，建立和平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对于叛乱分子的方针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中央已指示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广泛团结一切没有参加叛乱的藏族同胞，负责保护西藏农牧工商政教各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人民的風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对于俘虏和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不许报复、伤害和侮辱。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

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

鉴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尚被劫持，国务院决定在达赖喇嘛被劫期间，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并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常务委员帕巴拉·卓列朗杰活佛和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阿沛并兼任秘书长。在西藏各地，一俟秩序恢复，都将陆续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并开始执行自治职权。在目前时期，自治制度与人民解放军的军管制度同

时并行。随着叛乱的平息,和平秩序的建立,自治制度将逐步完全代替军管制度。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势力把西藏的形势完全估计错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

查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图谋叛乱，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他们即纠集和纵容叛匪，窜扰各地，破坏交通，劫掠商旅，奸淫烧杀，残害人民，中央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严惩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不但不负责平息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助长叛匪气焰。及至今年三月十日，西藏多数噶伦与上层反动集团，更进一步与叛匪结成一体，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破坏统一；公然杀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并且公然于三月十九日夜間向駐拉薩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罪大恶极，莫此为甚。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疾苦，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讨平叛逆，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军将本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来归者，一概不咎既往；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本军纪律严明，维护群众利益，保护农牧工商各业，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望全体僧俗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司令员 張国华

政治委員 譚冠三

副司令員 阿沛·阿旺晉美

鄧少東

桑頗·才旺仁增

副政治委員 詹化雨

王其梅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达賴喇嘛和譚冠三將軍的來往信件

下面发表的是在三月十日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以后，到三月十七日夜間达賴喇嘛被劫出拉薩以前，达賴喇嘛和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六封來往信件。达賴喇嘛的三封信都是他亲笔写的。

拉薩的叛乱是在达賴喇嘛預定前往西藏軍区礼堂看戏的那一天发动的。要到西藏軍区礼堂看戏，并定在三月十日去看，都是达賴喇嘛自己决定的。西藏叛国集团經過事前布置，就放出西藏軍区部队要扣留达賴喇嘛的謠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在这一天在拉薩市区聚众把达賴喇嘛困在罗布林卡，并且公开实行武装叛乱。事件发生后，譚冠三將軍即在当天写了一封短信給达賴喇嘛，說明由于反动分子的叛乱，請他暫時不要来看戏。达賴喇嘛在十一日写信給譚冠三將軍，信中說：“反动的坏分子們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設法平息。”

三月十一日，譚冠三將軍写信給达賴喇嘛，指出反动分子公开进行軍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負責立即予以制止。

三月十二日，达賴喇嘛复信給譚冠三將軍，再次說明反动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并表示他“正尽一切可能設法处理。”

三月十五日，譚冠三將軍写信給达賴喇嘛，說明中央对此次叛乱事件的态度，并欢迎达賴喇嘛正尽可能設法处理此次事件的态度。

三月十六日，达賴喇嘛写信給譚冠三將軍，說他已經向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进行了教育，并表示几天之后可能到軍区去。但

是就在达赖喇嘛发出这封信的第二天,三月十七日夜間,叛国集团就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薩,到拉薩东南的山南地区去。然后,在三月十九日夜,叛国集团就发动了对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队的全面进攻。

这六封信的全文如下:

一 三月十日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 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致达赖喇嘛的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表示願意来軍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們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撥給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譚冠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

二 三月十一日达赖喇嘛致中央駐藏代理代表、 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信

亲爱的譚政委同志:

昨天我决定去軍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訪,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計較,送来的信(按:这是指譚冠三將軍十日致达赖喇嘛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頓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們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設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見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請通过此人(按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三 三月十一日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 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致达賴喇嘛的信

达賴喇嘛：

現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憚，公开地狂妄地进行軍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綫（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經十分严重的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

过去我們曾多次向噶厦談过，人民解放軍負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責任，对于这种严重的軍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軍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請他們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則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們自己負責。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見，亦請尽快告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譚冠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四 三月十二日达賴喇嘛致中央駐藏代理代表、 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信

亲爱的譚政委同志：

昨天（按即三月十一日）經阿沛轉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違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須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設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時間八点半钟，有少数藏軍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鳴了几枪，幸好沒有发生大的騷乱。关于您来信（按：这是指譚冠三將軍十一日致达賴喇嘛的信）中提的問題，我現在正打算向下屬的几个人进行

教育和囑托。

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見，請知心坦率的示知。

达 賴 十二日呈

五 三月十五日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 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致达賴喇嘛的信

敬爱的达賴喇嘛：

您十一日、十二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經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結外国人，进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寬大为怀，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則一貫采取阳奉阴違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們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現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現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錯誤态度，立即負起責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則，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維護祖国的团結和統一。

您来信中說，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設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們甚为欢迎。

对于您現在的处境和安全，我們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脫离現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險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話，我們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員到軍区来住一个短期，我們願对您的安全負完全的責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已决定于四月十七日举行。特此告訴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譚冠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六 三月十六日达賴喇嘛致中央駐藏代理代表、
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信

亲爱的譚政委同志：

您十五日的来信，方才三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謝謝。

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三月十四日）我向政府官員等的代表七十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則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責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現在此間內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員中从內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綫。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区，届时先給您去信，对此請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見，請經常来信。

达 賴 十六日呈

班禪額尔德尼致 毛主席周总理的电报

周总理并請轉毛主席：

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布告。

前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贯阻挠和破坏中央人民政府、西藏人民和爱国人士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所作的努力，一贯进行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活动，一贯反对西藏人民经过民主改革，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完全是反对和损害西藏人民利益，违背西藏人民意愿的反动行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他们的这些反动行为，过去一贯宽大为怀，不断晓以大义，耐心等待，给他们以悔悟的机会。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始终执迷不悟，反误以为强大祖国的中央“软弱”，无敌的人民解放军“可欺”。去年，他们支持和扩大了西藏的叛乱武装，到处危害西藏人民。今年三月十日以来，他们劫持达赖喇嘛，杀害爱国进步人士，迫害藏族干部和工人，公开地走上了叛国、叛人民的罪恶道路。并勾结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在三月十九日夜間，开始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的机关和部队全面进行武装攻击。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罪行，表明他们是祖国的叛徒，西藏人民的敌人，西藏藏族的败类。他们的叛国罪行，为国法所不容，而且已经遭到西藏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坚决执行国务院命令，为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完全符

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因而受到西藏人民愈来愈广泛、愈来愈热烈的拥护。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僧俗人民,欢呼人民解放军在平息叛乱中,已经取得的重大胜利。

我为达赖喇嘛遭到反动叛乱分子劫持的处境,对他深表同情和关怀。我希望他能够早日摆脱反动叛乱分子的控制。在他被劫持期间,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工作。

我将竭诚努力,团结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满怀信心地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彻底粉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支持下,所搞的一切无耻的叛国勾当。我深信,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祖国六亿五千万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援下,西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一起,一定能平息叛乱,一定能建设起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伟大的祖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班 禪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罪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已经奉命彻底平息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已经发布命令，解散这次叛乱的组织者西藏地方政府，并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已经迅速荡平了拉萨地区的叛乱，并且正在肃清西藏其他一些地区的叛匪。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央措施，声讨叛国集团，全国其他地方的各民族人民，也都一致声讨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我们向遭受叛匪蹂躏的西藏各界同胞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在平定叛乱中建立功勋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它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有过自己的贡献。但是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由于满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也由于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对内奴役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西藏人民长期陷于黑暗、穷苦和落后的深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从那时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一贯地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逐步实现民族

区域自治、逐步实现民主改革的政策。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努力促进汉藏两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中央也尽力促进藏族内部、首先是达赖喇嘛和班禅之间的团结。一九五六年四月，经过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充分协商，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并广泛吸收藏族各阶层人士参加。进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贯严守纪律，爱护人民，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取群众一针一线，并且举办农场、工厂、医院和学校，修桥筑路，帮助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因为这一切，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受到了西藏各界广大群众的热烈爱戴。

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实行改革，要使西藏繁荣进步是不可能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西藏军队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虽然如此，鉴于西藏地方的特殊历史情况，中央一贯的方针是努力加强民族团结，耐心等待西藏上层分子的觉悟。西藏和平解放后，对于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寺院的收入，中央均未予变更；各级僧俗官员也照常供职。对于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表示脱离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中央也不咎既往，仍让他们继续任职。甚至对于那些在解放后仍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中央也只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处，没有直接逮捕法办。中央所以采取这样的等待和宽大的政策，完全是以祖国的统一为重，以民族团结为重，给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以充分的考虑时间。一九五六年底，中央并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六年内，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在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以后什么时候改革，仍然要根据将来的情况，由西藏民族领袖、上层人士以及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

但是，西藏的反动集团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们要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多年策划的所谓“西藏独立”；他们利用在噶厦中的

地位，利用在国外的噶倫堡为勾結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的中心，积极糾集叛匪，指使这些叛匪燒杀搶掠、殘害人民、襲击人民解放軍駐地和交通綫，并且組織非法的所謂“人民會議”，准备一旦聚集了相当力量，就馬上撕毀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取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个反动集团自以为他們能够利用宗教迷信长期欺騙西藏人民；他們以为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会給他們有力的支援，他們以为印度等邻国会成为他們的靠山，他們把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寬大为怀的态度看作是軟弱无能的表现。因此，他們有恃无恐，叛乱活动由秘密到公开，由小規模到大規模，直至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許久以来的种种事实表明，西藏反动集团不但是祖国統一和汉藏两大民族团结的破坏者，而且是西藏民族繁荣进步的絆脚石。中央虽然早已察覺西藏地方政府的种种罪恶活动，但仍然采取仁至义尽的态度，屡次告誡他們負責制止，期待他們最后能够幡然悔悟。甚至在三月十日拉薩叛乱发生后，中央仍然作最后的努力，要他們悬崖勒馬。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頑固不化，竟然劫走达賴喇嘛，对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队发动全面軍事进攻，摧毀了和平解决的希望，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才命令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队对西藏叛国集团进行討伐，彻底平定叛乱。因此，西藏各界爱国人民充分認識到，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維護民族团结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在現在，只有討平叛乱，彻底粉碎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才是繼續維護民族团结的唯一道路。

目前在西藏的首要任务是彻底肃清一切叛乱分子，建立和平秩序。关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将采取的各项政策，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的布告和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都已经作了明确的說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将坚决团结全西藏一切沒有参加叛乱的僧俗人民；就是对

于叛乱分子，也将本寬大政策，区别对待，即来归者不咎既往，立功者給予奖励，对俘虏不杀不辱，只对頑抗者給以严惩。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队将继续坚持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風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的一貫方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并且积极促进西藏地方民族自治的实现。在达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員职务。当然，西藏叛国集团的叛乱，証明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关于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驟和办法，中央仍将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我們相信，在粉碎了叛乱集团以后，无论汉藏两民族的团结和藏族人民的内部团结，一定会大大加强，在这个基础上，西藏必将逐步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活动，一直是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进行的。在三月十日拉薩叛乱发生以后，帝国主义者曾經以为，他們梦想已久的所謂“西藏独立”这一下将成为事实了。因此他們就大喊大叫，为西藏叛国集团助威。然而，好景不常，人民解放軍迅速平定了拉薩地区的叛乱。于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就集中宣傳火力攻击人民中国。美国国务院接連发表了几次声明，污蔑中国政府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說什么中国要“摧毁宗教和政治自治”，并且假惺惺地“对于处于这种野蛮干涉下的西藏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人們記得，八年以前，当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曾經大肆攻击这个協議。現在，他們搖身一变，却又成为这个協議的捍卫者了。这是一个多大的諷刺！美国国务院的誣蔑是不值一駁的，因为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的、不要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的，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恰恰是为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支持和慫恿的西藏反动集团。甚至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不能不說，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的叛乱和

叛亂的平定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不得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西藏叛亂事件。大家知道，著名的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是首先由我國同我國的偉大的友好鄰邦印度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提出的。同年六月，我國周恩來總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又發表聯合聲明，莊嚴地宣布這五項原則是指導中印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從那時以來，這五項原則也是中國和亞非國家、特別是與西南鄰國相處的共同原則。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在西藏叛亂發生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三月二十三日發表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我們相信，中印兩國政府將繼續忠實地遵守五項原則，不允許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受到損害。

評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

新华社政治記者

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发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詞穷、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顾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維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統一国家的事实，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独立”。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几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达賴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謀。这个声明从所謂西藏独立开始，証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一九五一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一九五一年協議一开始就确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却沒有一句話說到这一点。只是这个事实，就使得声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協議”的話，无法令人置信。

这个声明硬說，一九五一年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協議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造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沒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事实真相是这样：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

府的代表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后达成的。达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后的一九五一年十月間給毛澤东主席的电报中曾說到这个協議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达成的，并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后，完全忠实地履行十七条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均未予以变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职；宗教活动和当地人民的風俗习惯，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藏軍应逐步改編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进行。到一九五六年底，中央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过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西藏內部的事务，几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負責进行。中央为了根据宪法在西藏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成立了以达賴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之所以沒有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国主义者所要的“西藏独立”。他們处心积虑地陰謀破坏十七条協議，从指使康巴叛匪騷扰一直到他們自己在三月十日这个日子公开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个声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条協議的事实，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条協議的事实。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一九五五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原西康地方叛乱的平定。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后来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达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道經四川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举行叛乱。他們的企图是以康巴叛乱为前綫，掩护西藏本区驅漢独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战斗力和

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証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証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三月十日及十九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三月十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的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糊地說什麼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三月十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三月十一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昨天（指三月十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証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面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三月十七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三月十七日，迫擊炮朝着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麼偏偏只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

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离开拉薩。这是关于达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无法掩飾的流露。达賴喇嘛三月十一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动的坏分子們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三月十二日的信中又說，“今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須立即撤走。”这說明三月十日以后达賴喇嘛是被叛乱武装包圍起来，并在三月十七日被劫走的。声明不敢否认这些事实，使所謂达賴喇嘛“願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薩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云云，成为一种显然的欺人之談。

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賴喇嘛本人的声明。第一，声明的內容同达賴喇嘛本人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三月十日叛乱发生后达賴喇嘛的三封亲笔信，完全違反。甚至一九五六年达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动分子包圍的时候，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談話中，也决沒有表示过这次声明中那种分裂祖国而迎合外国侵略者的观点。第二，这个声明是以达賴喇嘛本人的声明的形式发表的，可是在声明中却找不到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称的“他”字，这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声明中的某些观念和詞句也是外国的，例如所謂“中国的宗主权”的說法，就是英帝国主义首創的，英国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謂宗主权的掩护下进行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沒有使用过这种字样。現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擴張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們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簡直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声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国的报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乱事件时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达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

神領袖”，等等。从以上的情况看来，人們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賴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別人强加于达賴喇嘛的。

这个声明說了一个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汉人不同。这个真理适用于蒙古人、滿人、維吾尔人、回人、在广西的僮人、南方几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他們都不同于汉人。但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要求独立，他們都在祖国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独立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同西藏发生外交关系。現在忽然說要独立了。所謂独立也者，实际上就是要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賴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独立，人們不禁要問：这是不是企图把达賴喇嘛置于同祖国敌对的地位，堵塞达賴喇嘛重返祖国怀抱的道路呢？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北京的观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认清西藏叛国分子的真面目以外，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声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这个希望倒是切合实际的。一个多月以前爆发的叛乱不要很久就会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队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区的叛乱，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区的叛乱集团。人民解放軍部队已經在平叛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去几天中已經控制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国的全部国境綫。只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乱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战斗中，当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这一边。被裹胁的分子紛紛脱离叛匪队伍，回家生产。不但流血将成为过去，而且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也将成为过去。

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

据报道，达賴喇嘛在前往他在印度北部的住地穆索里途中，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的英文本是由印度外交部官員散发給报界的。印度新聞处广播的这个声明的英文本的譯文如下：

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一向得到承认的。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願望。在整个历史上，曾經多次表明了这一点。有些时候，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也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活动的。无論如何，在一切时候，甚至在中国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的时候，西藏在管理它的內部事务方面都是自治的。

一九五一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了中国和西藏之間的十七条協議。在那項協議中，接受了中国的宗主权，因为西藏人别无其他办法。但是甚至在这項協議中也規定，西藏将享有充分的自治。虽然对外事务要由中国政府掌管，但是据商定，中国政府将不干涉西藏的宗教和風俗习惯以及它的內部行政。事实上，在中国軍隊占領西藏以后，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內部問題上也是这样，而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事务行使全权。

一九五六年为西藏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达賴喇嘛任主任委員，班禪喇嘛任副主任委員，張国华將軍任中国政府的代表。实际上，甚至这个机构也沒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达賴喇嘛和他的政府曾經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協議，但是中国当局一直进行干涉。到一九五五年年底，斗争已經在西康省开始了，这个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变得严重起来。在后来进行的斗争中，中国武装部队摧毁了

許多寺院。

許多喇嘛被杀，大批僧人和官員被抓去在中国筑路，对行使宗教自由权的干涉增加了。从一九五九年二月初起，西藏人同中国的关系公开地变得紧张起来。达赖喇嘛在事前一个月曾同意到中国总部看文艺表演，而日期突然规定在三月十日。拉萨人民担心达赖喇嘛可能受到某种伤害，因此大约有一万人聚集在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夏宫，拦阻达赖喇嘛去看演出。

在那以后，人民自己决定组成一支卫队来保护达赖喇嘛。大批西藏人来到拉萨街头，举行示威反对中国人统治西藏。两天以后，数以千计的西藏妇女也举行示威，抗议中国的权力。尽管人民举行了这种示威，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还是竭力维持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并且设法同中国代表进行谈判，研究怎样才能最好地给西藏带来和平并且缓和人民的焦虑。

当这种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为加强拉萨和西藏的中国驻军而派出的增援部队到达了。三月十七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炮。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

在此以后，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高级官员来说，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

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

达赖喇嘛由于他的人民的忠诚和热情支持，才能够从一条十分艰难的路线到达这里。

达赖喇嘛所走的这条路线包括渡过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通过山南地区、雅隆谷地和错那宗，然后才到达丘坦穆附近的印度边境坎齐曼。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达赖喇嘛曾派遣两名使者越过印度西藏边境，要求印度政府允许他进入印度，在那里避难。达赖喇嘛极其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的自发的和热烈的欢迎，以及

給予他和他的隨行人員的避難權。

印度和西藏有着千年的宗教、文化和貿易聯繫，對西藏人來說，印度一向是誕生了佛祖釋迦的文明之國。達賴喇嘛對於他在安然到達印度時受到尼赫魯總理和他的印度政府同僚的好心問候深為感動。達賴喇嘛已經答复了這種問候。

自從達賴喇嘛在丘坦穆附近的坎齊曼入境以來，他受到東北邊境特區的卡門邊境地區的人民充分的尊敬和殷勤招待。達賴喇嘛希望說明，那里的印度政府官員如何不遺余力地使他在那里的停留和通過印度這個管理得極好的地區的旅行尽可能舒適。

達賴喇嘛現在將前往穆索里，他希望在今後幾天內到達那里。達賴喇嘛一俟有機會休息和回想一下最近的事件，就將考慮他的未來計劃，如果有必要的話，並將立即說明這些計劃。

他的國家和人民經歷了一個極為困難的時期，達賴喇嘛目前所希望說的只是表示他對於西藏遭遇的悲劇深感遺憾，並且熱誠希望這些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作為達賴喇嘛和西藏一切佛教徒的精神領袖，他最關心的是他的人民的幸福，以及保證他的神聖的宗教和他的國家的自由永遠發揚光大。

達賴喇嘛對於他平安到達印度再次表示感謝，同時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在印度和國外的一切朋友、為他祝福的人和信徒表示真誠地感謝他們向他發來的許多表示同情和關注的電報。

欢呼討平西藏山南叛匪的 重大胜利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奉命討伐西藏叛国集团的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部队，在彻底平定了拉薩地区的叛乱之后，揮师南下，又在山南地区蕩平了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匪的老巢，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目前，我軍已控制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喜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和这个地区的所有边境国防要点，正在当地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乘胜清剿零散叛匪，不日即可彻底肃清。捷报傳來，举国欢騰。这是西藏人民的福音，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福音！

山南地区是叛匪长期盘据的一个重要老巢。这股叛匪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指使下，勾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进行背叛祖国的叛乱活动。他們利用这个地区同外国接壤，不断接受从外国輸入的武器和外国飞机的空投接济，进行劫掠財物、奸淫燒杀、殘害人民的罪恶活动。因此，我軍一举肃清这股叛匪，解放这个地区，对于加速平息西藏地区的叛乱，有着特別重大的意义。西藏其他偏僻地区的零星殘匪，現在已成瓮中之鱉，无路可逃。他們如不迅速放下武器，棄暗投明，就将被彻底、干淨、全部消灭！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一心想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人民变成它們的奴隶牛馬。帝国主义和外国擴張主义分子为了攫取我国的西藏，一直在西藏統治集团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策划所謂“西藏独立”的阴谋，以便为它們进一步侵略西藏制造口实，最后把西藏变为它們的殖民地或“保

护国”。这次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背叛祖国，就是受到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的唆使和策动的。但是，无论西藏叛国集团也好，无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也好，它们都把西藏的局势完全估计错了。山南地区叛匪老巢的迅速复灭，正是人民解放军和西藏人民用实际行动，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分裂西藏阴谋的一个最响亮的回答。应该再一次警告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扩张主义者：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胆敢侵略西藏的阴谋，一定会在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铁拳下被打得粉碎。中国人民不要任何外国一寸土地，但是也决不让别人抢走一寸土地。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扩张主义者，都应该是一次有益的教训！

山南地区平息叛匪的伟大胜利，是对西藏叛国集团一个致命的打击，也是对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胜利，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并且进一步巩固了我国西南的国防，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人民解放军进驻边境国防要点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意派遣特务间谍，私运军火，进出我国国境，进行侵略活动了；他们指望发动叛乱从而分裂中国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这对于中国安全当然是大大的好事，对于亚洲和平也是大大的好事，只有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是大大的坏事。

人民解放军在平息山南地区叛匪的战斗中，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这是迅速获得完全胜利的重要原因。大军到处，藏族人民箪食壶浆，修桥补路，引导解放军追歼叛匪。这充分表明，山南地区藏族人民完全站在解放军一边，热烈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山南地区人民长期处于叛匪控制地区，受着叛匪和当地反动的奴隶主的压榨，痛苦不堪，他们迫切地希望从黑暗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因此，当人民解放军一到，他们就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欢庆新生，同声感激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救

命恩人，并积极协助解放军討平叛匪。山南地区藏族人民同人民解放军魚水相得的关系，証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光輝成就，也說明了人民解放军軍紀严明，秋毫无犯。正是由于广大当地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一边，而叛匪在当地人民中完全陷于孤立，所以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叛匪則望風披靡，一触即潰。这再一次有力地表明，西藏叛国集团根本不代表西藏人民，他們只是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是西藏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力图把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里通外国、禍国殃民的叛乱，說成是什么“民族独立运动”，实在是最无耻的謊言。

西藏反动集团勾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已經彻底失敗了。现在还殘存的零星股匪的唯一出路是立即放下武器，爭取寬大处理。政府和解放军对于叛乱分子的政策是：繳械投誠者将从寬处理，立功者将受到奖励，胁从分子不加追問，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要分子才依法惩办。在山南地区的战斗中，有些叛乱分子逃亡到印度去，那是絕路一条。

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脫落后的黑暗的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叛乱的平息，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鋪平了道路，也将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现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經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有关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具体步驟和方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同西藏各阶层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西藏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的利益将得到适当的照顾。宗教信仰自由亦将继续受到保护。民主改革是西藏走向繁荣幸福的必由之路，无疑将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

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五一年进驻西藏以来，对西藏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們充分发挥了我軍的一切优良傳統，正确地执行了党和政府的各項政策，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的爱戴。在这次平定叛乱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部队不顾地形險

阻和雪山峻岭,勇猛追歼叛匪,很好地完成国家和人民付托給他們的神圣任务,为祖国統一和民族团結建立了功勋。在这里,我們謹向忠勇的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部队的全体指揮員、战斗員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他們早日彻底肃清殘匪,巩固祖国国防!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会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举行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会议对迅速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表示敬意和慰问，对积极协助解放军平定叛乱的西藏僧俗各界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表示敬意和慰问。

(二)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不是偶然的。自英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印度为基地对我国西藏地方实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以来，反侵略的西藏爱国人民同被外国侵略势力所收买利用的少数西藏卖国贼之间，就展开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而在中国解放前夜，亲帝国主义分子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集团中是占着优势的。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等待这批亲帝国主义分子的觉悟，对他们采取了宽大的态度，让他们在原地方政府继续供职，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究既往。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同西藏广大人民以及很多上中层人士建立联系，并且获得他们的信任。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卖国贼对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阳奉阴违，继续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阴谋实现帝国主

义和外国干涉者所要求的所谓“西藏独立”，并且发动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这就使得这些卖国贼的罪恶完全暴露在西藏各阶层人民之前，暴露在全世界人民之前。一切理由完全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一切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方针的人们方面。任何对于这批出卖祖国、分裂祖国、背信弃义、杀人放火、灭绝人性的叛匪表示“同情”和企图借机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人，只能使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认清他们的面目，从而获得必要的教训。

(三)在西藏，同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应当坚决实现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妄想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因而积极反对民族区域自治，现在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已经有可能在实行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的同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之下，逐步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和藏族人民的自卫武装，并且开始执行自治职权。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都应当有广大人民的代表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全体官兵，一切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同藏族人民建立最亲密的兄弟关系，艰苦工作，英勇奋斗，为藏族人民的利益服务。

(四)西藏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惨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甚至那些口口声声“同情”西藏叛匪的人，也说不出他们为什么硬要热心于支持这种落后制度的理由。西藏人民久已坚决要求改革自己的社会制度，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

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願望和西藏社会經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出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設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奠定基础。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密切团結全西藏各阶层的爱国僧俗人民，区别对待未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参加叛乱而迅速投誠的和坚决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注意保护全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文物古迹。

(五) 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人民大家庭的西藏，是西藏广大人民的西藏，而不是少数反动分子的西藏，更不是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的西藏。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对于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內政，不容許任何外国人干涉。在西藏地区，貫徹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领导下的、由广大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当家作主的民族区域自治，貫徹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领导下的民主改革，并且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兄弟般的团結和互助，建設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不但不能阻止这个方针的实现，而且只能加速西藏人民的觉悟，从而加速这个方针的实现。同样，任何外国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对于我国在西藏的这个方针进行干涉，也不能阻止这个方针的实现，只能激起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反对干涉的爱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遵守五項原則，同西南各邻国和平共处，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遺憾地注意到，最近在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了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內政的言行。这种言行不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只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利益。會議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現象将迅速消除，中印两国之間的偉大的悠久的友好关系将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烏兰夫代表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會議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到現在的四年多時間中，我們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綫上都取得了輝煌的胜利。在这中間，民族工作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聚居的少数民族已經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少数民族的經濟和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就使少数民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团結、友爱、合作的关系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

正当全国各民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跃前进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擴張主义分子竟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背叛祖国，发动了武装叛乱，企图借“西藏独立”的幌子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成为它們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英帝国主义者、印度擴張主义者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这种罪行受到了全国各

民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严正声讨。因为各民族人民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深深地知道，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和他们在各民族中的走狗，曾经给各民族人民带来过如何深重的灾难；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经过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已经并将使各民族人民获得何等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就拿内蒙古民族来说吧。内蒙古民族在解放以前的近百年来，饱尝了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内部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长期处于社会生产极为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和人口急剧下降的衰亡境地。内蒙古人民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曾经多次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当时在内蒙古民族面前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反动的上层分子所走的道路，就如同现在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投靠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企图把西藏分裂出去一样，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出卖民族利益，并且在他们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下搞什么所谓“蒙疆自治政府”之类的傀儡政府。如臭名彰著的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李守信等蒙奸就是代表这个道路的首恶分子。这条曾经给内蒙古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帝国主义走狗的道路早已受到了历史严正的判决，而曾经嚣张一时的德穆楚克栋鲁布、李守信之类的蒙奸分子也在解放后被人民一一逮捕，归案法办。内蒙古的另一条道路是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人民革命的道路：他们把自己民族的命运同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自己民族求解放的斗争汇入全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总流中来，并且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直至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起获得彻底解放，走上社会主义的广阔大道。这是一条完全符合内蒙古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也是唯一的胜利道路。

一九四五年在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积极地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的准备工作,并在一九四七年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此后,内蒙古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并且积极参加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全国各民族地区一道,内蒙古自治区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在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也是很迅速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大地促进了全自治区工、农、牧、林业生产和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以一九五八年和自治区成立的一九四七年相比,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五亿五千三百八十多万元增至二十九亿七千三百二十万元,增长了四倍以上;工业(包括手工业)产值由五千二百九十六万元增至十一亿五千六百四十九万元,增长了二十倍;粮食总产量由三十四亿六千九百多万斤增至一百一十八亿斤,增加了二点四倍;牲畜总头数由八百二十八万多头增至二千四百四十七万多头,增加了近两倍。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人民的购买力,一九五八年比一九四七年平均增加四倍半。在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时候,根本没有高等学校,到一九五八年已有高等学校十八所,学生六千零四十一人。中等学校一九四七年只有二十九所,一九五八年已发展到七百所;小学校一九四七年只有三千七百六十九所,一九五八年已发展到一万四千七百所。中学在校学生一九五八年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十九倍,小学在校学生增加了四倍半。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十一年内,医院增加了三十九倍,病床增加了二十五倍。由于人民生活的提高,卫生保健事业的普遍展开,各民族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其中蒙古族人口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十一年里,增加了三十多万人,内蒙古自治区到处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和实行区域自治以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充分证明了内蒙古人民所走的道路是唯一正确

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也已经同样地被国内其他兄弟少数民族的经验所证实。但是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却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这就是蒙奸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李守信等所走过并且已经遭受了可耻失败的，投靠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统一和出卖民族利益的道路。

西藏的卖国贼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之下，为了达到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无耻地捏造各种谎言，说什么“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这是西藏反动分子叫嚣已久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谬论。我们内蒙古人民同西藏人民有悠久的友谊，对于西藏人民的命运看得同我们自己的命运一样，不能不多说几句话。谁都知道，西藏地方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隋唐以前，汉、藏两族人民就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广泛联系。在唐朝，这种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元朝，世祖忽必烈统一了当时四分五裂的西藏，于一二五一年封西藏萨迦法王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并将西藏地方交由萨迦法王管理。从此以后，西藏地方就确定不移地正式地纳入了伟大祖国的版图。达赖喇嘛的称号，也是后来十六世纪的蒙古可汗规定的。明朝对当时的西藏噶举法王也封了官爵，授予封号。清朝一建立，五世达赖就到北京朝拜，清世祖（顺治）于一六五三年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清圣祖（康熙）又于一七一三年封六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清高宗（乾隆）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处理西藏事务。后来的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也在拉萨驻有办事处，西藏地方政府也在南京驻有办事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坐床典礼，也是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派员主持下进行的。这些铁的历史事实，是谁也抵赖不了、推翻不倒的。西藏的逃亡印度的一小撮卖国贼不顾历史事实，硬说西藏是什么“独立国”，这除了说明他们已经背叛祖国、背叛西藏民族而卖身给英帝国主义者和

印度擴張主義分子以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還拿出什麼“西藏人不同於漢人”來作為他們妄圖把西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論據，這也是不值一駁的。作為民族關係來說，藏族和漢族當然是不同的。但是民族的不同絕不能成為西藏應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理由。在世界上有許多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例如印度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聽說印度的政治家們主張印度的各個民族因為和印度斯坦族不同就應當從印度分裂出去。很明顯，民族的不同絕不能作為分裂祖國的借口。正因為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漢族又是我國的主體民族，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走在各兄弟民族的前面，所以加強以漢族為中心的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合作，就成為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和促進各少數民族的發展與繁榮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成為關係到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一個重大問題。內蒙古自治區的經濟、文化建設之所以發展的這樣快，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蒙族人民和漢族人民實行了團結合作、共同奮鬥的結果。多年來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祖國的統一和以漢族為中心的各民族之間的團結，這不僅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是各民族獲得發展與繁榮的基本保證，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最高利益。任何人如果企圖把自己的民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或者反對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與漢族人民實行團結合作，就不僅破壞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首先是違背了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各民族人民和本民族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如果他們一定要這樣作，就只能使他們自己碰得頭破血流，遭到可恥的失敗。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叛亂及其失敗，就是用他們的反面行動證明了這樣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西藏叛國集團還胡說什麼我們沒有給西藏人民“自治”權利，“西藏地方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這自然也是一種既不符合事實而又別有用心的謊言。在中國幾乎所有有聚居

区的少数民族都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当家作主，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内部事务，内蒙古民族实行自治已经有十二年之久。只是在西藏这一块地方，由于上层反动集团的阻挠，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成立自治区，即使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因为上层反动集团的破坏而没有做什么工作。如前所说，他们要的并不是什么区域自治，而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者多年来策划的所谓“西藏独立”。当然他们的这种阴谋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违反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反对在西藏实行社会改革，妄想永远保存他们的农奴制度。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为了等待西藏少数不愿改革的上层分子的觉悟，曾经宣布在一九六二年前不进行改革，在一九六二年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还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定。但是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之下，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公开地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叛乱。他们以为这样也许可以迫使中央作更大的让步，却不料叛乱被迅速平息，西藏同祖国的联系、藏族和我们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的联系更加巩固，西藏人民因此可以早日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大道，叛乱分子在客观上却是作了好事了。坏事变成好事，这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他们的外国主子没有预料到的。他们的算盘完全打错了，自己给自己选择了迅速死亡的道路。西藏的农奴制度，是现在世界上的一种极端黑暗、落后、反动和残酷的社会制度。在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世俗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以及他们的所谓地方政府，占有着全部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广大的农奴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妻室子女也是听任农奴主支配的。农奴主把农奴生下的子女如同财产一样，登记在自己的账簿上。农奴主可以随便对农奴施加各种肉刑，包括鞭笞、拷打、割鼻、挖眼、砍去手脚和残酷处死。农奴主并且可以把农奴连同庄园一起赠送给别人，还可

以作为陪嫁的财产。农奴虽然从农奴主手里领得“一份”土地，但是每年要以大部分时间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无偿的劳动，并且还要无偿地给地方政府、寺院和农奴主支服各种差役，剩下来的一点时间才能耕种自己的份地，所以农奴的份地许多都是荒蕪的。农奴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农奴为了不被饿死，只有向农奴主借债。全西藏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的农奴都欠着农奴主的债，其中很多是世世代代不可能还清和农奴主不允许还清的子孙债。在农奴主的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农奴无路可走，只有用逃亡的办法和领主进行斗争。根据调查材料，近百年来，西藏农奴逃亡的数量十分惊人，西藏社会的生产力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阻滞。现在世世代代受着残酷压迫的农奴不要很久就可以获得解放了，西藏民族从此将要走上迅速发展和繁荣的道路。在这里我们热烈地为西藏民族的新生道贺。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还提出什么“保护宗教”的口号，企图以此来迷惑群众，扩大叛乱。但是他们的希望也落空了。因为事实终究是最雄辩的。几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地执行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真地尊重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切实保护了喇嘛寺庙，广泛地团结了宗教界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即使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也尽一切可能保护了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这些事实都是西藏人民亲眼看到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再怎么造谣中伤，也抹煞不了这些铁的事实，也破坏不了党和国家在西藏人民中树立起来的崇高威信。当然，我们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决不是说可以借宗教信仰之名，组织叛乱、背叛祖国而不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制裁，更不是说喇嘛寺庙可以成为反革命叛乱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根据地和掩体，而人民解放军却不能对之还击。任何人如果背叛祖国，实行叛乱，不管他信仰什么宗教，都必须受到国法的制裁和人民的惩罚，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西藏上层反

动集团在口头上高喊“保护宗教”，而在实际上却指使叛匪明目张胆地烧杀淫掠，残害群众。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全，还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呢？很明显，只有剿除了这个叛乱集团，才能使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一切民族中的反动派，都常常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实际上他们却是民族利益的叛卖者，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占民族中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极少数剥削阶级一己的私利。为此，他们就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祖国，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历史上内蒙古的反动派是如此，今天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也是如此。只有坚决、彻底地平息西藏地区的叛乱，肃清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在西藏的一切残余势力，才能巩固祖国的统一和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从而使西藏民族迅速地走上幸福和繁荣的道路。

最后，必须指出，西藏叛乱和西藏叛乱的平定，都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加以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叛乱发生以后，一些印度的官方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对西藏的一小撮卖国贼表现了特别的“热心”和“同情”，好像是他们的亲骨肉一样。一些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则露骨地发出了各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嚣，说什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没有历史根据”，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等等，简直把中国的西藏当成了印度的一部分。而帝国主义则在疯狂攻击中国人民的同时，拼命开动宣传机器，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真正关心中印友好和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人，都必须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印友好关系的破坏。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来就是很珍视和印度人民的友谊的，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却把我国的这种友好表现，当做软弱可欺，愈来愈多地表现了对于我国内政的干涉，要经过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

保护国。我們要警告那些在西藏問題上继承了英国帝国主义不
光荣遗产的印度擴張主义分子，还是把你們的脑袋放冷靜一点
吧，六亿中国人民已經站起来了，中国任人欺侮和压迫的时代已
經永远过去了。任何外国反动力量都不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
去，都不能挽救西藏反动派的灭亡，都不能阻止西藏人民沿着民
主和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让那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去嚎叫吧，胜利是屬於中国各民
族人民的！

班禪額尔德尼·却吉堅贊代表在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在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會上，我首先表示竭誠擁護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李富春副總理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李先念副總理關於一九五八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九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彭真副委員長關於人大常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這次我和阿沛·阿旺晉美等代表來到北京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全國各民族的代表歡聚一堂，共同商討國家大事，這又一次充分說明，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西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真正地享受着民族平等和當家作主的權利。

從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到現在，四年多來，我們的偉大祖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國家更加統一和鞏固；我國各族人民的團結也空前地加強了；我國不僅已經勝利超額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而且實現了史無前例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使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呈現出一片極其欣欣向榮的景象。現在六億多人民繼續滿懷勝利信心奮勇前進。所有這一切，都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由於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進藏的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始終不渝的履行十七條協議，一貫堅持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

則，并採取了積極的措施，來扶助西藏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愛戴。但是，長期以來，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蔣匪幫和外國反動派的指使下，一貫進行分裂祖國、破壞祖國、破壞十七條協議的活動，並且百般阻撓自治區籌委會工作的進展。中央為了等待反動分子的悔悟，一再忍讓，做到了仁至義盡，而西藏的上層反動分子不但沒有悔改，反而認為中央軟弱可欺，竟在今年三月，公然劫持達賴喇嘛，公然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罪惡目的是：把西藏人民重新置於帝國主義的奴役之下，並且永遠保存世界上最黑暗、最殘酷的農奴制度。拉薩地區的叛亂迅速平息，反動分子的叛國陰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在平息叛亂的過程中，西藏的僧俗人民和愛國的上層、中層人士都熱忱地擁護周恩來總理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積極幫助人民解放軍平息叛亂，他們一向被壓制的要求改革的願望也紛紛提了出來。

當我看到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以後，感到無比的憤怒。這個所謂聲明，無論同達賴喇嘛平時的言行或者同達賴喇嘛給中央代理代表譚冠三的三封親筆信對照看來，都是毫無共同之處的。聲明的口吻既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口吻，也不是我們藏人所習用的口吻。很顯然，這個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外國人強加於他的。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認的。很早以來，西藏就和祖國內地發生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聯繫。到十三世紀的時候，西藏地方就正式加入了中國的版圖。從此以後，西藏就一直中國的領土。這個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說：西藏人不同於漢人，這能夠作為“獨立”的論據麼？大家知道，我國除了漢族以外，還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這些民族不但都不同於漢族，而且彼此之間各有其不同的民族特點。他們作為民族是不同的，但是對祖國來說，他們都是祖國

大家庭的一員。世界上別的多民族的国家很多。因此，民族的不同决不能作为分裂祖国的借口。声明說“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願望”，这完全是捏造的謊言。事实上西藏絕大多数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一样，认为維護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自己最根本的利益。西藏人民根据切身的經驗懂得，脱离祖国的必然結果，并不是什么西藏的独立，而是把西藏变作外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我們知道，所謂“西藏独立”，首先是英国人提出来的。英国侵略者在一九〇四年大举进攻西藏，屠杀很多藏胞，武装占領拉薩。以后英国不但处心积虑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不許中国政府“干涉西藏內政”，而且在西藏內部也制造了惨痛的分裂。在英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毒手之下，前輩班禪被迫出走了，热振活佛被殘杀了，格达活佛被毒死了，达賴喇嘛的父亲也被毒死了。这些就是所謂“西藏独立”給我們的血的教訓！現在有些印度人又在說什么“西藏独立”，或者說什么“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是不許中国干涉西藏內政”。試問：中国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管不得，別人反而管得呢？这和英国人以前讲的話有什么分別呢？我看什么分別也沒有！这种話在全世界只有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反动派贊成，印度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是不贊成的，印度的一切主張五項原則、珍惜中印友好、真正同情西藏人民的人士，也是不贊成的。我們西藏人民是坚决反对的。我代表全体西藏僧俗人民在这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郑重声明：我們西藏永远是中国西藏，我們永远不許任何外国人干涉我們西藏和我們中国的事情！

西藏作为祖国的一个自治地方，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这是沒有問題的。大家知道，民族地方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解决我国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已載入我們国家的宪法，并且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中也有明文規定。協議的第三条写着：“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共同綱

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權利。”早在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籌備委員會就已經成立了，達賴喇嘛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籌備委員會過去所進行過的一些工作，都是在達賴喇嘛親自主持下，經過各方面人士的充分協商決定以後進行的。自治区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和幹部絕大部分也都是各階層的藏族人士。這一切都是鐵一般的事實。至於籌備委員會的工作沒有很好的開展，那是因為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阻撓和破壞的結果。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一貫阻撓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迫害藏族幹部和愛國進步人士，製造藏漢之間和西藏內部的不團結，反對任何民主和進步的措施。西藏解放雖然已有八年了，但是，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沒有改變。這怎能說西藏地方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呢？我認為就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來說，中央領導和檢查地方政府的工作，是完全應當的和正常的現象。過去中央對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不是管的太多，而實在是管的太少了。解放八年以來，中央對原西藏地方政府一貫本着民族團結政策，寬大為懷，不料那些頑固不化的反動分子，却以為中央是軟弱可欺，竟至喪心病狂，背叛祖國，背叛人民。事實證明，他們所要的不是什麼西藏的自治權利，而是西藏的所謂“獨立”，事實上也不是什麼西藏的“獨立”，而是企圖借“獨立”的招牌來賣國求榮，來維持他們的反動統治。這種所謂“獨立”的招牌，同過去滿奸溥儀投靠日本侵略者所掛的“滿洲國”的“獨立”招牌，完全是一回事。

在對待宗教方面，共產黨和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切實執行了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喇嘛寺廟的政策。八年以來，西藏的宗教制度和宗教信仰，都沒有改變。這是全藏僧俗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實，實際上破壞宗教的不是人民解放軍，而是西藏的那些叛亂分子和反動分子。他們殺害和污辱僧尼，玷污佛像，搶劫供奉器物，甚至把寺院作為叛亂的據點。顯然這不是尊重宗

教的善行，而是破坏宗教的恶行。况且他们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国外。这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最大的破坏。原西藏地方政府口口声声说保护宗教，却一贯地干着破坏宗教的勾当。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攻打过色拉寺，残杀了爱国的热振活佛，并且在以后毒死了达赖喇嘛的爱国的父亲。他们这些罪行，难道也叫做“保护宗教”吗？事实证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他们高喊护教，实际上是借宗教来欺骗人民，以便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

现在，西藏的局势已经完全在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西藏僧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正在继续扫荡残余叛匪。我相信在最短期间，西藏地区的残余叛匪定会全部肃清，西藏人民将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西藏叛乱分子制造独立的阴谋已经破产了。这些叛乱分子在他们的外国主子的指使下，假借达赖喇嘛的名义从事破坏分裂祖国的活动，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帝国主义极力利用这个事件破坏中印关系，这是不能允许的。值得指出的是印度的反动派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一直对西藏存在扩张野心，并且进行种种破坏活动。毫无疑问，这种活动只是对帝国主义有利，而不利于中印友好的。

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把自己装扮成西藏人民的朋友，犹如凶恶的魔鬼，装扮成慈善的菩萨一样。但是多年来遭受过外国侵略的西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们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来。任何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不管怎样巧加打扮都是骗不了人的。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依照国务院的命令，已经行使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我遵照国务院的命令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西藏全体干部和僧俗人民，努力完成国家和人民交付给我的光荣的使命。彻底肃清残匪是当前西藏地区的首要任务。现在叛乱虽已基本平息，但是在一些偏僻的地区，

还有一些零星殘匪进行騷扰活动。他們像堆·德格多杰(按:根据佛經記載,这是一种专门殘害人的魔鬼的名字。)魔鬼般的奸淫燒杀,无恶不作,严重地破坏那些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西藏人民必須繼續积极协助人民解放軍彻底肃清这些地区的殘余匪徒,维护社会治安,巩固祖国国防。

逐步进行改革,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們西藏人民繁荣幸福的唯一的康庄大道。西藏的旧制度,殘酷地压迫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如果不加改革,西藏地区貧困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变。这犹如不經慈航,就无法脱离苦海,走上幸福的极乐世界。西藏的人民早已积极要求改革,很大一部分上层人士为了西藏的发展前途,也贊成进行改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通过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协商,逐步实现改革的任務,努力建設民主的进步的新西藏。

加强汉族藏族以及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是西藏人民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保証。如果没有汉族的帮助,西藏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是不可設想的。西藏人民必須象尊重三宝(按:三宝是指佛、法、僧)一样地来尊重汉藏人民的友誼,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这个友誼。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达賴喇嘛能够摆脱被劫持的处境,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同西藏人民一道,共同建設光明幸福的新西藏。

讓我們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在祖国大家庭中走向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民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會議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決議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會議七月十七日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全文如下：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會議完全同意班禪額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員、張国华副主任委員和阿沛·阿旺晋美副主任委員的报告。會議一致认为：西藏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殘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现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經濟和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西藏地方应该实行民主改革，早在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協議中，就已经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八年以来，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保持其封建統治，对执行協議进行了多方阻撓和破坏，致使民主改革的任务未能付诸实现。

八年来，中央一直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采取了耐心教育和等待的态度，他們却毫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竟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发动了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破坏民族团结的武装叛乱。随着叛乱迅速平定，他們遭到可耻的失敗，促使西藏形势进入了一个民主改革的新阶段。一方面是：叛乱武装的巢穴已经摧毁，上层反动集团的卖国害民的罪恶行为已为广大群众所痛恨，他們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地；反动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已经解散；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起来坚决要求进行民主

改革,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积极赞成改革,本地藏族干部大量地在成长。以上说明了在西藏实现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残余的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会议认为中央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采取和平的方针,即在改革中,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政策和自上而下的进行协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实现民主改革应当分为两步走:首先是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和进行减租减息的运动,为下一步分配土地打下基础。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会议一致认为当前必须贯彻执行以下各项政策:

一、在农业区,对于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包括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对于未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包括其代理人)出租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同时,应解放朗生(新华社编者按:朗生就是西藏封建领主的家奴,终身为农奴主服劳役,并且世代代为家奴,没有人身自由。)废除人身依附,改为雇工关系。对于三大领主一九五八年以前放给劳动人民的债务,一律废除;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在一九五九年放给劳动人民的债务,实行减息。

二、在牧业区,为了保护和发展牲畜,肃清叛乱分子,迅速地安定社会秩序,必须依靠牧工和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牧主的牲畜,仍归原牧主所有;对于参加叛乱的领主的牲畜,仍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放牧的牧民所有。同时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的收入。牧区的债务问题,按农业区办法处理。

三、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在民主改革当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寺庙中必须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对

于爱国守法的寺庙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对于喇嘛的生活，由政府统筹安排，寺庙的收入不够正当开支时，采取补贴的办法予以解决。

充分的发动群众是实现“三反”、“双减”和民主改革的关键。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决打击叛乱分子和抗拒民主改革的反动分子，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农(牧)民协会。区以下农(牧)民协会在民主改革期间，代行农村基层政权职能。

根据以上各项政策，制定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减租减息简则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等文件，由本委员会另行公布。

这次会议是西藏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伟大的，艰巨的。西藏僧俗人民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建设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国务院关于批准“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組織章程”和“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的通知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国务院全体會議第九十二次會議批准了“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組織章程”和“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全文請在西藏登报发表。特此通知。

附：西藏地区各县、区、乡 农民协会組織章程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委員會議通过

第一章 总 則

第一条 名称：农民协会，在乡称为乡农民协会，在区称为区农民协会，在县称为县农民协会，在半农业半牧畜之县、区、乡，称为农牧民协会。

第二条 宗旨：农民协会或农牧民协会为农民牧民自願結合的群众組織，其宗旨在組織全体农(牧)民，有步驟地实行民主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农(牧)民生活；在农牧民中进行爱国反帝和人民民主以及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实行人民民主的权力，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团结各阶层人

民，巩固祖国統一，加强民族团結，貫徹执行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

第二章 会 員

第 三 条 会 員 資 格：

一、凡雇农、貧农、中农、农村工人、奴隶、兼营农业的小商贩、农村貧苦知識分子与半农半牧区之牧民、牧工，贊成农民协会章程者，不分民族、信仰、年龄、性別，均可自动向当地农民协会請求，或由协会会员一人介紹，經当地农民协会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加入协会为会员。会员入会退会均依自願原則；既入会后，必須遵守协会章程。

二、凡被派到农村中从事群众运动的工作人员均得加入农民协会，其入会手續和其他会员相同。

第 四 条 权 利 与 义 务：

农民协会会员的权利：

一、在会內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

二、对会內一切決議和工作，有进行討論督促和建議批評的权利。

三、对农民协会各級組織和工作人員有監察、批評与越級上訴的权利。

四、有自由退出农民协会的权利。

农民协会会员的义务：

一、遵守会章和执行农民协会決議的义务。

二、按期繳納会費的义务。

三、宣傳农民协会主張及介紹会员的义务。

四、促进农民协会互助团結的义务。

第 五 条 本会会员要团結互助，共同維護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民主改革和各种群众运动中，不給地主通風报信，不貪污，不包庇，不徇私舞弊。

第三章 組 織

第六條 农民协会之組織原則为民主集中制，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會員服从組織。乡农民协会受区农民协会領導，乡区农民协会一律受县农民协会領導。

第七條 乡农民协会：各行政乡設乡农民协会，为农（牧）民协会之基层組織：

一、乡农民协会之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大会閉幕期間，由全体代表选出的七人至十一人組成的乡农民协会委员会执行各种工作。

二、乡农民协会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組教、生产、治安、妇女、青年委員各一人，由委员会互推之。

三、乡农民协会会员，得按居住領導便利条件，編为小组，每組为七人至十五人左右，选正副組长各一人以便于領導。农妇与青年可另編小组。

第八條 区农民协会：各行政区設区农民协会，为各級农民协会之樞紐，其組織如下：

一、区农民协会之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区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閉幕期間，由大会选出的九人至十一人組成的委员会执行大会決議。另由委员会推出三人至五人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

二、区农民协会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組教、生产、治安、妇女、青年委員各一人，由委员会互推之。

第九條 县农民协会：各县設县农民协会，为全县各級农民协会之領導机关，其組織如下：

一、县农民协会之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閉幕期間，由大会选出的十五人至二十七人組成的委员会执行大会決議。另由委员会推出五人至七人組

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

二、县农民协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视情况需要可设组织部、生产部、治安部、妇女部、青年部，各部设部长一人，视工作情况可设副部长与干事。主任、副主任及部长由常务委员会互推之。

第十条 乡、区、县各级农民协会委员会领导机构中，需要适当注意成份，应有贫雇农（包括奴隶）三分之二，中农三分之一参加，以保证贫雇农的领导作用。

第十一条 各级农民协会所设的主任、部、委员职权如下：

一、主任：负责召集会议，推动检查各部门工作及对外代表本会处理一切事宜，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二、组织部或组教委员：负责调查统计，管理干部，收取会费，会员与干部教育，对外宣传及一切有关组织和宣传事宜。

三、生产部或生产委员：负责领导和推动农民生产，组织劳动互助，解决生产困难。

四、治安部或治安委员：负责发动与组织群众维护地方治安，监督改造反动分子、坏分子，保卫群众利益等事宜。

第十二条 各级农民协会委员的任期：乡农民协会委员任期半年，区、县农民协会委员任期一年，均可连选连任。

第四章 会 议

第十三条 乡农民代表大会三个月一次，必要时由乡农民协会委员会召集临时大会；乡农民协会委员会一月一次，必要时由主任召集临时会议；小组会一月一次，必要时由小组长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区农民代表大会三个月一次，但经委员会或半数以上之代表提议，得召开临时大会；委员会一月一次，但经常委会或半数以上委员提议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常委会半月一

次，必要时得由主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 县农民代表大会，一年一次，但经委员会或半数以上之代表提議时，得召集临时大会；委员会三月一次，但经常委会或半数以上委员提議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常委会半月一次，必要时得由主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农(牧)民协会是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各项政策法规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在民主改革未完成以前，乡、区农(牧)民协会可以代行乡、区政权，俟民主改革完成，乡、区政权健全后，代行政权任务即告结束。

第五章 經費及其他

第十七条 各级农民协会的經費，依靠会员繳納的会費，按每年收获季节一次繳納，数量由县农民协会决定；經費不足时，由政府补助之。一切經費开支，应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并向会员公布。

第十八条 本章程第三、四两章各条規定，均屬一般性质，各级农民协会，在实际进行組織时，得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需要由农民协会另行規定。

第十九条 本章程适用于农业区；半农业半牧畜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牧区若有条件，可仿照本章程成立牧民协会。

第二十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則

第一条 为适应人民当前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

产,并为土地改革奠定基础,特頒布本办法。

第二章 关于减租

第三条 一切未参加叛乱的領主(包括其代理人)出租之土地,一律按本办法实行减租,違者除勒令其按本办法实行减租并将多收租額退还原佃戶外,并依法懲办。

第三条 原对半分及各种租佃形式的土地,其收获物(含草)的分配,均在扣除种子(归原出种者所有)之后,实行地主、佃戶二八分成,即:一克种子的土地收了十一克粮食,扣去一克种子后,地主得二克,佃戶得八克。

第四条 地租一律于农产物收获后繳納,不得預先收租,并取消一切額外剝削。如:烏拉差役、献哈达、送礼等等。租地有押金者应退还。

第五条 减租自1959年实行,1958年以前的欠租,一律免交。

第六条 中农与貧农間的租佃关系,为农民內部問題,依团结互助原則,由双方協議办理,如有糾紛,由农民协会調解处理之。

第七条 实行减租后,佃戶也应按規定給地主交租。但是如果有了不可抗拒的災害时(如水、旱、雹、虫災),須酌情减免。

第八条 解放朗生(指奴隶),廢除人身依附,改为雇工关系,自1959年1月1日起計算工資;工資标准,由各地农民协会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合理商定。領主(包括其代理人)不得任意解雇朗生。朗生获得解放后,应当积极从事生产。

第九条 参加叛乱的領主(包括其代理人)的土地,由政府沒收,今年实行“誰种誰收”的政策。

第三章 关于减息

第十条 未参加叛乱的領主(包括其代理人)在1958年

底以前放給农(牧)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旧債，一律廢除。1959年內所放的債(包括錢、粮)，一律按月利一分計息(即每元每月付息一分)，并銷毀旧約，另定新約。所有債務的抵押品，应当退還給債務人。

第十一条 中农貧农及其他劳动人民間的債務，一般維持原約規定，如果有了糾紛，应当本着团結的原則，由农(牧)民协会調解处理之。

第十二条 参加叛乱的三大領主(包括其代理人)借給劳动人民的債務，一律廢除。

第十三条 商人放給农(牧)民的債務，以后另行規定处理。領主之間和商人之間的債務，不在減息之列。

第四章 附 則

第十四条 农(牧)民协会为协助执行減租減息政策的合法組織。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人民日报編輯部

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一場叛乱战争，已經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們的可耻的失敗，在西藏絕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現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決議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繼續。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就是說，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沒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阶级將采取贖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現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輿論正在对西藏問題大談特談，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們認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分光荣，让全世界注意他們，讓他們在全世界的議論中得到教育，得到鍛炼。有些外国人說：西藏的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們應該获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独立”；而人民解放軍在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对于叛乱的平定，則是“武装干涉”，是

“侵略”，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希特勒主义”。这样說的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各国的反动派，例如亚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吳庭艳和蔣介石（但是他并不贊成西藏独立，而要求西藏归順台灣）。还有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的一般政治态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問題上却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例如印度的某些資產階級分子。所有上述的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数，在本国也是少数，但是他們控制着相当大量的宣傳机器，一时显得頗为囂張。世界上更多的人說，西藏的叛乱是反动的，平定叛乱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致支持中国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斗争。就是在資本主义世界，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数。他們包括各国的劳动人民，主張正义和进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对外国侵略外国干涉的民族資產階級。这些民族資產階級懂得，贊成外国干涉西藏，就等于贊成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錫兰、柬埔寨、尼泊尔、伊拉克、古巴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国家的內政，等于贊成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資本主义国家，这种正义的声音暂时沒有那批反中国的宣傳机器所造成的喧声高。有些人感觉难过：好端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乱，岂不更好！他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出，西藏叛乱既然发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这次叛乱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将最終結束外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这对于中印友好的真正巩固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对于这种种不同議論，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應該认真研究，得到教訓，而且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对西藏問題大嚷特嚷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也将会加以研究，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訓。

我們現在想談談尼赫魯先生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本报編輯部按：在我們写好这篇評論以后，我們讀到了尼赫魯总理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的講話。这篇講話的主要論

点并没有超出四月二十七日讲话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对这篇评论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

尼赫鲁先生从今年三月十七日到四月底，在议会讲西藏问题，这是第七次了。尼赫鲁先生曾经多次表示同情所谓“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所谓“武装干涉”。在四月二十七日，他讲的话比较更有系统，本报已经在四月三十日全文发表过了。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现在把他的話再引出一段，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他对于西藏叛乱和印度作用的想法的一个提要：

“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质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

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去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

尼赫鲁所谓西藏的“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没有说明。但是，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资料——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都属于三种领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牧民都没有自己的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领地一部分属于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负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领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负。其余的领地是农奴主的所谓“自营地”。在这种领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领主只给一小块（约占领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给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领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剥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维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贷。大批农奴所欠的债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经欠了几百年的债。

农奴不但沒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沒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須由領主准假。

西藏的貴族是世襲的。全西藏現在有貴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財產多少而定。大貴族約占貴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們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成千上万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終掌握在这些大貴族手中。貴族和农奴等級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見了貴族要迴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講話也要有一定的讲法，不許讲錯。貴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认为違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甚至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駭人听聞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無論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須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統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貸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剝削，比官家和貴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剝削。寺院內部也是等級森严，农奴出身的貧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剝削者。寺院內也設有各种刑具和牢獄，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殘酷的程度跟其他农奴主沒有两样。

大致說来，貴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屬于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殘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樞，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間，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敗現象和內部斗争。在达賴喇嘛周圍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員中，为了爭权夺利互相殘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賴喇嘛，并不是像尼赫魯所說的那樣，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經常把达賴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見强加于他，在他們认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达賴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們

知道，一八五五年，达赖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达拉宫暴亡；随后，一八七五年，达赖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暴亡。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者倾轧异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残酷了。一九二三年，班禅九世被迫终身逃亡内地；一九四七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并勒毙狱中；同年，现在穆索里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赖喇嘛而毒死；一九五〇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统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经济衰敝，文化落后，连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丝毫也不“温和”，丝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试问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闹的所谓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们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谁呢？你们所宣传的西藏的自治或“独立”，是谁的自治或独立呢？你们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乱的失败是谁的失败呢？看起来，很多所谓“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们所同情的并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剥削者、残杀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脑。在西藏的大农奴主剜出农奴的眼睛和心脏来的时候，这些同情专家不觉得是悲剧，不向这些农奴主要求温和和人道。在这些大农奴主向驻守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解放军举行武力进攻的时候，在他们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们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同情家们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们要求温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军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豺狼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说，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叛乱失败而最后遭遇着

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像潮水冲破了閘門一样地泛濫起来了。由此可見，进行这种叫喊的人們，除了有一些是出于誤会以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梅特涅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鮮李承晚、南越吳庭艳、中国蔣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我們感到惊異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魯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許多骯髒人物有重要的矛盾，懂得他們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魯自己的阴謀詭計，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謂“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讓他們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們現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魯先生有所爭辯，这是我們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們來說，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經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在獄中所写的“自傳”一书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現很多誤解和偏見（他自己也說，他是“典型的资产階級”，带着在资产階級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見”），但是他仍然承认，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說：“經濟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階級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棄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階級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統治的特权階級使它放棄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沒有什么理由說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魯在这里說得很对。但是，他在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調子！他或者是完全拋棄了他以前發表過的見解，或者是實際上沒有了解他所曾以為了解過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他現在責備我們沒有能夠感化統治西藏的特權階級使它放棄權力和特權，而且企圖把對於西藏社會的階級分析作為“頗為陳腐的字眼、措辭和口號”一筆勾銷，把極端對立的農奴和農奴主這樣兩個階級，描寫成為“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一個單一的社会！當然，尼赫魯的這個企圖是我們所無法同意的。西藏社會的階級對立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根本不是什麼字眼、措辭、口號的問題，更談不到什麼陳腐。改革當然要採取行動，當然要有利於絕大多數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於極少數堅決反對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況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於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萬人。其餘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萬人，這裡面也有種種不同的情況。堅決反對改革、直至舉行叛亂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極少數。我們已經說過，兩萬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脅欺騙的勞動人民（任何反革命軍隊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麼，參加叛亂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萬人的百分之一多一點。以為整個西藏上層階級都叛變了的想法是不正確的。而且，在這六萬人中還有相當一部分贊成改革的開明人士。因此對於上層階級也必須分別情況，適當對待，這是我們所一向堅持的政策。如果說，上面說的這些不同情況的人對於改革都是同樣擔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樣有障礙的，那是不合乎實際的。至於要求改革的絕大多數人，他們對於改革有什麼要擔心，有什麼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礙呢？

尼赫魯在討論西藏社會的時候，雖然並不反對改革，也不否認既得利益集團在叛亂中的作用，但是整個說來，他不但沒有涉及這個社會的極端殘酷的剝削制度，而且實際上把絕大多數被剝削者和極少數剝削者混為一談，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否認西藏

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負責，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說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錯誤。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魯所討論的問題的当事人，我們认为，指出这个錯誤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魯的邏輯，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許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許的。大家記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沒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围。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与世隔絕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經譏笑我們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简单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断言我們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們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謂“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現在历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确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有对于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誹謗，一概都彻底地破产了。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中国，在无产階級領導之下，一变而为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中国，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的停滞不前，不过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縛罢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真正代表着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称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尽管也曾暂时迷惑过一部分群众，却真正被証明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們相信，中国历史的这个結論，尼赫魯总理也是不至于反对的。但是按照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邏輯，只要他的同情不仅仅限于“西藏人民”，而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要变成为令人百倍难过的空前的大“悲剧”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蔣介石的国民党和国民党軍隊比西藏的两万左右叛匪多得多，說他們不止是“上层反动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战争的規模也大得多，总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應該强烈得多。但是，据我們所知，尼赫魯总理在同情整个中国的时候，並沒有同情于汉族的“大农奴

主”；而在同情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蒋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魯先生可能說我們不公正，因为他所讲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跟汉人是不同的。这就是說，汉人在西藏人中間領導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碍。西藏人跟汉人不同，千真万确。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維吾尔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鮮族人，以及中国的其他許多少数民族，也都跟汉人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政府面前，存在着国内的少数民族問題。我們是十分謹慎地对待这个問題的。我們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培养了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并且在汉族人民中，特别是在汉族干部、共产党的汉族党员和人民解放軍的汉族官兵中，认真地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教育。我們采取了資本主义世界上沒有先例的办法，在汉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說服汉人，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例如內蒙古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西藏，为了爭取西藏上层分子的合作，我們用了特別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時間里，一直保存着原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軍隊甚至它的貨幣，一直說服西藏人民暂时不要进行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象所謂达賴喇嘛声明所說，不給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权利，那么，那些叛国有据的反动分子早就会被逮捕惩处，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会拖延到現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那些反动分子采取了如此仁至义尽的态度，甚至在拉薩叛乱爆发以后，甚至在知道达賴喇嘛已經被劫出拉薩以后，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的部队还是一直等到叛匪向軍区直接发动了武装攻击的七小时以后，才开始举行还击。很明显，到了这一步，反动分子已經把和平解决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坚决討伐和平定叛乱以外，任何其他办法都沒有可能了。人民解放軍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薩地区的叛乱，如果它願意先下手，当然早就可以把罗布林卡包圍

起来，使叛匪无法劫走达赖喇嘛。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炮弹打向宫殿、落入池塘的童话。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面对着这种严重局面，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针，正是说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民族问题始终是很慎重的，对于争取西藏上层分子尤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政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真执行，资产阶级或者其他剥削阶级就是想要这样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根本的关键仍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问题。尼赫鲁先生希望我们“争取他们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事实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纠纷和隔阂，基本上是剥削阶级造成的，剥削阶级也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纠纷和隔阂，结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谊。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蒙古统治者和满洲统治者压迫过汉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而汉族统治者也压迫过蒙古人、满洲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并且是革命主力的汉人，现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内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现在不是去压迫和剥削那里的少数民族，而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在一起，帮助那里的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压迫者、剥削者手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建立使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起来的基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汉族人员，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不但没有骑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头上摆威风，相反，他们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一道，做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常常不避艰险，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为他们的权利

和幸福而斗争。这样，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一切爱国的、赞成改革的上中层分子，就跟汉族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致，象汉族人民一样地推翻了他们本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的反动统治。这样，各民族的纠纷和隔阂的根源就消灭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获得了真正巩固的基础。这个过程，在内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都已经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领导改革的人员都竭力团结各少数民族的赞成改革的各阶层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间和改革以后都跟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诚然，不可能没有斗争，而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族地区还曾经发生了武装叛乱。但是，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过的，这些藏族地区的叛乱，正是由西藏的反动分子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动起来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大农奴主的统治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变动，他们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挥保卫农奴制度的旧藏军、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并且继续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结。因为这样，在那里不但没有进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的叛乱。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来，西藏人民仍然是屡次三番地热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们担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大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义者诸君须知：西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们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们、鞭打他们、挖出他们的眼睛的魔鬼是他们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们相信那些热诚地、和蔼地帮助他们劳动和治病、不取他们一针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是他们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乱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沟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转瞬之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军收缴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缴了叛匪的枪枝，收缴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

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这三样东西把他們压迫得太惨了！他們給解放軍自动带路，自动报告匪情，自动协助捕捉殘匪，搜查枪枝。只是在拉薩人民法院一处，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繳来的枪几百枝。在山南，許多村庄的居民听說解放軍要来，馬上聚集起来向战士献哈达，献鮮紅的桃花和嫩綠的柳枝，同时向解放軍哭訴叛匪奸淫擄掠杀人放火的罪行，要求解放軍一定要替他們报仇。貢噶宗的叛匪曾在公路上挖了四条横沟阻擋解放軍前进，但是叛匪一走，当地居民馬上把壕沟填平。解放軍一到林芝，当地的群众馬上自动組成一支騾馬运输队，帮助解放軍运送彈药粮草，并且跟随解放軍一道追剿殘匪。这种感动人的例子是說不完的。叛乱一平，广大群众很快协助人民政府恢复秩序，很快在人民政府协助下轉入生产。山南的春耕虽然因为叛匪騷扰推迟了半个月，但是，在解放軍的帮助下，播种期並沒有延长。那里成群的人正在地里送粪、播种，整修渠道，并且唱出了多久沒有唱过的欢乐的歌声。农民們紛紛詢問什么时候分配土地。在根据群众要求，宣布叛乱头目的土地今年实行誰种誰收以后，劫持达賴喇嘛的主犯之一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开苏溪卡的农奴，馬上自动把所有劳动力組織成为劳动互助小组，共同耕种所有的土地，爭取丰收。很明显，西藏的农民們相信，他們在西藏的土地上翻身作主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很抱歉，我們在这里的話說得太长了一点……但是，关心西藏的一切善良的人們請看，这一切跟清朝以来的旧式中国軍隊进駐西藏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不同！跟英国侵略軍由印度攻入拉薩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相反！試問：怎么能够把人民解放軍跟西藏人民在一起平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叛匪的正义行动，描写成为民族鎮压和民族侵略呢？

尼赫魯先生断言，汉族社会和藏族社会两者之間很难有任何会合点，冲破双方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的嘗試不是沒有作，就是作了沒有成功。对于西藏的劳动人民，这个問題現在已經由

事实作了答复，而且将来还会作出更大量更生动的答复。就是对于藏族的上层分子，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变化。达赖喇嘛在被劫持的情况下完全自发地、秘密地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和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措、阿旺嘉措、黄正清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方面的显著证明的一部分。站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方面的，有大批西藏的爱国的上中层分子。拉萨的中小学的学生，有大量的上中层分子的子女，叛乱一结束就来上学，而且人数比叛乱以前大大增加。可见，断言叛乱是民族性的“革命”，叛乱的平定是民族性的“悲剧”，是没有根据的。

有一些对中国并无恶意的印度朋友，由于受了长时间的有偏见的宣传的影响，由于他们没有直接看见西藏社会生活和人民解放军活动的真相，而他们的报纸又很少发表中国方面的完整的资料，一时误解中国的立场和政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水落自然石出。我们完全相信，那些暂时有所误解的、对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仍然将信将疑的印度朋友们，终会得出客观的结论来的。我们希望，尼赫鲁先生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当然，尼赫鲁先生有很大的自信，他有一套对于西藏问题的独立的见解。他倾向于假定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势力集团是一群纯洁的羔羊，甚至在他们向我们发动了进攻以后，他仍然认为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于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跟我们一样看，我们更不能要求尼赫鲁先生一定要改变他的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观点。在尼赫鲁先生的思想中，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我们不打算讨论应该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固然可以进行友好的辩论，也完全可以不辩论。大家家里的事情都很多，各人自扫门前雪就够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尼赫鲁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说得好：“要把一个国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

生冲突，危及和平。”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一批印度人，其中不幸也有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我們按照他們的主張辦事。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和鄰人，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不是完全可以相安無事嗎？你的辦法如果在印度行得好，那麼我們再向你學習也還不遲。究竟有什麼必要象現在這樣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採取某種妨礙友好的干涉行為，這是我們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尼赫魯總理否認印度曾經干涉西藏。他追述了印度獨立和分治前后的情況，證明印度對西藏從來“沒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我們承認，尼赫魯的話，在這樣的意義上是合乎實際的，這就是說，印度政府不打算吞併西藏，或者派遣武力來干涉西藏的事務。印度始終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享有對於西藏的主權。印度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同中國簽訂了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並且隨後從西藏撤出了自己的部隊，移交了印度的郵電設施。這些都是中國人民認為滿意的。但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內政的干涉，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要說印度政府對中國的西藏過去和現在根本沒有任何方式的干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們記得，本報也公布過，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國政府命令自己的部隊進入西藏的時候，印度政府就曾經經由外交途徑進行干涉。當時，中國政府在下令進軍西藏的同時，曾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來北京談判。這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內政問題。但是，印度政府却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會中國政府，說“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被認為是可悲嘆的”，是“沒有理由的”，說這對印度政府“是最為驚異和遺憾的”。照會中還提出，中國軍隊進駐自己的領土西藏，“將使對中國不友好的那些國家在這一國際事務緊急和微妙關頭，有借口來進行反華宣傳”；在聯合國恢復中國代表權的

問題上“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并将使那些反对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国家获得有力的支持”;“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見”;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就难于与此同时进行”;将不“符合中国或和平的利益”;“已經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緊張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已經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誼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对此,中国政府在答复印度政府的照会中曾經指出,人民解放軍进军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西藏問題是中国的內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許的。这个問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竟然利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威胁中国不得在自己的領土上行使主权,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罢了。在中国政府一再坚决地表示了这种严正的态度之后,特别是在人民解放軍在昌都地区取得了歼灭企图阻擋进军西藏的藏軍主力的重大胜利以后,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代表团,才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到达北京。經過談判,终于在同年五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協議。

重提这一段經過,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事实終究是事实。怎么能說,印度政府从来沒有干涉过西藏呢?

不幸的是,这种干涉仍在以某种形式繼續着。这种干涉发生在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和平共处五項原則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則之后,就不能不令人更为遺憾了。就以尼赫魯总理本人來說,他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发表过的声明和談話,其中虽有不少友好的表示,但是有些話我們觉得不能认为是符合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例如,他說,“北京沒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西藏自治地区的協議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証。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四月十三日)。“我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将能維持并且享受他們的自治,而不受其他人的压迫和鎮压”(四月十四日)。試問:把中国对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发生的叛乱实行平定称为“武装干

涉”，称为“压迫和镇压”他們的“自治”，并且說什么沒有遵守“对印度提出的保証”，这一切怎么能說不是干涉呢？印度政府坚持說达賴喇嘛不是被叛乱分子劫持的，而是叛乱分子的領袖，既然如此，印度政府对于达賴喇嘛的隆重欢迎和尼赫魯总理本人到穆索里的訪問，岂不意味着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叛乱領袖的欢迎和会商么？由于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明确执行不干涉的政策，人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甘地夫人和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都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自治国家”，包括国大党在內的印度多数政党組織的“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問題提交联合国，印度的报刊公然污蔑中国政府“采取强盜行徑和实行帝国主义”，污辱中国国家元首是“可恶的雪人”，并且要求召开有所謂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會議式的會議来解决純屬中国內政的西藏問題。西藏叛乱发生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就展开了一个誹謗中国的运动，規模之大，使人想起美国政界和报界对于古巴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干涉。試問，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內政采取这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难道能說是符合五項原則嗎？

尼赫魯总理說，印度对于西藏問題的反应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本能的，它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我們了解，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西藏人民具有亲密感情。不但如此，印度人民对于整个中国人民也具有亲密感情。周恩来总理訪問印度的时候，到处听到“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热烈口号，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对于西藏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被用来作为一些政界人士損害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干涉中国內政的理由呢？这种邏輯具有一种显然的危險，因为，如果这样的邏輯是可以成立的話，那末，在西藏走上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强盛的道路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用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为理由，組織

什么“支援阿薩姆邦人民委員會”、什么“北方邦事務委員會”，來干涉印度的阿薩姆邦或者北方邦的事務呢？西藏自治區政府以及整個中國政府，是否也可以把對於阿薩姆邦人民或者北方邦人民的深切同情宣布為一項基本政策，並且根據這種政策對那些邦的事務指手劃腳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對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系為理由，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印度某種保證，那麼，印度政府不是也可以干脆用對全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系為理由，要求中國政府對全部內政給予印度某種保證嗎？同樣，中國政府不是也可以用對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系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對自己的內政給予中國某種保證嗎？那還有什麼和平共處，什麼五項原則可言呢？世界不是就陷在互相干涉的混亂中嗎？我們相信，我們的印度朋友一定跟我們一樣，不會歡迎而且也无法容忍這樣一種國際秩序的。

把印度方面前後兩次對於中國西藏的干涉聯系起來，人們不難看出，印度政府雖然不打算占領西藏，或者使西藏正式獨立，但是的確力圖阻撓中國在自己的領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權。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在這一方面繼承過去英國政府的傳統：只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有如印度對於不丹和錫金的“宗主權”。他們所謂的西藏“自治”，不同於中國憲法上所明文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不同於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等地的民族區域自治，而是一種半獨立狀態。不錯，西藏不是一個省，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區，它比省具有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更多的權限，但是它決不是什麼保護國——既不是中國的保護國，也不是印度的保護國，也不是中印兩國共同的保護國，也不是中印兩國之間的什麼緩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權，跟對於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等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權一樣，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這是絲毫不容任何外國或者聯合國以任何名義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問題，都只能由中國解決，在中國解決，而不能在任何外國去解

决。西藏的任何半独立状态不利于西藏人民，不利于全中国人民，不利于印度人民，不利于中印友好和亚洲和平，而仅仅有利于西藏的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和支持这伙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的外国干涉者，仅仅有利于那些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制造纠纷的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阴谋家。中印两国是两个爱好和平并且有悠久友谊的国家，我们两国有一千种一万种理由要和睦相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而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要互相冲突，要设什么缓冲地区；如果硬要设，那就恰恰是要制造本来不存在的真正可悲叹的冲突了。鉴于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鉴于印度一些并非不负责的人士的言论，我们认为，彻底澄清这一点，对于巩固中印友谊是十分必要的。尼赫鲁总理在四月二十七日讲话中提及五项原则的时候，只说到“互相尊重”（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没有说“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是五项原则的原话，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我们希望，这不过是一种疏忽。

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带有时代的特征。印度是一个摆脱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它要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民族经济，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的大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而且，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这就使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以尼赫鲁总理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在执行对中国友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不参加美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资产阶级却继承着而且企图继续保持英国殖

民統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遺產。當然，偉大的印度人民對於印度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不負任何責任。我們也相信，不但印度人民，而且印度政府中的一切有遠見的明智的人士，都承認印度的出路是在進步方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我們跟他們一樣地認為，一個不久以前才獲得獨立、而現在也還受着帝國主義干涉者威脅的國家的當局，竟然干涉自己鄰國的事務，這是現代國際政治中一種令人惋惜的現象。

我們跟尼赫魯先生可以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分歧，但是在這一點上大概是沒有分歧的，就是中國並沒有干涉印度的內政。中國人民只是在印度方面發出了大量的污蔑性的言論之後才開始回擊的。尼赫魯總理在四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正當地譴責了某些印度人的旨在破壞中印友好關係的言行。可惜，他隨即集中力量攻擊中國的反干涉言論。他說，“中國的負責人物對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是“不顧事實真相和禮節，使用了冷戰的語言”。但是，中國指責印度方面的干涉是有事實根據的，已如上述。中國輿論界懷疑所謂達賴喇嘛聲明的真實性，也是有事實根據的，這個聲明中的大量漏洞和冒名頂替的痕迹，現在仍然是客觀地存在着。很明顯，那些把達賴喇嘛劫到印度的西藏反動分子，跟那些長期以來聚集在噶倫堡進行叛國活動的西藏反動分子在一起，正在竭力利用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來堵塞達賴喇嘛回到祖國的道路，而這是跟尼赫魯總理多次表示的願望不相符的。

說到重視事實真相和禮節，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報刊，在過去一個多月中對中國所說的很多話，決不能認為合乎事實和禮節。我國人民注意到，尼赫魯總理在這一方面不止一次地起了節制作用，這無疑是有益於中印友好的。但是，我們究竟不能說，在他指責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破壞十七條協議、提出所謂中國對印度的“保證”等等的時候，他的話也是合乎事實真相和禮節的。至於說到冷戰的語言，那麼，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報刊，咒罵中國是“新的和凶惡的帝國主義”、

“擴張帝國主義”，攻擊中國平定西藏叛亂是“軍事干涉”，“殖民行動”，“強盜行徑”，所有這些，難道不正是“冷戰的語言”嗎？對於這類“冷戰的語言”，我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們的報紙幾乎守口如瓶。人們記得，直到四月十八日，周恩來總理還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出維護中印友好的熱誠呼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切所換來的却是對於所謂達賴喇嘛聲明的大事宣揚，却是對於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的更放肆的攻擊。退無可退了，我們不得不起而反擊。有人企圖用“言論自由”來為印度的反華誹謗運動辯解。但是，他們為什麼不想一想，難道中國人就不要言論自由嗎？西藏是我國的領土，西藏問題是我國的內政，外國人尚且可以有所謂本能的反應，我國人民反而會沒有本能的反應嗎？現在，某些外國對於我們的誹謗運動似乎已經趨於低落了，理智正在重占上風。但是，也還有極少數人企圖繼續煽風放火。可以正告這些人：你們的反華誹謗運動一天不停，我們的反擊就一天不止。你們願意用多長的時間，我們就準備付出多長的時間，而且還準備着你們煽動別的国家來對我們進行圍攻，也準備着在你們後面還有世界上一切帝國主義分子的助威。但是，想用任何壓力來干涉中國內政，來挽救西藏大農奴主的窮凶極惡的統治，那是毫無希望的。世界上一切反共反華的人們對於我們越罵得凶，就越能暴露他們的真面目，也就越能教育全世界人民。

如前所說，現在世界上議論西藏問題的人很多，他們的出發點有許多不同。尼赫魯總理跟許多對中國顯然懷有惡意的人們不同。他跟我們在西藏問題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總的方面，他是主張中印友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沒有任何懷疑。我們所以對於尼赫魯總理的指責作這樣詳細的答復（當然在文章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了那些對我們顯然懷有惡意的人），正是因為，我們懷有充分的信念：分歧是可以縮小的，爭論是可以解決的。誠然，爭論是有些尖銳，因為這是我們祖國和西藏人民的切

身利益所在。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爭論从本质上能够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益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友好，并且在語言上也能够沒有疏忽了友誼和礼貌。我們完全同意尼赫魯总理的一些語重心长的、对中国人民十分亲切的話。他說，“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偉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緒，这將是一个悲剧。”中印友好是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基础的，我們的基本利益相同，我們的主要敌人也相同，我們决不会忘記我們的共同利益，而落入我們的共同敌人的圈套。这次的爭論虽然令人遺憾，但是我們坚决相信，它不会造成敌对情緒，它不会动摇我們两国的友誼。尼赫魯总理宣布：印度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热烈欢迎这个友好的声明。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爭論就会随之結束。中国从来沒有也永远不会干涉印度。我們还願意郑重地告訴关心印度安全的全体印度爱国者：一个民主的、繁荣的、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員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好的因素，而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对于印度共和国的什么“威胁”。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睦邻政策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我們两国近十一亿人民的友誼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就象喜馬拉雅山的不会动摇一样，那些誹謗者的胡說八道是毫无根据的。在尼赫魯总理一九五四年十月訪問我国的时候，他曾經說：“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面对着类似的問題，并且都已經坚决地走上前进的道路。这两个国家彼此了解愈深，那末，不但亚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証。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緊張局势，要求我們共同为和平而努力。”我們願意两国人民永远記住尼赫魯总理在这里所指出的真理。跟中国人民一样，偉大的印度人民是一貫珍惜中印两国的友誼的。我們深信，那些毒化中印关系的謠言，随着对于事实真相的了解，随着两国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必将为印度广大人民所識破，所抛

棄。中印兩國和兩國人民，將在和平建設的事業中繼續友好合作，並將繼續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攜手奮鬥。

附：尼赫魯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 就西藏局勢發表的講話

我曾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講過幾次話。上一次講話是在四月三日發表的，那時我通知人民院說，達賴喇嘛帶着一大批隨從，已經進入印度聯邦的領土。我願提供關於這方面的最新的情況，並且向人民院報告一下我們所掌握的這些新事實。

幾天以前，達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到達穆索里，在那裡，政府為他們的居留作了安排。那以後，我曾有機會訪問穆索里，並且同達賴喇嘛作了一次長談。

最近幾天，我們接到的報告說，有相當多的、為數幾千名西藏人最近越界進入東北邊境特區的卡門地區，此外約有幾百人進入了不丹領土。他們要求避難，我們同意了。他們當中帶武器的人被解除了武裝。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确切人數。在能夠按照他們的願望、同時考慮這種情況下的需要，使他們散去以前，現在正在一個營地作出暫時安排來安頓他們。我們不能讓這些難民無依無靠。除了牽涉到人道考慮之外，也還有法律秩序問題需要考慮。我們感謝阿薩姆政府在這件事情上給予的協助和合作。

就達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來說，我們不能不採取充分的措施，這是為了安全着想，也是為了使得他們免于受到大批印度和外國記者的騷擾。這些記者們由於渴望取得關於這件世界大事的第一手材料，很可能會使達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麻煩，並且幾乎會使他們應接不暇。我們急切希望給予達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保護，同時我們也同意讓這些新聞記者有適當的機會見到他。我接到了通訊社和報紙的將近七十五個代表從提斯浦爾發出的

申請，要求我給他們這種機會。因此事先派了一名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到提斯浦爾去，去應付聚集在這個阿薩姆邦小城的報界代表和攝影記者們。這位官員作了必要的行政上的安排，來尽可能地滿足新聞記者們要會見達賴喇嘛和替他攝影的願望。達賴喇嘛在進入印度之後不久，就表示希望發表聲明。我們後來得到通知，這個聲明將在提斯浦爾發表。我們的官員為向報紙記者們分發聲明譯文作了安排。

鑒於所提出的某些不負責任的指責，我願意說清楚，達賴喇嘛對於這項聲明以及其後他在穆索里發表的較簡短的聲明完全負責。我們的官員同這兩個聲明的草擬或者準備沒有關係。

我無需對人民院說，達賴喇嘛完全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進入印度的。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從未建議他來印度。我們自然會考慮到他謀求在印度避難的可能性，當這樣的請求提出時，我們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帶着大批人進入我國偏僻的一隅，這在運輸、組織和安全方面造成了特別的問題。我們派了一名官員在邦迪拉迎接達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並且護送他們到穆索里。其所以選擇這位官員，是因為他曾任駐拉薩總領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是為達賴喇嘛和他的官員所熟悉的。選擇穆索里作為達賴喇嘛的居留地是在了解了他自己本人這個問題上的願望和在他同意之後才最後確定的。我們方面並不想對他施加任何不恰當的限制，但是在特殊情況下，不能不作某種安排來防止任何不幸。應該記住，在西藏發生的最後發展到達賴喇嘛離開拉薩進入印度的那種事件，在印度人民中間和世界報界中引起了極大的關切。在他到達穆索里以後，就採取了措施來防止達賴喇嘛受到要想見他的群眾和新聞記者的麻煩。除此之外，對他的行動沒有任何限制。曾經告訴他，他和他的隨行人員可以在穆索里隨意走動。應當記住，達賴喇嘛最近不僅經過了一次艱苦危險的長途跋涉，而且遭遇了一場令人哀傷的經歷，甚至硬心腸的人也不能不感到震動的。而他不過剛剛二十四歲。

这就是某些十分明显的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着可能有深远后果的严重发展。西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着悲剧，人们冲动了起来，发出了种种指责，并且使用了只会使局势更糟、使我们同我们北方邻国的关系恶化的语言。我确信，人民院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考虑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节制和运用智慧，使用温和确切的语言。在现在的冷战时代中，有一种使用放纵的语言和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狂暴的指责的倾向。我们幸而一直置身于冷战之外，我希望在这一次，就象在任何其他时候一样，我们将不使用冷战的语言。问题太严重了，不能以随便的或者激动的态度来处理。因此，我愿呼吁报刊和公众说话时要有节制。我感到很遗憾，我们这方面偶尔也有失去节制的时候。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几天以前，有人对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表现了严重的不礼貌。这是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在孟买干的事。我们不能让自己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之下被推上错误的道路。

向中国的领袖、报纸和人民发出任何类似的呼吁的事，不能由我来做。我所能说的只是，对于中国的负责人士对印度所作的评论和指责的语调，我感到非常难过。他们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以行为有度和彬彬有礼著称的伟大国家，就尤其令人难过。对印度所作的指责如此荒诞，我觉得很难对待这些指责。有一种指责说我们劫持达赖喇嘛。中国当局肯定应当知道我们在这个国家中是如何行事的，我们的法律和宪法是什么样的。即令我们有这样的意向，我们也无法违背达赖喇嘛的意志而对他实行某种拘留。而且根本不存在我们想这样做的問題。我们这样做，不能得到什么，而只会得到困难问题的负担。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能够容易地澄清的。达赖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西藏或者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由于班禅喇嘛特别发表了某些奇怪的言论，我已经声明，我们欢迎他到印度来亲自会见达赖

喇嘛。如果他願意这样做，他将受到一切礼遇。我还說过，中国大使或中国政府的任何其他使者可以为此目的前来印度会见达賴喇嘛。任何人要和平地到印度来都不会遇到障碍。不管我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們將給予他一位客人应受的礼遇。

还提出了另一个甚至更奇怪的关于“印度擴張主义分子”的說法，据說，“印度擴張主义分子”是英国的帝国主义和擴張的傳統的继承者。英国的政策是对西藏实行擴張的政策，而且他們在本世紀早期曾以武力来执行这种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我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殘酷的冒險，它給西藏人带来了很大的損害。由于这种冒險的結果，当时印度的英国政府在西藏建立了某些治外法权。当印度独立时，我們继承了这些权利中的一些。由于我們是完全反对在另一个国家拥有任何这些治外法权的，我們不想保持这些权利。但是人民院知道得很清楚，在独立和分治后的早期，我們非常忙，而且我們必須应付我們自己国内的非常困难的局面。我們沒有去注意西藏，如果我可以这样說的話。由于不能够找出适当的人員来担任我們駐拉薩的代表，有一段时期我們让原有的英国代表繼續在拉薩留任。后来印度人代替了他的位置。在中国軍隊进入西藏以后不久，这些治外法权的問題就提出了，我們毫不犹豫地同意放棄这些权利。不管西藏可能出現什么事态发展，我們本来总是要放棄这些权利的。我們从西藏的某些地方撤出了我們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設施和休息所。我們規定了潘查希拉五項原則，把我們同西藏地区的关系放在新的基础之上。我們非常关切的是維護印度和西藏之間在香客往来和貿易方面的傳統联系。我們在这个問題上采取的行動以及我們后来有关西藏的所作所为足以証明我們的政策，足以証明印度在西藏沒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的确，甚至从最狹窄的实际观点来看，任何其他政策都会是錯誤的和无用的。自从那时以来，我們一直不仅竭力遵守我們締結的協議，而且竭力謀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誼。

因此，竟然提出这些既不适当又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这是使我们感到深为遗憾和惊讶的事。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这种深刻的遗憾情绪，特别是对最近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会议上的发言的深刻遗憾情绪。

我前些时候说过，我们的广泛政策是受三个因素支配的：第一，维护印度的安全和完整；第二，我们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我们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我们将继续奉行这种政策，因为我们认为，这不仅在目前是正确的政策，在将来更其是正确的政策。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大国，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我们这方面将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也会这样做，我们希望不要说出什么话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五项原则之中就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我以前已经说清楚，关于噶伦堡是西藏叛乱中心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有众多的西藏血统的人作为印度国民居住在我們印度。我们印度还有一些西藏移民。所有这些人都是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在他们中，有些人对于西藏的事态发展感到极不愉快；有些人无疑是有反中国情绪的。我们已经向他们表明，不允许他们从印度进行任何颠覆性活动，我要说，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动是遵照了印度政府的指示的。显然我不能说某人没有秘密地干某件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象或者说住在噶伦堡的一小批人组织了西藏的一次大规模骚乱，这似乎要拿出很大的想象力，并且不顾明显的事实。

康巴暴乱是三年多以前在中国本部靠近西藏的地区发生的。难道要噶伦堡对此负责吗？这次暴乱逐渐扩大，而且无疑在沒有参加这次暴乱的众多的西藏人思想上造成了强烈的印

象。對他們的前途的恐懼和憂慮控制着他們的心灵，激昂的民族主義感情支配着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恐懼也許是沒有根據的，但是這種恐懼無疑是不能否認的。要適當地對待這種情緒，只能採取比戰爭溫和的辦法。

當周恩來總理兩三年前到這裡來的時候，承蒙他同我相當詳細地討論了西藏問題。我們進行了一次坦率 and 充分的會談。他對我說，雖然西藏長時期以來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不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個省。那里的人民不同於中國本部的人民，正如中國的其他自治地區的人民不同於中國本部的人民一樣，儘管他們構成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因此，他們認為西藏是一個將享有自治權的自治地區。他還對我說，誰要是以為中國將把共產主義強加於西藏，那是荒謬的。共產主義是不能以這種方式強加在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的，他們不想這樣做，儘管他們希望逐步地實行改革。他們打算甚至把這種改革也推遲相當的時候。

大約在那個時候，達賴喇嘛也在这里，我當時同他作了長談。我告訴他周恩來總理的友好的態度和他關於尊重西藏自治的保證。我當時建議他真心誠意地接受這些保證，進行合作來保持這種自治，並在西藏實現某些改革。達賴喇嘛當時同意，他的國家雖然據他說在精神方面是先進的，但是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是非常落後的，因而需要改革。

這些友好的意圖和態度究竟實現到了什麼程度，這不是由我們來說的事。情況無疑是困難的。一方面，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迅速前進的社會；而另一方面，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沒有改變的、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很大，看來很難有任何會合點。與此同時，某種形式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來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發展了，西藏長期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部分地被沖破了。雖然，物質上的障礙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却增加了。顯然，沖破

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甚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去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三天前我在穆索里同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我谈到了他不得不应付的各种困难，他的人民对于那里的情况的日益增长的愤懑，谈到他如何设法约束他们，谈到他认为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的佛教正在受到威胁的想

法。他說，在最後時刻來到以前，他還不想離開拉薩。只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據他說幾發炮彈向他的宮殿打過來時，落在附近的池塘中時，他才突然決定離開拉薩。在當天的幾個小時內，他和他的隨行人員離開了拉薩，開始了前往印度邊境的危險的旅程。離開是這麼匆忙，甚至不可能攜帶足夠的衣服等雜物。當我和達賴喇嘛會談時，他的隨行人員一個也沒有在場。連譯員也是我們自己的。達賴喇嘛告訴我，先前發表的兩個聲明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存在任何人強迫他發表的問題。儘管他很年輕，可是我很難想象他會被迫做他所不希望做的事情。我完全同情這個青年人。他在年輕的時候就不得不擔起重担和承擔巨大的責任。在過去幾個星期，他身心十分勞累。我勸他休息一個時期而不要作出任何倉卒的決定。他對於西藏的情況感到很不愉快，他特別切望戰鬥停止。



第四輯

偉大的十年(摘錄)

周恩來

国家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設給予极大的注意。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資超过七十亿元。現在許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經建設了新的工业基地,修通了鐵路和公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五八年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粮食产量和牲畜也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銷售額,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四点七倍,收購額增加了五点二倍。少数民族学生数相当于解放前的九倍以上。医院和疗养院已經达到七百七十五个,共有床位三万四千多;此外还有医疗保健所(站)一万四千多个。各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人口不断减少的傾向已經完全扭轉了过来,出現了經濟文化生活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西藏地区过去因为民主改革长期受到阻撓,情况比較特殊;但是在叛乱平定以后,人民也积极地开始了向新生活的进军,幸福和进步的西藏不要很久就会建設起来。

人們也知道,十年前的中国,国家的政治状况是极端黑暗和反动的。帝国主义者走狗——买办資本家、封建地主、軍閥官僚和土豪劣紳,騎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处在絕對无权的奴隶般的地位。許多少数民族的人民,除了遭受帝国主义者和本民族的貴族、地主、奴隶主的压迫以外,还遭到

汉族統治者的民族压迫。国家长时期內是分裂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各派軍閥的混战和反动統治者发动的反革命內战，几十年間連綿不断，使人民飽受战禍。在国民党統治时期，盜匪、流氓、会道門到处猖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十年来这一切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压在人民头上的貪污腐化的恶政府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世代所梦想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勤勞的政府。人民无权的状况已經永远結束；极其广大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最广闊的民主。民族被压迫的現象消灭了，我們的祖国已經成为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友爱互助的大家庭。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巩固的統一。盜匪、流氓、会道門以及娼妓、乞丐、賭場和毒品，一概清除了，社会秩序极为安定。广大群众团結在一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干劲冲天地建設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烏 兰 夫

我国各民族人民，以无比欢欣的心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巩固地树立起来。各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已经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磐石一般地巩固起来了。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由许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之间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制度下，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帝国主义的侵入，加深了我国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苦难。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近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长期的共同的革命斗争，把我国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反动统治，彻底地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根本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关系，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十年来，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了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充分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及二十九个自治州、五十四个自治县。在全国建立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各少数民族在自治地方都根据宪法规定，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一切杂居的和散居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各民族在祖国的大家庭内，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定，都是国家的主人翁。

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迅速地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大大地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观念，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充分发挥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祖国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大约有近三千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大约有四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大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奴隶制度，此外，还有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般都落后于汉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仍沿用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或者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许多少数民族还没有文字，其中有些民族仍然用刻木、结绳的古老方法记事。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社会改革。现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少数民

族人口的地区都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一九五八年又和汉族地区一起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胜利；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加入人民公社的农户已占这些民族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已经从封建制度、奴隶制度以至原始公社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超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可以预料，西藏人民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也一定会经过必要的发展过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化的大道。

十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经济上的实际不平等，正在逐步得到改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面貌更有了飞跃的变化。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相当于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二倍多。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少数民族牧业区的牲畜头数，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少数民族人民的购买力已大大提高，一九五八年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销售总额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四倍多。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一九五八年，全国少数民族的大、中、小学生共计四百六十五万人。同解放前比较，大学生增加了三十五倍，中学生增加了一百一十倍，小学生增加了八倍多。有些过去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现在已经创造了文字，并且有了用本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报纸和杂志。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文化正在蓬勃地发展起来。在卫生事业方面，一九五八年少数民族地区已有了七百五十座医院，二十五所疗养院，三万四千多张病床，十七万多卫生技术人员，医疗、保健、妇婴卫生机构已经在少

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建立起来,有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經基本上得到控制。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卫生医疗工作的开展,許多少数民族的人口都在迅速增加。例如,內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口从自治区成立的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三十多万人,相当于該区原有蒙古族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五十八万多人,相当于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多。

少数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是同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解放后几年来,国家每年都給少数民族地区以巨額的財政补助,发放各种貸款、救济款,設置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費、卫生医疗补助費等,并且在許多民族自治地方直接投資进行重点建設,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經濟、文化的建設事业。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七年中,国家对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业基本建設投資共达三十四亿一千多万元。同时,国家还有計劃地从內地动員青壮年,前往迫切需要劳动力支援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設。駐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解放軍,也积极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經濟和文化。他們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或其他經濟、文化战綫上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国家在干部、技术人材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說了。毫无疑问,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繼續跃进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我們国家和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的帮助,将会越来越多。这种帮助,对于各少数民族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对于这种帮助都充滿了感激的心情。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也积极地支援了国家的建設和帮助了汉族人民,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不断胜利,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已經在我国各民族間普遍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民主改革完成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全民整风运动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各民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平等互助，大团结，大协作，共同劳动，共同发展。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兴修水利、大炼钢铁以及其他一切为争取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中，打破民族界限和地区界限，实行大团结、大协作，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热情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甘肃省的引洮工程，就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大跃进中实行大团结、大协作的许多突出事例之一。引洮工程建设在海拔一千多公尺到两千多公尺的高山之上，全长一千四百公里，流经汉族和回族以及其他民族聚居和杂居的二十多个县、市，相当于世界著名的苏伊士运河的八点五倍，巴拿马运河的十七倍多。全部完工以后，可以使一千五百万亩到二千万亩的旱地变为水田，可以植树造林一千多万亩，促进水土保持五万平方公里，扩大草原一千五百多万亩。同时还可以利用渠道的落差建立一百多个中、小型水电站。在水上交通方面，二十吨到一百吨的船只可以在海拔一、二千公尺以上的山梁水道上通行无阻。这样大的工程，从一九五八年开工，在甘肃省的汉、回、藏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同心协作之下，第一期从岷县的古城到隴西县大营梁六百公里的工程，在今年内就可以大体完成。当地汉、回、藏等各民族人民在这一工程中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全省各族人民就集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并且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前往支援。各民族人民互相支援的例子，在全国是很多的。如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旗民族团结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听说

汉族地区的紅星公社遭了大水災，生活困难，就无偿地送給他們土豆、白菜各万斤，飼草十万斤。当五原、布特哈等农业区的旗、县缺乏燃料时，牧区的烏拉特中后联合旗、陈巴尔虎旗就收集了十多万斤燃料去支援他們。又如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在去年大炼鋼鉄的运动中，組織了六万多人的一支僮、苗、瑤族远征軍，远行十多天，行程数百里，支援了百色和田林县。各民族人民都以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和支援别人为无上光荣。互相支援和协作的范圍，由工业、农业到交通运输业，由劳动力、技术人員到生产資料和建設資金，由乡、社之間到县与县、州与州之間以至各省(市)、区之間。互相协作和支援的規模，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一直到几十万人。国家在內蒙古建設的包头鋼鉄联合企业和在新疆建設的克拉瑪依石油工业基地等巨大的現代化工业，都是在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之下兴建的。

为了取得大跃进的胜利，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一九五八年以來，还展开了广泛的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互相參觀訪問，互相交流生产技术和建設經驗，开展友誼的竞赛，这对于变落后为先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广西僮族自治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原来是个比較落后的地方，长期缺粮，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內該县的农业生产却一跃而名列自治区的前茅，成为全区粮食增产的一面紅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习和推广了外地的和本地的先进增产經驗。总計从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底，該县組織的到外地和在本县的參觀訪問，先后一百多次。而三江的增产經驗，又为全国許多民族地区所重視，前来參觀訪問者絡繹不絕。一九五八年秋季还在这里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現場观摩會議，推广了他們的先进經驗。

人民公社是发展我国各民族經濟、文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在更大的范圍內，把各个不同的民族成員組織起来，在一个人民公社內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互相学习和

共同进步。它最便利于彻底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偏見，不断增强各民族成員之間的兄弟信任和同志合作；也最便利于各民族成員之間互相学习語言文字，互相吸收先进經驗和优良文化成果，从而也最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人民公社是一种規模宏大的、多种經濟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嶄新的社会組織形式。它可以最有成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中各民族的劳动力，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生产特长，实现各民族之間的互相协作，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各种建設，使各种經濟得到迅速的发展，使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迅速地得到改善。

人民公社具有比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多的和增长得更快的公共积累，可以更有計劃地和更加合理地来安排社內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有了人民公社，就更便于帮助那些在生产上还比較落后和生活上还比較困难的民族，使他們能够和走在前面的民族一起得到共同的发展，逐步地但是迅速地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人民之間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上的实际不平等，使各民族人民都能过幸福美滿的社会主义生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不断发展中，我国各民族之間的接触愈来愈多，联系愈来愈密切，彼此之間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影响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不只是表現在各民族成員在同一人民公社、工厂、机关、学校內部的共同劳动、互相学习上，而且还表現在各民族地区之間联系的空前加强上。十年来，我們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修筑了近十万公里的公路、几千公里的铁路，并且开辟了十七条航空綫路。这些公路、铁路、航空綫路和汉族地区的交通綫路联結起来，就大大地縮短了各民族地区之間的距离，加强了中央和边疆的联系，为各民族地区之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人們相互之間的接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国营商业机构网已經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地建立起来，深入到偏僻的乡村、山区和牧区，为各民族人民服务，通过

物資交流，更把我国各民族地区从經濟上联結成为一个整体。

过去我国各民族之間，在社会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所存在的差異，經過十年的大变革，有的已經根本改变，有的正在迅速改变。在社会經濟的所有制方面，汉族和絕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起了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經濟、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于汉族地区的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变。所有这些，就使我国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越来越多。毫无疑问，随着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在我国民族关系中的这种进步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現出来。对于民族关系中的这种进步趋势，我們必須采取热烈欢迎和积极贊助的态度。

偉大的列宁曾經說过：“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一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許多小国家的現象和各民族間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一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①他并且說：“无产阶级不能贊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贊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別、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贊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間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②

当然，我国現在还处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时期，距离各民族的融合还很远。各民族的融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在各民族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只有在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才能逐步地达到各民族的融合。列宁曾經說过，正如人类只有經過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經過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③在目前我国各民族之間不仅存在着語言文字、風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別，而且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0頁。

② 同上书，第20卷，第18、19頁。

③ 同上书，第22卷，第141頁。

在經濟、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也还很不平衡，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我們在一切工作中，还必须認真照顾各民族的发展特点，为消除各民族之間的事实上不平等而努力。各民族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經濟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还要有一个发展繁荣的时期。也只有各民族經濟、文化高度发展繁荣的基础上，才能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現在，摆在全国各民族人民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要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爭取在今后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內，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了这个任务，就能够根本上改变我国各民族地区的經濟、文化落后面貌，达到我国各民族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共同繁荣。为了实现这个偉大的历史任务，我們必須繼續不断地巩固国家的統一和发展各民族之間的大团結。毛澤东同志說：“国家的統一，人民的团結，国内各民族的团結，这是我們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証。”^①

在我国六亿五千万人口中，汉族人口約占百分之九十四，并且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走在各少数民族的前面。汉族在我国各民族中起着先进的主导的作用，是我国革命和建設事业的主力軍，負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光荣責任。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左右，但是总数也有三、四千万人，并且分布的地区广大，約占我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內，各种資源非常丰富，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汉族人民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我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頁。

国各民族人民必須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在統一的祖国大家庭內，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以汉族为中心的大团结，使社会主义建設繼續向前跃进。

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統一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了实现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更大跃进，必須繼續向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各种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傾向，特别是应当向各民族干部进行无产階級民族观的教育，使他們自觉地克服各种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或其残余。

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資产階級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它和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利于我們偉大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間的团结合作，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曾經在全国範圍內对各种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我国各民族中已經深入人心，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上已經搞臭。但是資产階級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我国还远沒有絕灭，無論是大汉族主义或者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残余，今后还会在各种不同的場合，特别是在階級斗争的紧要关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經過长期的反复的政治思想斗争，才能够彻底地将它克服下去。

必須看到，剝削階級还没有最后消灭，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进行。帝国主义还在对我国各民族进行挑撥离間。即使在剝削制度和生产資料私有制度完全消灭之后，資产階級思想的影响还会在人們的头脑中保持一个很长的时期。这种影响在民族問題方面，要比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加頑固，因为它可以在民族外衣下很巧妙地伪装起来。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其殘余，作長期的堅持不懈的鬥爭。

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搞好我國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① 我們今後在實際工作中，必須繼續貫徹執行這個指示。一方面要繼續警惕和克服大漢族主義傾向，另一方面也絕不能對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有任何疏忽。不管它是什麼民族主義的傾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批判和克服。

帝國主義和國內外一切反動派，是不甘心他們在中國的失敗的。他們仍然在千方百計地陰謀破壞我們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企圖達到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和重新奴役我國各民族人民的罪惡目的。當然，他們的目的是不可能達到的。因為中國各民族人民已經緊密地團結和高度地覺悟起來了。任何帝國主義和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陰謀詭計，都會在我國各民族人民團結的力量面前碰得粉碎。今年三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策動下所發動的反革命叛亂的迅速失敗，就是最好的證明。可是，我們仍然必須警惕來自帝國主義和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方面的對我國民族關係的挑撥和破壞，絕不能讓敵人的陰謀得逞。

為了進一步鞏固祖國的統一和發展各民族之間的團結，應當照顧各民族的特點，正確處理在人民內部發生的各種民族問題。在一切包括有不同民族成員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和人民公社中，都必須繼續貫徹執行民族的平等團結、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和共同進步的原則。在多民族的人民公社內，應當注意在社務委員會和社員代表大會中，使各民族都有適當數量的委員和代表名額，並且應當注意培養和提拔各民族幹部。對各民族在生產上和生活中的特點，應該適當照顧，充分發揮各民族成員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3頁。

的特长。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须互相尊重；并且应当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经常交流各种生产建设经验。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各民族人民的互助合作和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取得伟大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幸福。各民族人民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充满了无限的热爱。过去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为实现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提前三年即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让我国各民族人民遵循这个伟大的号召，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而英勇前进！

我国民族政策的偉大胜利

汪 鋒

十年以前，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結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反动統治，廢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开辟了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我国进入了一个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个总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國內民族問題方面的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設祖国的大家庭；在統一的祖国大家庭內，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經濟、政治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遺留下来的各民族間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躋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偉大的历史任务。实现了这个任务，就可以使我国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达到完全的平等，就可以使我国各民族在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进入人类历史上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阶段，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問題。

国家的統一、各民族間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和共同发展，

是我国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①

民族平等是我们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所一贯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一律都享有平等权利，禁止对任何民族的压迫和歧视。也就是说，在我国任何民族压迫和歧视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国各民族无论大小，也不管他们还处在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上，都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都有获得充分发展的自由，都是我们国家的主人翁。十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贯彻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不但在全国范围内向各民族人民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了关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宣传教育，并且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决定。同时，关于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在我国的选举法中也作了专章的规定，对少数民族作了特殊的必要的照顾。使各少数民族都平等地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定。为了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中央人民政府还先后派出了六个访问团，分赴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内蒙古和西藏等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和慰问。所有这些都对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族的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分。”根据宪法规定，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除了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之外，还享有各项自治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就是要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使有着自己或大或小聚居区的（可以构成一级行政自治单位的）少数民族有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各民族之间互相信任和友好合作。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为依据并结合我国民族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决定的。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①“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②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土地，长期以来就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出现于世界。在民族成分、居民分布、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如下的主要特点：

（一）在全国六亿几千万人口中，汉族人口约占百分之九十四，蒙、回、藏、满、僮、维吾尔、苗、彝、布依、朝鲜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少数民族分布的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1页。

^② 同上书，第402页。

地区广大，約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二)民族杂居的情况特别显著。絕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以自己或大或小的聚居区(有些少数民族是沒有聚居区的)和汉族交錯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无論是在經濟、政治或文化生活方面，少数民族都和汉族很密切地联結在一起。(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之間发展了經濟联系和文化交流，并且很久以来，就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許多少数民族在內的統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这种封建集权制的国家內，虽然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歧視制度，各民族之間也不时有战争，汉族的統治者压迫过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統治者也压迫过汉族，但是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联系以及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友誼，仍然冲破了种种障碍，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四)一百多年以前，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变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我国各民族的生存，无例外地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共同的命运把我国各民族进一步联系起来，进行了长期的反对国内外敌人的共同的革命斗争。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領導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更把我国各民族人民紧密地結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五)由于历史的发展，汉族在我国各民族中不但人口最多，是我国的主体民族，而且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一般也走在各少数民族的前面，起着先进的主导的作用。(六)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挑撥我国各民族在长久历史发展中所形成起来的联系，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策动所謂“民族独立”，妄图以“分而治之”的办法来达到它侵略和奴役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目的。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必須在一个統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內，更进一步地团結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对外共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区域自治，正是代表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反映了我

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现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二十九个自治州、五十四个自治县。党和国家在全国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和设立自治机关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各少数民族的干部已经迅速地大量地成长起来，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国已经有了四十八万多名以上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九四九年少数民族干部的四十多倍。无论在那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机关中，都有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并且有许多人担任了主要的领导职务。

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我国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必经途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各民族带来高度发展和繁荣，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总是和阶级问题相联系的，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当然不完全是等于阶级问题）。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是产生民族压迫、歧视和民族纷争的社会根源。只有在各民族中彻底的进行社会革命，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的制度，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列宁也曾经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和一般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8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9页。

各民族都必须进行社会改革，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确定不移的，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在我国，各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实行土地改革，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压迫、剥削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改变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社会改革是各民族人民群众自己的事，由于各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在什么时候进行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都必须依照各民族的发展特点，根据本民族的人民群众及与人民有联系的公众领袖的意愿去进行。也就是说，各民族在改革的时间上可以有先有后，在改革的具体方式、步骤、速度等方面也可以有所不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曾经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①

我国少数民族在改革以前，大约有近三千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地主经济，其中有些民族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这一类地区包括了回、满、僮、维吾尔等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蒙古族的一大部分人口，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除此以外，在我国藏族、傣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共约四百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农奴制度；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的大约一百万人口的彝族中，还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而在云南边疆的傈僳、佤、景颇、独龙、怒、布朗等民族地区，在内蒙古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地区，在黑龙江的赫哲族中，在海南岛的一小部分黎人中，则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原始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4—65页。

公社制残余，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这一类民族地区共約六十万人口。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經濟情况是很复杂的。不仅在各民族之間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且在一部分民族內部的不同地区之間的社会經濟結構也很不相同（例如彝族一部分已处在封建社会，但是在大小凉山地区却还保持着比較完整的奴隶占有制度），在蒙、藏、哈薩克等共約二百二十多万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則还从事着落后的畜牧业生产，他們無論在生产或生活方式方面，都和农业区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宗教在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信仰，許多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信仰喇嘛教或伊斯兰教；民族上层和宗教人物在許多少数民族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历史上反动統治階級的民族压迫和挑撥离間政策，在各民族之間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閡；許多少数民族內部的部落之間和教派之間的矛盾、糾紛也很多。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残余分子，一直在利用民族和宗教的关系进行破坏我国的各种阴谋活动。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党和国家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方針，分別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步驟和具体政策。在各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党和国家都充分地照顾了民族和地区的特点，认真地尊重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願，充分地和少数民族中与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領袖进行协商，然后再做出决定。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都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去进行。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所有汉族党员、干部，都必須在当地党組織的統一領導之下，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采取积极的帮助态度，但是絕不能包办代替或者是强迫命令。

根据这个方針，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牧业区的社会改革中采取了和农业区不同的政策。在农业区的社会革命中，一般是先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封建主、奴隶主的土地給无地或少地的貧

苦农民，廢除封建主、奴隶主的一切特权和剝削，解放劳动人民，然后再在土地改革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剝削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而在少数民族牧业区社会改革中，則并不分配牛羊（即不是将牧主的牲畜分配給沒有牲畜或很少牲畜的貧苦牧民），而是在其改革的第一步即民主改革中，廢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剝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牧工牧主两利和幫助貧苦牧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的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政策，然后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对牧主和牧民分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至于在那些阶级分化尚不明显、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还保有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和国家則采取了大力扶助他們发展生产和文化，直接通过合作化的道路——結合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不进行系統的民主改革运动），幫助他們逐步地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的方法上，党和国家不仅在一切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和汉族地区一样实行了和平改造，而且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牧业区、云南边疆以及四川、甘肃、青海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也采取了和平的方法。即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采取自上而下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的办法来进行改革。只要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同意放棄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剝削，接受改革，国家就采取适当办法，使他們在改革以后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同时說服劳动人民在改革中不对他們进行激烈的斗争。例如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对于一切沒有参加叛乱和不抗拒改革的上层分子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就不是采取简单沒收的办法，而是采取了和对待汉族地区资本家差不多的贖买政策，并且在政治上不剝夺他們的公民权利，适当安排他們的代表人物，和他們协商解决有关改革的时间、步驟以及各項具体政策，等等。各地在和平改革中的具体办法虽然不完全一

样，但是实质上都是对少数民族上层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种“赎买”，是一种革命的积极的政策。和平改革，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

采取和平的方法完成民主改革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可能，这主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全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并且在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地区（主要是汉族地区）已经完成了社会改革，有力量来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党在少数民族中建立的包括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对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平方法进行民主改革造成了有利条件。

长期以来，我们的党就在少数民族中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团结、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切具有反帝爱国立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人，一切赞成社会改革的人，党都和他們团结合作。只要他們不半途而废，党就和他們实行长期的合作。借助于这个统一战线，我们在各少数民族中巩固和扩大了反帝爱国以及赞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打击和孤立了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派，比较顺利地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由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存在，也便于我们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进行教育，采取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进行改革。但是，必须指出，和平改革之能否顺利地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愿望，还要看少数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上层分子对改革所持的态度。如果他們服从人民意志，接受党的方针、政策，那么和平改革就能够实现；如果他們违反人民意志，不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甚至起而反抗，那么和平改革就不能继续，只有坚决地粉碎他們的反抗，才能保证改革的实现。同时，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强力的或者是和平的）来进行改革，都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认真地贯彻实行党的阶级路线，才能保证改革的彻底胜利。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在我国許多少数民族中，宗教上层和宗教寺庙对人民群众具有种种封建特权和封建剝削，殘酷地压迫和殘害人民，严重地阻碍着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对于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剝削，党和国家在改革中采取了坚决廢除的方針。但是党和国家在改革中，对有关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始終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和区别对待的政策。严格地把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封建剝削制度和人們的宗教信仰問題加以区别，把宗教职业者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他們对教徒群众的勒索、虐害等非法行为加以区别，把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加以区别。一方面坚决地廢除宗教中的封建压迫剝削制度，鎮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一方面坚决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文物，繼續团结宗教界一切爱国守法的人士，不干涉宗教职业者的正当宗教活动，坚持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十年来，我們的党和国家领导我国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极为艰巨复杂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現在，全国少数民族中，除了西藏和其他一些人口很少的地区还正在进行民主改革以外，其他各民族地区都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进行了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这样，就使我国絕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从原来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以至原始公社制度的束縛下解放出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各民族的发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所有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又都和汉族地区一道，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了大規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結構的基层組織单位。

它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以后，在促进我国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方面显示了众所周知的巨大优越性，而且在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方面也表现了极大的优越性。

民主改革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我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我国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实际不平等，却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改变，就可以立刻消灭的。而不消灭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实际不平等，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

由于历史形成的种种原因——少数民族人口少，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没有或很少有产业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缺乏等等……，我国各少数民族即使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很难单单依靠本身的力量，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面貌。必须依靠国家和先进民族——主要是汉族的长期而有效的帮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帮助，只能是逐步的、有计划的和国家力量之所及的，但是积极帮助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解放以后，我们的国家虽然还处在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和开始建设的情况之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已经给了少数民族以巨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主要地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国家在有计划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中，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以特别照顾，历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总是高出于全国基本投资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能够以高出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向前发展。（二）在财力方面，国家每年都给予少数民族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助，发放各

种貸款、救濟款和生产補助費，設置少数民族教育事業補助費、医疗補助費，并且在广大的少数民族牧业区实行輕于农业区和城市的稅收政策，在一部分生产发展特別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于一定時間內免去稅收，在一部分生产工具特別缺乏和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无偿地发放农具，等等。同时，从解放一开始，党和国家就以极大的注意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貿易工作，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合理調整工、农业产品之間的差价，增加少数民族人民的收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三）在物資方面（包括工、农业产品、机器設備等等）国家給予少数民族地区以大力的支援。以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为例，在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几年中，国家从关內調往新疆的物資达二百万吨，由新疆調往关內的物資仅五万吨左右。（四）党和国家派遣大批干部（包括技术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工作，有计划地动员內地青年和工人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建設，駐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解放軍部队积极参加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各項建設事业。（五）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过去几年中，国家还帮助僮、布依、苗、彝、傣等十多个沒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設計和确定了文字方案。

由于党和国家的領導帮助和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的艰苦努力，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經濟和文化的容貌已經起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各民族人民意气風发，干劲冲天，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高潮，少数民族地区經濟和文化容貌的变化更快、更大。各民族在經濟上、文化上的实际不平等，正在逐步地但是迅速地趋于消灭。如果拿第一个五年計劃末的一九五七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一九四九年相比，那么就可以看見，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工业产值增长了四倍多。而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七

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少数民族牧业区的牲畜头数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总共增加了一倍以上。许多长期缺粮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做到了粮食自给而有余；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都已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地逐步建立起来，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开始建立起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例如内蒙古的包头钢铁工业基地，新疆的克拉玛依石油工业基地，等等。少数民族的工人队伍在一九五八年已经发展到八十多万人。二百多万的少数民族牧民已经由游牧走向定居游牧，交通运输事业也发展很快，公路的通车里程在一九五八年是九万四千多公里，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七倍多；铁路的通车里程已达六千三百多公里，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且在四个自治区的十七个重要城市和青海的西宁、玉树，云南的昆明、保山和西藏的拉萨等城市开辟了航空运输线路。

商业贸易也有极大的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营的商业机构已经遍布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私商对少数民族人民的高利盘剥，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各族自治地方的城乡购买力已提高了一倍至数倍，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国营、合作社营商业的销售总额，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四倍半以上。在教育方面，一九五八年全国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共计四百六十五万多人，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以上；和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比较，小学生增加了八倍多，中学生增加了一百一十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三十五倍，大部分自治地方都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是疾病流行，许多民族的人口在逐年下降。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用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到一九五八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广泛地建立起了各种卫生和医疗的机构，其中有医院七百五十座，疗养院二十五座，设有病床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张，比解放初的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九倍多。由于生活的改善

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开展，少数民族的人口已經有了很大的增长。例如內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口从自治区成立的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三十多万人，相当于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所有这些，都說明了我們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說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偉大和正确。

列宁早在四十年以前就曾經指出，在先进的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之下，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資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經過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国各少数民族解放以后在国家和汉族人民的帮助之下飞跃发展的事实，再一次証明了列宁这个論断的英明和正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我国各少数民族必須取得汉族的大力帮助，才能和汉族一起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繁荣，同样汉族也很需要少数民族的帮助。在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各民族之間的帮助是相互的，也是共同需要的。只是因为汉族在我国人口特別众多，并且經濟、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走在各少数民族的前面，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先进的主导的作用，所以他負有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特殊的責任。

我們的党和国家一貫反对不利于国家統一和民族团结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特別是注意在汉族干部和人民中克服大汉族主义傾向。为了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傾向，解放以后党和国家曾經在全国范圍內对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进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并且曾經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两次对全国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檢查，着重地批判了存在于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傾向；又在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全民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于繼續克服大汉族主义傾向的同时，着重地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傾向，揭露和打击了一小撮危害国家統一和民族团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对各民族干部

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大地提高了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在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经验证明，在民族问题上和在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上一样，要彻底地解决问题，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批判和克服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只有坚持不懈地和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其残余思想进行斗争，才能不断地巩固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胜利，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大协作、共同劳动、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在一切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普遍地确立起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所有这些，就使我们在十年以前建立起来的各民族自由、平等、互助、友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钢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任何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会在我国各民族人民坚强无比的团结力量面前被碰得粉碎。

现在，摆在我国各民族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争取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期间，党和国家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向各民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地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在帮助少数民族继续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同时，积极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尽可能地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使各少数民族都能够赶上或者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共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目前，全国各民族人民正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所鼓舞，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反右倾，鼓干劲，展开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实现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提前三年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英勇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革命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是我国各民族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是我国各民族人民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道路前进，才能使我国各族人民获得民族的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为了加强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的领导，必须继续加强党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对党的侵入和腐蚀。“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中国共产党党章）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只有当它能够抵抗住任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侵袭时，才能够成为坚强的战斗的组织。

十年来，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现在全国已经有了五十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九十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共青团员，一般少数民族地区，都普遍地建立了党和团的基层组织。各民族的党员和团员，都在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密切地联系群众，无论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站在群众的最前列，起了骨干和带头的作用。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严肃地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之

后,各民族的党、团员和干部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成为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有全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团结,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胜利。

建国十年来的内蒙古自治区

烏 兰 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了，这是我們偉大祖国光輝燦爛的十年。十年前，毛澤东同志庄严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号召全国各民族人民以勇敢、勤劳的姿态工作，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建設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让我們的民族以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全世界。十年过去了，我国各族人民热烈响应了毛澤东同志的号召，以辛勤的劳动，改变了祖国的面貌，我国人民做了我們先人許多年、許多世紀以来所沒有作到的事情。

建国十年来，內蒙古自治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有了巨大的发展，民族关系起了深刻的变化。

內蒙古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实现了統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統一的大家庭中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是蒙古族人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个愿望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偉大的民族政策，终于实现了。內蒙古民族三百多年来被分割統治的历史永远結束了，蒙古族人民真正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区內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都平等地参加了国家政权的管理，有的少数民族还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蒙古族人民、汉族人民、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了內蒙古自治区的主人。这种在統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区域自治，激发了蒙古族和各族人民建設祖国的自尊心、責任感、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为

各民族的发展，大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民族的行列創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新的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劳动、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这种新的民族关系更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为内蒙古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創造了有利的必要的条件。

内蒙古的巨大变化之二是彻底改变了封建所有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也改变了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和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从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全部实现了土地改革和牧区的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解放了为封建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一九五六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消灭了富农经济，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一九五八年，完成了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就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巩固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每一次生产关系的改变，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农牧业生产为例，一九四九年，内蒙古全区仅产粮食四十一亿斤，仅有牲畜九百四十万头，到民主改革实现的一九五二年，粮食就达到六十八亿斤，牲畜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头，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的一九五六年，粮食就达到九十一亿斤，牲畜达到二千四百三十六万头。没有生产关系的变化，要生产发展到这样快是不可能的。

内蒙古的巨大变化之三是经济文化建设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从工业生产看，内蒙古地区过去基础是极其薄弱的，虽有丰富的地下矿藏，但是得不到开发。建国十年来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一九四九和一九五八年比较，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由九十五个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七个，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百分之九点四一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九点九六。钢铁工业、

机械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交通运输、森林工业、轻工业和手工业、基本建设都迅速发展起来了。一九五八年全区生产了一万三千多吨钢，八万多吨铁，永远结束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森林采伐达到年产三百二十多万立方米，煤炭年产达到五百四十四万吨，包兰铁路、集二铁路的通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内蒙古交通闭塞的状况，机械工业，从只能修配发展到能够制造设备，轻工业、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在逐步改变绝大部分日用工业品由区外供给的现状。国家大企业的建设，正在大大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的面貌，国家重要钢铁工业基地之一的包钢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第一号高炉已经投入生产，成为我们国家钢铁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工业的发展，不但改变了经济面貌，还生长出了蒙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工人队伍，现在全区四万三千四百蒙族职工和一万五千七百其他各少数民族职工中，已经有一万四千九百人在各工矿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成了产业工人，这对蒙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进步和繁荣，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从农牧业生产看，粮食总产量一九四九年为四十一亿斤，到一九五八年达到一百亿斤，牲畜一九四九年为九百四十万头，一九五九年六月达到二千八百零二万头。

与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得到巨大的发展。建国初期，自治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只有三十八所中等学校，六千三百四十一所小学。到一九五八年，全区已有高等学校十八所，学生五千一百九十多人；中等学校已发展到四百一十二所，在校学生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十二点七倍；小学已发展到一万四千四百零九所，在校学生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二点四倍。十年中，医院增长了四十三倍，病床增长了近二十二倍。由于卫生保健事业的普遍发展，内蒙古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仅终止了人口急剧下降的情况，而且还有了很大的增长。社会购买力有很大增长，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

内蒙古的巨大变化之四是在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实现了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中央、毛澤东同志和党的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立即为內蒙古各族人民所拥护，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一个思想大解放、民族大团結、生产大跃进、高速度发展生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局面展开了。全党全民整風、反右派、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敢說、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发揚了。大炼鋼鉄、大办水利、大搞深耕、大搞牧区建設、大搞各項生产运动，取得了一九五八年的工农牧业大丰收和一九五九年的繼續跃进。总路綫的执行，整風的胜利，生产的大跃进，促进了农村牧区的人民公社化，在一九五八年的秋冬，仅仅几个月的時間，人民公社就建立起来了。农村牧区共建立了八百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經過整頓，已經走上了巩固健全发展的道路。并且已經夺得了一九五九年小麦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和牲畜純增百分之十四点五的大丰收。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总路綫的光輝照耀着我們前进的道路，必将繼續引导我們走向新的胜利。

上述事实說明，建国十年来內蒙古自治区的成績是巨大的，自治区的面貌已經有根本性质的改变，并且还在繼續改变。这些巨大成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的胜利，是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領導的胜利，是党的偉大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胜利，是全区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号召的結果。

內蒙古自治区十年来的革命和建設証明：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領導，是蒙古民族和自治区各族人民获得解放、得到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保証。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它不仅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捍卫者，而且也是中国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捍卫者，当然也是蒙古民族最高和最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內蒙古各族人民过去已

經深切地体会到这个真理。今后，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經過社会主义建設，把自治区建設成为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牧业、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民族自治区，使蒙古民族和自治区內其他少数民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

第二，区域自治的政策，是解决中国民族問題的钥匙，也是解决蒙古民族問題的唯一正确途徑。在內蒙古实行区域自治后，既使蒙古民族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地激发了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又使蒙古民族以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在祖国大家庭內，同各民族人民亲密团結、互助合作，共同管理建設自己的国家。这既符合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內蒙古自治区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雄辯地駁倒了那些曾經认为区域自治不能解决內蒙古民族問題，而主張实行“独立自治”的民族分裂主义者的謬論。同时，也消除了曾經有一些人怕在內蒙古实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区域自治，会影响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积极性的顾虑。

第三，一定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发展，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是和祖国統一团結的大家庭中各民族間經濟合作与文化交流分不开的。政治团結是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必要前提；經濟合作与文化交流又促进新的民族关系的发展。

內蒙古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沒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內蒙古的民族解放是不可能的；內蒙古自治区如果沒有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沒有全国各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支援，就沒有今天的新內蒙古。

为了巩固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必須坚决反对与經常批判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各族人民。民族主义既可以表现为人民內部矛盾，也可

以表现为敌我矛盾。对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动分子破坏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一定要彻底粉碎；对于人民群众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要通过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通过耐心的批评和说服来解决。

汉民族的帮助是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发展繁荣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正如同汉族绝对不能轻视国内其他兄弟民族在祖国缔造的历史上，在新中国的创造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样，国内各兄弟民族也决不能轻视和拒绝汉族老大哥的帮助。汉族人口多，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有较高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这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发展繁荣，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汉族在自治区建设中的作用，必然还要继续增加，而这是内蒙古民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发展繁荣所必需的，也是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所必需的。

第四，进行社会改革，是解决民族问题、使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关键。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民族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只有改革造成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社会制度，推翻阶级剥削制度，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建立新的民族关系。只有在改革旧制度的基础上，才能使落后的民族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民族。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立即实行了民主改革，并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的不断胜利，促进了蒙古民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更快的发展繁荣，随着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各民族内部的团结空前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也越来越巩固。

第五，为了使内蒙古民族摆脱落后状况，提高到先进民族行列，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实行了区域自治，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基本条件，还不是民族问题的最后解决。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

进行經濟、文化建設，必須从自治区的現实条件出发，充分發揮各族人民的特点和优点，提倡虛心学习兄弟省区的先进經驗，既反对故步自封，又反对机械搬套。

內蒙古自治区在发展經濟文化事业中，得到了党的国家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幫助，得到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兄弟般的援助，沒有这些帮助和支援，要想达到今天这样輝煌的成就是不可設想的。但是，对內蒙古自治区人民來說，則一貫強調全局观点和自力更生，反对不顾整体的本位主义思想和依賴思想，时时刻刻关心和服从国家整体利益，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則，忠实地执行对国家对全国人民应尽的义务。

第六，內蒙古自治区的建設发展过程，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所代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傳播过程，是毛澤东思想、党的总路綫以及党的各項方針政策胜利实施的过程。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的广泛傳播，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觉悟，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去年广泛深入宣傳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先进的思想武装了群众，就造成全区千万人民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局面，就是极其生动的例証。

內蒙古自治区建設的成就，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証明了毛澤东思想是最正确的代表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思想，証明了党中央所制定的总路綫以及具体方針政策的完全正确，我們必須学习再学习，理論联系实际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經濟学和階級斗争的学說，繼續提高我們的政治理論水平，以便把我們的工作作得更好些。

第七，政治挂帅，群众路綫，任何时候都是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証，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是这样，在进行經濟文化建設中也是这样。十年經驗証明，無論在土地改革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凡是加强党的領導，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发动群众自己起来

解放自己的，都获得了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是这样，当我们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炼钢铁的时候，炼钢铁的成绩就不大，而当我们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炼钢炼铁的任务就解决了。工业如此，农牧业也如此，一切社会主义建设都如此。只要我们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地大胆地发动群众，正确领导群众前进，可以预料，所有革命任务都是可以顺利实现的。

建国十年了，在十年的历程中，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达到了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未曾达到过的成就。但是对于一个先进民族所应该达到的水平来说，从我们所需达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来说，现在还是“一穷二白”的，经济、文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还是很低的。要完全改变这个“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继续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今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提前三年完成或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主要工农业生产指标，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内蒙古各族人民正在坚决地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在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的事业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内蒙古自治区。

现在当全国兄弟民族同声欢庆自己的伟大的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内蒙古各民族人民，

同全国人民一样，既为今天过着如此美丽、幸福的日子而骄傲；同时也准备为迎接无限美丽和幸福的明天而战斗。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是决不会松懈自己的努力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进的十年

赛福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全国以及自治区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

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造成新疆地区社会生产停滞，经济文化落后，各民族间互相歧视隔阂很深。解放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反动统治，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使新疆地区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社会面貌改变了，半封建的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境地，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各民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团结友爱，亲密合作，互学互助。现在，自治区各族人民正和全国人民一起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英勇迈进。

十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指导下，自治区进行了许多巨大的革命工作，并按不断革命的精神，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深入的群众运动。

解放以后，自治区大力进行了土地改革，把七百四十二万多亩土地和大量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分给一百九十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消灭了封建势力。随即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

九五八年在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整風运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运动的基础上,全疆农业区和牧业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了四百五十一个人民公社。这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群众运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教育了各族人民,提高了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积极性。这就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結合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們根据共同綱領和宪法規定,依照新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和特点,积极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以維吾尔族为主的自治区和区内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全区共建立了自治州五个、自治县六个。区域自治的实现,使新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实现了对本民族地区事务处理的当家作主,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自治区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推动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設。

在中央的領導、扶助和各省、市的支援下,自治区积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經濟文化建設,广泛地开展了生产运动和文化技术革命运动。我們超額完成了自治区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并順利地进行着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設。一九五八年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以后,自治区各族人民在总路綫的鼓舞下,奋勇前进,因而使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設实现了全面大跃进。解放前,全区只有十四个設備陈旧的小型工厂,現在已建起一千一百六十六个現代化的大工厂,若加上县办和人民公社办的中、小型工业,全区已有一万八千五百多个工矿企业单位。工农业总产值,以一九五八年同一九四九年相比,增长了三点二七倍,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七点九零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六。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扩大到三千六百一十七万亩,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一点九倍,每人平均有粮食从一九四九年四百四十七斤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五斤以上;棉花产量增加了十一倍还多。牲畜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比解放前牲畜最多的一九四二年

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七。随着工农牧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交通、运输、邮电、商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迅速。高等院校已由解放前一所增加到八所，中学由二十所增加到六百二十八所，小学由一千三百三十五所增加到三千九百五十二所，大中小学学生比解放前增加了三点二倍，医药卫生单位增加了二十一点六倍，中西医师人员增加了二十八点三倍。许多危害人民生命的疾病已被消灭或被基本控制。社会主义的工农牧业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巨大发展，大大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居民的平均收入已比解放前提高了三倍以上。

十年来，我们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所积累的經驗也是丰富的。回顾我們已走过的道路，很好地总结十年来的經驗，这对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綫、加速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飞跃发展的十年里，我們有如下的体会：

一、少数民族地区要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經驗证明：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乃是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十年来，我們党为了彻底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民族团结的政策教育，进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的教育，并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解放后初期，大民族主义成为妨害民族团结的倾向时，党即作出决议，坚决开展反对大民族主义的斗争，纠正了这一倾向。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地方民族主义成为妨害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倾向时，党立即开展了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巩固了祖国的

統一和民族團結。从几年的經驗看，克服資產階級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必須經常地反复不懈地向各族干部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防止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滋长。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反对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反对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斗争进行得愈深入，愈能提高干部的觉悟，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們党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自治区解放后，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經過充分准备、調查研究和同有关民族人士反复协商后，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几年来事实証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完全符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和各族人民的願望的。忽視民族地区政治經濟的特点，忽視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积极作用是不对的。有一个时期，少数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机，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叫囂搞独立共和国，搞民族分离，企图脱离祖国，这是极其反动的。对这种反动的思想已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进行了坚决批判和糾正。

二、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而稳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少数民族躋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建立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須經過的道路。自治区在經過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在一九五三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三大改造。自治区在解决民主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問題时所采取的方法、步驟和全国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我們依据中央的指示，充分注意了新疆地区的民族、宗教以及工作基础等方面的特点，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步驟。同时，認真加强了党的統一战线工作。一方面，我們根据民族宗教等特点，在土地改革中，保护了一些上层民主人士过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者采取說服教

育的方法，讲明和平改造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和全国经验大力发动群众，广泛展开群众运动。经验证明，通过群众运动，可以使改革工作搞深搞透，可以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鼓舞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安排上，我们坚持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方针。在工作进行中，凡是有条件加快速度的就积极加快速度；暂时没有条件进行的，就不勉强进行，不勉强追求速度，而大力创造条件，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在开展各项改革运动中，我们紧紧抓住了促进生产发展这个中心环节，运动中的每一措施，每一工作步骤，都密切地同生产结合，因此各项运动大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畜牧业在自治区国民经济中占比重较大，因此，我们在牧区进行改革采取了更加慎重稳妥的步骤。在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几年内，我们实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并在生产上采取各种措施，大力促进牧业的增产。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对牧主经济和牧民个体经济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一九五八年秋后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对牧主经济的改造，我们采取了赎买政策，组织公私合营牧场，牧主的牲畜折股入股，按股分红。人民公社化后转为折价定息，并吸收牧主参加场内适当的工作；然后经过适当时间，逐步地将公私合营牧场转为国营牧场。对牧民个体经济的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办法，牲畜折股入社，按劳畜比例分益，然后转为折价入社；同时在生产资料处理上也较农业区宽一些。这样作是切合牧区实际情况的，因而取得了各族牧民的拥护，顺利地完成了畜牧业的改造，防止了牲畜的破坏和损失，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大发展。

三、在实现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自治区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中心任务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

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集中一切力量，力爭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在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設中，自治区党委根据总路綫的精神，并根据自治区的資源条件，提出了把自治区建設成为祖国的一個鋼鉄、石油、煤炭、有色金屬、紡織、制糖等等工业基地和植棉基地。在农业方面，提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同时并举、发展粮食生产和发展棉花生产同时并举、发展农业和发展畜牧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在貫徹执行党的总路綫和上述方針政策中，广泛发动了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意气風发，干劲冲天。特别是去年大跃进运动、大炼鋼鉄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加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全面大跃进。从而使自治区的面貌一新，同时为今年的繼續跃进以及今后的繼續跃进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去年的生产同前年比較，鉄增长了九点五倍，其中洋鉄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点二，鋼增长了一点四倍，其中洋鋼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点六，煤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一点一，机械制造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四，耕地扩大了百分之十九点四，粮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五，棉花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九。一九五九年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坚持以鋼为綱、以粮为綱的方針，正在繼續跃进。事实証明，党的总路綫是促进生产大发展的动力。沒有党的总路綫，要取得去年的全面大跃进和今年的繼續跃进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后要繼續实现跃进，必須毫不松懈地努力坚持党的总路綫，鼓足干劲，力爭上游。事实又証明，自治区党委所确定的要将新疆建設成为祖国工业、植棉基地之一和几个并举的方針是必要和正确的。这些方針同去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鋼鉄运动結合起来，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現在自治区的鋼鉄基地已經粗具規模。一九五七年产鉄一万七千二百三十吨，产鋼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吨，一九五八年产鉄十八万多吨(其中洋鉄三万多吨)，产鋼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九吨(其中洋鋼二万六千多吨)，今年預

計可产鉄十八万吨，产鋼六万到七万吨；石油、煤炭、机械、紡織等工业均有巨大发展。在农业方面，去年一年即开荒四百七十五万亩，預計今年可开荒五百万亩；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四，預計今年将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一·九；在发展粮食作物的同时，积极发展了植棉，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二·三，植棉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七·七，今年比去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九，植棉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八·九；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畜牧业也获得了迅速的增产。

四、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設事业，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貧困落后的面貌，必須有党中央和国家的領導和支援，必須有汉族人民的帮助，必須有內地省、市的协助。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經济文化事业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是与党中央和国家的領導和支援、与汉族人民的帮助、与內地省、市的协助分不开的。十年来，中央給自治区派来了各方面的工作干部，撥来了大批的建設資金和物資，在自治区兴办了大批的工业，并在劳力方面和技术方面給了巨大支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自治区的基本建設投資共达二十五亿零七百万元，其中国家投資即达十八亿四千四百万元。另外，中央对发展新疆农牧业和工商业的貸款，历年累积达到一百三十九亿八千万元。新疆解放后，历年来財政上都有赤字，中央給予了四亿七千多万元的財政补助，使新疆逐年减少了赤字，达到收支平衡。此外，在物資方面的支援也是极其巨大的。这些援助大大增强了自治区的建設力量，減輕了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困难，大大加快了自治区的建設速度，同时也更加增强了自治区各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中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間的团结和友誼。

五、在进行一切改革和一切建設中，必須依靠党的領導。党的領導是鼓舞各族人民奋勇前进战胜困难的偉大力量，是我們革命和建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証。远在盛世才反动統治时期，

党中央即派来了陈潭秋、毛泽民等革命领导干部，在新疆地区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撒布了红色的种子，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而新疆的革命运动随着全国人民革命运动得到新的发展，在新疆爆发的三区革命，就是例证。十年来，党领导各族人民解放了新疆，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党根据每一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方针和政策，密切团结各族群众，指导各族群众前进。党十分重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从新疆解放开始，就不断地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理论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从政策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了民族团结。党在进行各项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积极建立和发展了党和团的组织，培养了大批的本地民族干部。现在全区已建立党支部八千九百八十二个，党员十三万余人，其中本地民族党员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三，建立团支部一万零二百八十个，团员二十二万余人，其中本地民族团员占百分之五十多。培养和提拔的民族干部七万二千多人。这些干部已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开展各项运动中，党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民族、宗教、工商、科学、技术各界民主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没有党的领导，要取得如此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不可能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年来的发展，证明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求得解放、发展和繁荣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我们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当前，新疆各族人民的任务就是继续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祖国的统一，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继续跃进；积极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反右倾、鼓干劲，全面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为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为明年的建设事业继续大跃进而奋斗！

庆祝建国十年来的伟大胜利

韦国清

我們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經建国十周年了。十年来，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使社会主义建設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我国貧穷落后的面貌。

我們广西两千万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胜利地走过了光輝的十年。在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关系，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充滿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蓬勃兴旺的新气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区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統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社会主义經濟，同时，还要繼續完成民主革命所遺留的任务，进行土地改革，并且要恢复国民經濟。封建土地关系，是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根源。全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面积达百分之四十之多，而占人口百分之五十的貧雇农民，却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三。广大农民在地主阶级及反动政权的殘酷剝削下，生活极端貧苦，生产无法发展。因此，当人民政权一經建立起来的时候，党就在清匪反霸、鎮压反革命的胜利基础上，积极地領導着全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历时两年多，从根本上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农村生

产力得到解放,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还结合着农村和城市的社会改革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帮助他们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所有这些运动的胜利,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全区人民的政治觉悟,为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当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及时地、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要求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于党的这条总路线的认识,当时部分同志在实际上是与党有分歧的。这集中表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当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之后,农村中小农经济成分占很大数量,它是“十字路口”的经济成分,这时农村中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少数同志缺乏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把少数富裕农民的要求当成全体农民的要求,错误地提出了“劳动发家”、“四大自由”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口号,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时乘机有了发展。一九五三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批判了这种“言不及义”的右倾思想,接着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便迅速发展起来。至一九五四年春,全区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有七百多个。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已被广大农民认识到是引导他们走向幸福繁荣的唯一道路。

但是,正当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些具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的同志,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说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已经“超过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經驗水平了”;他们说“北方可以快,南方不能快”;说“建社容易巩固难”等等。妖风起处,农业合作社确被“吹”散了一些,造成了经济上、

政治上的不少損失。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澤东同志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尖銳地批判了这些同志的“小脚女人”走路似的右傾思想，滿腔热情地贊揚了广大貧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預見到全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于是，雨过天晴，一个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便在全国、全区普遍开展了起来。

但是，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还不能說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結束。資产階級分子在政治思想战綫上还要和我們进行激烈的斗争，一九五七年資产階級右派分子趁着我党进行整風的机会，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专政发动了进攻，我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回击了他們，这场斗争的結果，党和人民取得了偉大胜利，資产階級右派分子遭到了彻底失敗。

就这样，在这段時間內，我們不仅在經濟战綫上，而且在政治思想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也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

随着經濟战綫上和政治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我国进入了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設新时期。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濟建設，党早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決議上，就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及世界各国无产階級的援助下，这种建設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計日成功的。一九五五年冬，当群众性的生产建設高潮开始出現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及时地提出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原来第一个五年計劃規定的速度。接着又把他在著名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所闡明的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口号。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倡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綱領。同年四月，毛

澤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會議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总方針規定了一系列的主要政策。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上述的方針和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便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經驗和毛澤东同志的思想发展，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这条总路綫，充分地估計到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获得了解放的劳动人民，他們对社会主义建設有着无比的热情和无穷的創造力；反映了我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可能；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状态的願望；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必然趋势。因此，它一經提出，就立即变为雄偉的物质力量，使广大人民的劳动热情和創造能力，有如火山迸发，震动天地，排山倒海，气势磅礴，从而出現了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形势。

但是，也如同历次革命轉折关头的情况一样，在如何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上，我們也和資產階級的右傾机会主义思想进行着不調和的斗争。

有些人对大跃进抱着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他們认为：社会主义建設只能漸进、不能跃进。可是，一年来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他們的謬論。就全国來說，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就我区來說，在工业方面，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設投資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百六十七点五；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六点七。其中主要产品产量：生鉄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八点五倍；鋼一万四千吨，結束了广西不能炼鋼的历史；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百七十四点七，超过了一九五七年以前五十五年煤产量的总和；发电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二；装机容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接近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增长的总和；机器制造总重量比一九五

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交通運輸的貨运总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近一倍。在农业方面，一九五八年虽然遇到了严重的旱災，但是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頑强不屈地向自然災害作斗争，动员了五百万人参加抗旱，結果在特大災情的年头，还获得了特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一·四。其他財貿、文教等各項事业的发展，都是史无前例的。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不容怀疑的，是否定不了的，我区两千万人民，是这些成績的創造者和見証人。大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所必需，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必需，是增强社会主义陣营力量和保卫世界和平所必需，我們要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

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建設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又进行各种非难指責，說这是少数人的强迫命令。这也是荒謬无稽的說法。在大办鋼鉄、大修水利、大搞交通運輸、大办財貿、文教等各項事业的群众运动中，几百万、上千万人廢寝忘食，不計报酬，展开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表现了热情奔放、干劲冲天、敢于創造新生活的共产主义精神，使生产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使各項事业出現了突飞猛进的局面。这样的群众运动，正充分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了解放的人民，决心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他們这种强烈的願望，在党的正确引导下，就必然表现为高屋建瓴、所向披靡的雄偉行动。試問世界上那里能有这样的少数人，可以“迫”出这种規模、这种性质的群众运动？这样的群众运动，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中，将成为經常的、积极的因素。让那些歇斯底里的指責非难，永远淹沒在那群众运动的偉大声势中吧。

有些人抓住某些暫时的緊張現象，就說大跃进只会造成混乱，只会造成国民經济各部門間，經济建設与文化建設之間各种关系的失調，因而是不正常的，是不符合客观規律的，我們說，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去年以来，由于执行了中央几个同时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工农业的大跃进，带动了农业的大丰收，农

业的大丰收又促进了工业的大跃进，在工农业并进的基础上，又带动了交通运输、财政贸易和文化科学等各项事业的相应发展。总的来说，不是失调，而是协调的。在前进的过程中，是出现过某些局部、暂时的失调现象的，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要革命、要前进，就不能故步自封，原样不动，就必须打破不利于前进的旧秩序，建立有利于前进的新秩序；就必须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如此循环不已，才能不断前进。这不是违反客观规律，而正是体现了客观规律。当然，在大跃进中，由于没有经验，也出现过某些个别缺点，但是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值得惊奇的并不是发生了一些缺点；值得惊奇的是，缺点同成绩相比是如此之少，缺点的克服是如此之快。”有些人看不见伟大成绩，只抓住个别已被克服了的缺点，一直喋喋不休地非难、咒骂，这能够说是善意的吗？

有些人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少数人轰起来的，没有客观必然性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恰恰相反。人民公社是去年生产大跃进的必然产物，是应乎时势、合乎人情的。去年我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只有两个月时间，当时群情振奋、声势浩大，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如果建立人民公社不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谁有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按照自己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把全区各族人民都轰起来呢？从前年冬天，大兴水利开始，到去年大抗旱，大抓田间管理，大办钢铁，使广大农民逐步地深切感到，高级社已经不能满足一日千里发展的生产需要了，特别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和资金不足的困难，他们开始了相互之间的生产协作，协作的范围，开始是几个临近的小社之间，而后扩大为十几个社之间和一个乡的范围之内，我们必须高度估计大协作生产的意义。它从政治、思想、组织以及经济的各个方面，为公社化准备了条件。正因为如此，当去年八月间，党中央集中全国农民的要求，正式提出成立人民公社后，就有如春风拂野，在全区范围内，引起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的

組織，有人又說人民公社“搞糟了”，是個“空架子”，“沒有優越性”。難道這是事實嗎？人民公社是高級社的進一步發展，是更大型的集體生產組織，在它的統一領導下，便於使農、林、牧、副、漁得到全面的發展，便於進行較大範圍的勞動協作，使各個基本核算單位之間的勞動力得到合理調劑，有利於生產的進行；它能積累大量的資金，進行規模比較大的基本建設；能夠從國家方面，購買到更多的生產資料；能夠從經濟上去支援那些生產條件不好的生產單位，使它們能迅速前進；還能為廣大社員舉辦更多的福利事業。今年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年，上半年普遍獲得了巨大的收穫，這說明了人民公社有無窮的生命力，是我國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的基層組織形式，也是我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的基層組織形式。事情非常明白，人民公社化運動，不是什麼人喊一下，就能建成的；也不是什麼人反對一下，就會垮台的。

去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不僅在物質上、組織上為今年的繼續躍進奠定了基礎，而特別珍貴的是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打開了人們的眼睛，為今年更大的躍進，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今春以來，我區的形勢，是非常好的，是一片興旺氣象，上半年，各個戰綫上都取得了巨大勝利。在工業方面，基本建設投資額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百六十三，縣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八十，在主要產品中，生鐵比去年同期增長近三倍半，煤比去年同期增長三倍多，機械製造重量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八十，發電量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八點七，糖比去年同期增長兩倍以上。運輸方面，貨運總量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點五。在農業方面，今年夏收作物，無論是單位面積產量或總產量，都超過了去年。其他各項事業都獲得了蓬勃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提出反右傾、鼓干劲、厲行增產節約運動的號召以後，全區人民更是揚鞭催馬、高歌猛進。工業戰綫到處開展了轰轰烈烈

烈的“三高、一低、两好”的运动，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竞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农业战线上超包产的丰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在各个战线上到处是红旗飘扬，到处是热浪滔滔。这预示着更大的胜利在等待着我們。

十年来，我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段光辉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伟大的胜利，是党的总路线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回顾过去，我們感到兴奋无比；展望未来，我們更是信心百倍。我們全区人民，永远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着总路线的红旗，胜利前进！

高举总路綫的紅旗，乘胜前进

刘格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一周年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全国和全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形成高潮的时候成立的。自治区的成立，进一步鼓舞了全区各族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了全区各族人民之間的团结和合作，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迅速发展。经过这一年的努力，宁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設得到了全面大跃进，宁夏在經濟、文化上的落后面貌正在迅速改变，宁夏各族人民的团结协作关系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春季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以后，宁夏各族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革命干劲空前高涨，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今年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了繼續跃进，获得了新的成就。

在农业方面，一九五八年获得了大丰收，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十五点六亿斤，为一九四九年的两倍半。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又比去年增长了一成以上。黄河灌溉区的十二个县市，小麦亩产达到四百一十斤。全区的水稻产量比去年增长四成左右。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搞水利建設的群众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就，山区的干旱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全区的灌溉面积比一九四九年扩大一倍以上。畜牧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羊只净增六十九万只，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二，这是我区畜牧业生产史上空前未有的特大丰收。各种經濟作物的产量、家畜

家禽的数量也有相当的增长。

在工业方面，全区已经兴建和扩建了三百五十多个国营工矿企业，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一亿多元，今年将达到一亿五千万，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十倍以上。经过去年的全民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完成了国家规定的钢铁生产任务，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结束了宁夏“手无寸铁”的落后状态。从今年起，我们的冶金工业已经由以小土炉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小高炉为主的阶段，并且兴建了年产五万吨钢的石嘴山钢铁联合企业。煤炭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去年全区生产了一百二十多万吨原煤，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二十多倍。今年全区将生产二百四十五万吨原煤，即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我们正在建设石嘴山、石炭井煤炭工业基地。现在全区六个重点煤矿两天半的产量，就相当于一九四九年全区全年的产量。自治区的煤炭已经开始外调，今后我们将以更多的煤炭供应兄弟地区。一九五八年全区发电量为一九四九年的十多倍，今年将比去年再增加两倍。现在全区绝大部分县市都有电厂，有些公社也建立了小型电站。青铜峡水电工程和石嘴山火电工程建成以后，自治区北部将出现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力网。机械工业已经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开始生产机床、电动机和变压器等新产品。纺织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预计今年全区将生产上百万米的棉布和十多万米毛织品。

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包兰铁路的通车和通往北京、兰州的航空线的通航，大大便利了自治区同全国各地的联系。现在全区的公路里程，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二倍多。全区所有县市都通汽车，绝大部分公社都有公路和简易公路。并且做到了全区生产大队通邮，绝大部分生产大队通电话。一个通达全区的交通邮电网正在形成。

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一九五八年全区实际完成的基建投资达到一亿多元，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总数。今年的

基建投資又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工业設備和生产能力有了很大增长。基建队伍正在逐步成长起来。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一九五八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額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今年一至九月份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

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一九五八年一年，小学生增加了十一万人，中学生增加了八千人，并且創辦了三座高等学校。在群众性的扫盲运动中，許多青壯年摘掉了文盲帽子，掌握了文化知识。自治区和各县市都兴办了科学研究机构，并且有几十个公社和几百个生产大队建立了科学研究組織。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員有很大增长，作到了县、社有医院，大队有产院和保健站，小队有保健員和卫生員。讲究卫生已經成为社会風尚，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各族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全区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和繼續跃进的过程中，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树立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風格，鼓足了革命干劲，在生产劳动中，表現了勇于克服困难，勇于革新創造的英雄气概。

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对于发展生产建設起了巨大的作用。人民公社一經建立，就在爭取去年农业大丰收和大炼鋼鉄方面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从今年春季起，我們根据中央的方針，对人民公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頓。現在人民公社已經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它的优越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在全区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条件下，宁夏回族人民的經濟和文化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吳忠、涇源、西吉等八个回族人口較多的县市，今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八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七，相当于一九五〇年的两倍多。这些原来几乎没有工业的地区，已經办起了一百多个工矿企业，今年的工业产值将达到四千五百多万元，相当于一九四九年全区工业产值的三倍

多。全区回族当中已经有了两万名职工。回族的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和逐渐壮大，标志着回族面貌的根本变化。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愈来愈多，协作愈来愈密切。这就使得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大协作的亲密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各族人民在加强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方面也愈来愈表现了更加积极和更加主动的精神。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互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一年来的巨大成就，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宁夏各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坚决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因此，当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发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的伟大号召以后，宁夏各族人民立即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党的号召。八月份以来，自治区各经济战线上都获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九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八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七，基本建设投资完成数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三。生铁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八，原煤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三。农业战线在取得了秋田超产运动的胜利之后，又在为争取明年大丰收的准备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现在全区的增产节约运动正在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宁夏各族人民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团结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将自治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烏兰夫副总理在各民族 观礼团負責人座談会上关于今后 民族工作任务的談話

(一九五九年十月八日)

国务院副总理烏兰夫十月八日召集来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各民族观礼团和青年学习团的負責人，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座談会。

烏兰夫副总理在座談会上讲了話。他說，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的成就是光輝的、偉大的，也是史无前例的。从全国来看是这样，从民族工作来看也是这样。他說，过去的十年中，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光輝、偉大的胜利。从民族文化宫的建立和十年来民族工作展覽的內容来看，有力地說明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完全正确，党和毛主席对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一貫地給予了最亲切的关怀，我們的国家是統一的，各民族是亲密团結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已經建立，并且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間事实上的不平等正在逐步消灭，民族間的差異正在逐渐消除。各民族人民对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无比热爱的。

烏兰夫副总理指出，各民族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坚决貫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決議，反右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談到今后民族工作的任务时，他強調指出：(一)各民族要坚决貫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繼續实现大跃进，在大跃进中逐步消除各民族間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二)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中，各民族要更加团結协作，学先进，赶先进，互相帮

助，互相支援。(三)現在，無論是民族雜居或聚居地區，已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使民族關係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地區生產建設的躍進，今後各民族在人民公社內，更要加強團結協作，共同發展。(四)必須大搞群眾運動，革命和建設都不能離開群眾運動，少數民族地區在今後的躍進中，同樣要充分發動群眾。(五)西藏地區應該繼續充分發動群眾，貫徹黨的各項政策，徹底完成民主改革，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六)在少數民族地區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隊伍，培養社會主義建設各方面所需要的少數民族幹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繼續深入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七)在十年來民族工作成就的基礎上，各民族人民繼續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加強民族團結，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努力。

在座談會上，各民族代表紛紛發言，興奮地用本地區的生動事實和在首都、各地的見聞說明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不斷為祖國社會主義大家庭帶來了繁榮和幸福。他們滿懷信心地表示，今後要更高地舉起總路綫的光輝旗幟，在共產黨和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繼續向前躍進。



封面
目录
正文